

# 傳播研究集刊

第三集

## 新聞報導與真實建構： 新聞框架理論的觀點

臧國仁 著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

- \* 本文初稿曾於中華傳播學會1998年會宣讀，並獲頒該會青年教授組傑出傳播論文獎 (Top Two Paper)。作者感謝該年會及本刊匿名評審提供之卓見，並特別感激年會評審人方孝謙教授之建議。國科會贊助之「專家生手研究群」同仁（召集人為鍾蔚文教授）過去數年之討論啓迪甚多，一併致謝。

## 摘要

有關新聞媒體如何報導真實事件，一直是廣受重視的研究議題。但此類以守門人研究為主的早期主流典範，在一九八零年代逐漸受到各方質疑。挑戰者認為，傳統新聞學理論受到實務工作影響過深，誇大了新聞媒體在資訊產製過程中的獨大角色，未來應重新審視其他社會組織與新聞媒體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延續此類研究傳統，改以社會建構論為基礎，討論新聞報導如何在再現社會真實的過程中受到框架影響。在組織層次，本研究指出「新聞常規」、「內部控制」、以及「專業意理」三者是影響新聞媒體選擇與重組社會真實的重要面向。在個人層次，新聞工作者的知識結構不但協助擬定目標，也是選擇素材、轉換資訊的重要條件。在文本層次，新聞句法、情節、主題、修辭與字語均是呈現真實的主要途徑；不同新聞文本結構，會展現不同社會真實面向。

本研究因而強調，新聞產製係一項不斷受到特殊條件（框架）影響與制約的社會行動。未來研究可從此一觀點繼續討論其他影響新聞真實的因素，如消息來源框架、議題故事框架、以及讀者認知框架如何與新聞媒體互動，或如何再現社會真實。

**關鍵詞彙：**建構理論、新聞框架、新聞常規、新聞基模、再現

（本文於八十六年十月十一日收到原稿，八十七年五月四日審查通過）

##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first to review how the news media were traditionally said by researchers in report of the social reality; and second, to criticize such assertion which says that the media do "mirror" events in the society; and third, to provide a new and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s reporting and news reality by applying the theory of news framing.

Three levels of news frames were introduced in the paper: On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news routines, newsroom control, and professionalism were considered as factors which "frame" the process of news-making. On the personal level, a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was used as examples to show how news reporters would be heavily influenced by own schemata in reporting. On the textual level, it was also said in the paper that themes, scripts, rhetorics, words and terms all contribute to the existence of news frames.

Keywords: constructionism, framing, news routines,  
news schema, news texts, news representation



## 目 錄

壹、前言.....	1
貳、新聞運作的常規與流程.....	3
一、新聞定義與新聞價值.....	3
二、守門人模式.....	6
三、新聞常規.....	9
四、消息來源.....	12
五、其他新聞常規.....	14
六、小結.....	18
參、新聞媒體與社會真實.....	20
一、對傳統新聞定義的省思.....	20
二、新聞與真實.....	27
肆、新聞框架與真實建構.....	34
一、新聞框架的定義.....	35
二、新聞框架的內涵結構.....	36
伍、結論.....	72
參考書目.....	76



## 圖目錄

圖一：傳統新聞學對新聞之定義.....	21
圖二：新聞或媒介框架與社會議題的關聯.....	29
圖三：新聞框架的基本內涵結構.....	75



## 壹、前言

有關新聞媒體如何反映真實，一向是新聞學領域廣受重視的研究主題，過去已歷經多次典範轉變。早期守門人理論首先揭櫫新聞產製流程必須經過媒體組織工作人員的層層節制，新聞工作者在不同「關卡（gate）」前，以自己所認定的讀者需求，以及組織提供的工作規範，將新聞素材加以選擇、刪減、調製、或綜合（見下節討論）。這種論點對建立新聞專業有重大貢獻，新聞媒體因而逐漸被視為是社會制度中的第四權，負有監督社會系統正常運作的重要功能。新聞媒體的責任就在完整與客觀地報導社會事件與提供真相，藉此促進民主政治中的「知的權力」。

隨後的研究所發現，新聞雖然係由新聞工作人員依據專業意理獨立製作而成，媒體報導的內容卻經常呈現「偏向（bias）」情事，如政府官員、男性、或有權勢者長期在新聞報導中佔有優勢地位，而弱勢社會團體（如同性戀者）或異議份子（the deviants）則夙為新聞媒體漠視與忽略。文化學派學者據此強調，新聞並非僅是中立的資訊，其內容其實充滿了社會與文化意義（或意識型態）。新聞工作者在採集社會真相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受到消息來源的介入與影響。而新聞記者受到內部常規（如截稿時間）之限制，有時候甚至會為了完成報導任務而甘於接受官方訊息的主導，成為主流勢力的臣服者。這種現象容易造成新聞媒體僅是某些政治利益集團的「反射」，一些懂得媒體運用者亦可借用新聞報導的强大社會影響力成為媒體英雄或新的利益階級。<sup>1</sup>

---

<sup>1</sup> 有關消息來源如何影響新聞媒體，可參見Baerns, 1987 與Gandy, 1982 之文獻，或戴國仁，1995a有關消息來源之部分。但簡言之，從過去相關文獻觀之，消息來源「利用」新聞媒體本為常態，因為不同消息來源必須相互競爭、角力，始能在媒體這個公共領域中達成「自由、理性、公開」等論壇角色。此點限於篇幅，將另文討論。



較近的一些研究，則嘗試整合上述兩類角度迥異的看法，認為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處於競爭性共生（competitive symbiosis）的互動狀態。雙方在提供社會大眾資訊的過程中，同樣重要且角色互補，但無法單獨存在。在雙方接觸的過程中，彼此各顯神通，互有強弱，可說是權力的交換。<sup>2</sup>

以上簡述，大致上顯示了隨著研究題材的多元化，有關新聞概念的定義與內涵均有漸趨複雜的傾向。過去認為新聞乃新聞工作者根據事件之價值所做的判斷，已逐漸修正為不同社會組織（如「消息來源」）對社會事件的共同影響。這種相關概念的改變與更動，在學術發展上本為常態，無論在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演進過程中，均不乏類似肇因於不同「世界觀」所產生的「革命」。<sup>3</sup>

本文旨在延續以上討論，以社會建構理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為基礎，進一步提出新聞框架（news framing）觀點，檢討新聞媒體如何報導社會現象。此類源於社會建構論的觀點，過去已在社會科學不同論域多次造成典範轉移，但在新聞學與大眾傳播領學領域中則尚未蔚為風氣。<sup>4</sup>

本文認為，研究者過去所依賴之傳統客觀原則與鏡子理論均無法澄清新聞與真實間的互動關係，未來應改以框架理論討論新聞報導如何轉換（或再現）社會現象，以及在此種轉換過程中，新聞報導內容如何詮釋與分析社會事件中的真實面向。

<sup>2</sup> 代表著作如 Wolfsfeld, 1991, 1993, 1997a；臧國仁與鍾蔚文，1997b。

<sup>3</sup> 雖然此地引用了 Kuhn, 1970, 的「科學革命」卓見，本文無意強調不同學術論點之間僅有「零和」關係。以 Potter, 1996, 的說法觀之，社會科學中的不同解釋，乃在澄清哪一種說法可提供較多研究問題（formulating the questions）。

<sup>4</sup> 如在組織學中的 Weick, 1969; 社會問題研究的 Spector & Kituse, 1977 等。Crigler, 1996, p. 7 認為，【政治】傳播建構論乃延續過去媒介效果研究、新聞產製論、消息來源控制觀點、以及政治認知等領域，「承認所有行動者在【政治】意義建構中均有責任（responsibilities）」，包括新聞記者、消息來源、以及讀者個人等。此類研究之重點，Crigler 認為在於邁向討論訊息如何為個人／機構創建（created），以及訊息如何為新聞媒體或政府決策者詮釋。

何會  
聞是  
聞之  
些定  
定義  
就是  
述：

如以  
「客  
觀

5

1

6

7

## 貳、新聞運作的常規與流程

### 一、新聞定義與新聞價值

所謂「新聞」，過去相關定義甚多，如McEwan曾謂「新聞就是任何會讓讀者大呼『哇塞』的事情」，《紐約時報》的Catledge則認為新聞是「今日所悉而昨日尚未聽聞之事」。《紐約太陽報》的Bogart對新聞之定義最為膾炙人口：「狗咬人並非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sup>5</sup>這些定義大都取自資深新聞實務工作者之經驗談，係以社會事件做為新聞定義之經緯。<sup>6</sup>教科書著者則有不同論點，如Mencher之定義：「新聞就是報紙篇幅所刊載或廣播電視播報者」，或如Hulteng & Nelson所述：「新聞是記者及編輯所決定之事物」。<sup>7</sup>

以上這些說法皆傾向認為新聞乃由新聞工作者或新聞媒體所決定，如以「解釋性報導」學說而聞名於世的新聞學者MacDougall即曾說明，「新聞乃報紙為獲利所刊載之消息」。Herman認為新聞是一種內在價值觀，乃新聞工作者藉由自我省思後對事件素材所進行之選擇判斷。

<sup>5</sup> 以上定義均引自Keir, et al., 1986, 但McEwan之說法可能出自社會學家R. Park, 參見Tuchman, 1991: 81。Park原為記者出身，其定義因而特別引人注意：「新聞是第一手的直覺知識（或已熟知的知識，acquaintance with），而非科學知識（或理論知識，knowledge about）」（引自Philips, 1976: 90）。

<sup>6</sup> 以事件作為新聞之定義此一說法，可參見Blake & Haroldsen, 1975。作者將新聞之定義分為「事件」、「報導」、「新聞價值」、以及「讀者需求」等四種取向。

<sup>7</sup> 以上兩項定義均取自Padgett, 1990。作者曾蒐羅各類新聞定義，但結論卻傾向認為「新聞難以定義」。有趣的是，早期之新聞定義若非來自新聞工作者的說法（如本節所引），則就係來自研究者對新聞工作者的訪談，如Buckalew, 1969/70, 1969; Clyde and Buckalew, 1969。



Hough則稱，「新聞可視為是一種商品（commodity）；經由報社、雜誌社、通訊社、電台、電視公司、有線電視、或電視網採集、製作、包裝、與售賣」。<sup>8</sup>DeFleur & Dennis的說法更為有趣：

新聞是一種報導，對議題、事件或過程提供了當代看法（contemporary view），乃新聞工作者透過對讀者興趣所產生的共識組合而成，但受限於新聞組織的內、外運作。……新聞是一種組織內妥協後的產品，在極短時間內將當天所發生的人類活動進行挑選整理。新聞的生命因而極為短暫，可說是在壓力下進行迅速判斷所產生的非完美產物。<sup>9</sup>

除了這些引述外，另有學者<sup>10</sup>認為新聞是新聞工作者選擇事件的「標準（criteria）」，或稱新聞價值（news values），包括地域性、重要性、時宜性、影響性等重要變項；一項社會事件包含愈多價值變項，新聞性就愈高。Schramm曾說，新聞存在於人們知覺中，是「再現事件的主要架構」。Stempel, III以因素分析調查新聞內容，證實新聞的確為一多面向概念（multidimensional）。較近期之研究如Shoemaker, et al.亦曾試圖尋找有關新聞價值之多種面向，共歸納了異常、重要、聳動、以及衝突等四項。<sup>11</sup>

事實上，有關新聞價值的研究起源甚早，尤以北歐國家傳播學者的

<sup>8</sup> MacDougall之引句引自F. Fedler, 1979; Herma的說法出自1986: 172; Hough之定義引自Padgett, 1990: 69。

<sup>9</sup> DeFleur & Dennis, 1988: 35. Molotch and Lester, 1974, 曾如此分類新聞：如果某一事件預先策畫且由策畫者促成刊登，此為常態新聞（routine news）；如果預先策畫的事件乃由不同人所促成，則為醜聞（scandal）。如事件非事先策畫，且非由事件發起人所促成，此為意外（accidental）。

<sup>10</sup> 國內學者著作，王洪鈞，1986，第一章，第三節。國外學者論述甚多，可參見Ryan & Tankard, 1977: 105-109; Graber, 1984。新聞價值可定義為「決定事件如何值得被報導的標準」，見Westerstahl & Johansson, 1994: 72。此外，Gans, 1979, 與Westerstahl & Johansson, 1994, 亦稱此標準為規則（rules），藉以顯示新聞選擇的必然性。

<sup>11</sup> Schramm, 1949, p. 259; Stemple, III, 1963; Shoemaker, et al., 1992.

貢獻最大。<sup>12</sup>挪威學者Ostgaard早在一九六五年即已試圖分析影響新聞運行的三項內在與外在因素（factors），包括簡單化、可識別性、及煽情。其同僚Galtung於同年發表此一領域最重要之文獻，深入討論社會事件如何轉化成爲新聞報導（how 'events' become 'news'）。<sup>13</sup> Galtung & Ruge在文章中提出十二項影響因素，包括八項認知心理因素以及四項文化因素，用以解釋事件何以轉換爲新聞。作者們認爲，一則社會事件愈符合此十二項影響因素，被納入爲新聞報導的可能性就愈高；而如在某一項因素的比重較輕，則須依賴在其他因素有較強比重，始有可能成爲新聞（稱爲「新聞互補因素」）。<sup>14</sup>

類似有關新聞因素的研究隨後在一九七〇與八〇年代成爲新聞與大眾傳播學界極爲重要之主題，但亦立即引發批評之風。<sup>15</sup>如另位北歐學者Rosengren即認爲新聞價值並非記者或編輯的個人心理判斷，實際上應包括「記者執行工作時的社會經濟系統的整體效果」；或稱非媒介因

<sup>12</sup> 有關北歐傳播學者對新聞價值研究的貢獻評論，取自Tsang, 1987, p. 42。此地所稱之主要北歐學者包括：Galtung, Ostgaard, Sande, Rosengren, Westerstahl等，可參閱參考書目。較新之新聞價值討論，可見van Ginneken, 1998, 第二章。

<sup>13</sup> Staab, 1990, 認爲，Ostgaard首開歐洲研究者對新聞選擇議題的興趣，而Ahern, 1981, p. 1則指稱Galtung & Ruge此篇論文爲「國際守門人研究最重要之文獻」。有關Galtung對新聞價值之較新解說，可參閱Galtung & Vincent, 1992, 第二章。

<sup>14</sup> 此處所引之新聞互補因素，出自另一北歐學者Sande, 1971, 提供之說明。Galtung & Ruge原先之討論十分冗長，基本上乃認爲新聞媒體選擇事件時有內在價值判斷，Bergsma, 1978, 稱此爲新聞因素研究的「自變項」。但Staab, 1990, 強調自變項應爲記者的採訪意圖，新聞因素是記者加於事件的「工具」，是應變項。

<sup>15</sup> Bergsma, 1978, 批評Galtung & Ruge僅討論了自變項（即媒體變項）；Hicks & Gordon, 1974, 試圖驗證Galtung & Ruge的假設，但發現相反結果。Larson, 1984, 批評Galtung的理論過於強調媒介的非個人特質（non-personal entity），忽略媒介組織的社會控制功能（參見下節說明）。同理，Tunstall, 1971, p. 21亦曾舉出Galtung理論之缺憾，包括「忽略新聞表現的一些基本層面，如新聞方向」。國內近作可參閱蘇銜，1995，之文獻部份。

素 (extra-media factor)。<sup>16</sup> Rosengren 強調，有關新聞因素結構的調查，應包含社會中的經濟、政治、與文化環境變項：「新聞研究需同時重視有關外在真實 (external reality) 的資料，以及媒體報導此一外在真實時的相關資料」。

其他研究者曾以 Galtung & Ruge 與 Rosengren 的模式為基礎，探詢新聞媒體之內在因素以及影響媒體報導的外在社會因素。如 Tsang 研究 1970-1986 所發表之 152 篇國際新聞文獻，發現下列因素影響新聞選擇，如地理接近（地理直線距離或是否位於同一洲、同一區域等）、經濟發展（包括國家經濟發展指數 GNP、國家間貿易總額等）、政治發展（如菁英國家、與國家戰略同盟者）、意識型態結盟、文化歷史關係（如語言或文字相近性、殖民地與宗主國等）、交往程度（如旅遊互訪人數、電子通訊互通頻數、交換學生人數等）。<sup>17</sup>

## 二、守門人模式 (the gatekeeping model)

以上簡介了有關新聞定義與新聞價值的相關文獻。無論是以 Galtung 或是 Rosengren 為代表的研究，都曾針對新聞產製的「環境」加以著墨：前者較為關心新聞媒體內部的心理環境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sup>18</sup> 後者則較重視媒體組織與其他環境的互動關係，接近傳播生態學的研究取向。<sup>19</sup>

<sup>16</sup> Rosengren, 1985, p. 251; 本段引述出自 p. 253.

<sup>17</sup> Tsang, 1987. 中文著作可參見臧國仁, 1987。

<sup>18</sup> 此一「心理環境」名稱出自 Lewin, 1951 的領域理論 (field theory)，或稱生活範圍 (life space)。MacLean & Pinna, 1958, p. 48 曾說：「心理距離對新聞媒體的內容選材有重大影響」，新聞記者如果心理上「覺得」事件發生遙遠，與讀者無關，就較無意報導。此外，Schramm, 1949, 對新聞品質的論點最受到重視。他認為人們選擇新聞涉及兩個心理酬報因素，一為立即性的快樂酬報 (pleasure reward, 如閱讀災禍、體育、社會真情或/情趣味等新聞)，另一為延遲酬報 (delayed reward, 如閱讀公共事務報導、經濟、科學或教育等新聞)。Staab, 1990, 則認為，守門人研究較關注新聞工作者個人的心理傾向 (predisposition)。

另一支涉及新聞媒體內部運作的研究取向，則為守門人模式。此類研究早期曾謂，新聞起自新聞工作室，或任何新聞工作者蒐集資料、撰寫新聞的場所<sup>20</sup>。首先調查守門人行為的White發現，編輯們獨立判定讀者的需求與喜好，從而決定一則新聞的生與死。在這個過程中，來自不同消息來源的稿件如果未能立即受到編輯的青睞，就只有被丟棄到字紙簍的命運。Cutlip追蹤美聯社發自紐約總部的電訊報導，發現其走向呈現漏斗形狀式：愈接近讀者，新聞量愈減。Cutlip因而指出，守門人過程涉及了新聞工作者的一連串決策，其功能在於選擇符合讀者需求之資訊。<sup>21</sup>

自一九五零年代以後，守門人理論持續受到新聞學者的重視，如Westley & MacLean提出ABX模式，指稱一般社會事件大都透過消息來源發出，經大眾媒體（守門人）篩選節錄後，成為一般閱聽大眾關心的社會話題。雖然有些資訊可能直接由大眾媒介取得，但一般而言消息來源仍扮演「發動機」的功能。在此模式中，「回饋（feedback）」首次置入新聞傳送的過程，用以顯示某些資訊在到達閱聽眾後，可能再回用到消息來源或新聞媒體（如閱聽讀者之意見反應）。新聞媒體、消息來源、以及社會閱聽大眾之間的互動關係，因而第一次取得較為清楚的理

<sup>19</sup> 有關生態學的文獻，可參見Hawley, 1965；新聞系統學之論述，見臧國仁，1995a 文獻部份。

<sup>20</sup> Gieber, 1964。此類研究甚多，較重要者如：Donohue, et al, 1972; Dimmick, 1974; Hirsch, 1977; Brown, 1979; Whitney & Becker, 1982; 近作如：Bleske, 1991; Shoemaker, 1991; McCarthy, et al., 1996。依Herman, 1986, p. 172 之見，有關新聞守門人研究最受重視之報告，分別為Sigal, 1973; Epstein, 1973; Tuchman, 1978; Gans, 1979 等四篇著作，其重點均在討論新聞記者與組織之互動，而非外界對新聞媒體的影響與壓力。此類研究均以深度觀察與訪問為主，以便瞭解新聞決策與選擇判斷的執行過程，因此較不關心新聞成品產出的效果。

<sup>21</sup> White, 1950; Cutlip, 1954. Bagdikian, 1971, p. 90 曾如此描繪守門人的工作：「守門人每天掃瞄超過五倍於其所能接受的文字與故事，而在稍大的媒體中，這些文字與故事可能十倍於讀者所能閱讀。這些守門人丟棄的東西，讀者從未有機會接觸。這就像是有百分之八十的事件雖然經由報導而抵達報社，但卻因已被丟棄而類似從未發生過」。



論解釋。<sup>22</sup>

根據Mowlana的說明，守門人研究主要探討三個重要問題：(1)誰是這些新聞「門」的製作者 (gatemakers or gate producers)？(2)新聞的本質與特色為何？以及(3)在新聞流動的過程中，個人、組織、社會、與科技分別對新聞產製有何功能？<sup>23</sup>而在一九七〇與八〇年代，研究者開始進一步針對新聞流向 (news flow) 進行調查，其中尤以Schramm與Atwood之報告最受重視。兩位學者以發生在亞洲之新聞事件為追蹤起點，記錄國際通訊社所報導之新聞量，隨後調查第三世界國家新聞媒體提供之報導總量，最後並統計第三世界國家之讀者閱讀新聞之數目。

在這篇被譽為「首篇探討第三世界新聞流通的實證研究中」，<sup>24</sup>兩位作者發現亞洲國家的新聞媒體大量倚賴國際通訊社，但多數新聞內容 (約四分之三) 為國內新聞或相同區域之國際新聞；此種情形使得亞洲國家的讀者極少獲得有關其他地區 (如拉丁美洲或中東) 的消息。而隨後在Tsang的統計中發現，國際新聞的流動過程至少牽涉了下列各種守門人，包括：國際通訊特派員 (foreign correspondents) 或兼職人員 (stringer)、新聞媒體或通訊社總部的編輯台、通訊社的地區分社編輯 (trunk wire editors)、下游新聞媒體 (如報社或電視台) 的國際新聞編輯、以及讀者。<sup>25</sup>此一流向基本上是一種線性活動，由上 (事件) 而下 (讀者)，或由菁英國家的新聞媒體而至落後國家的讀者，較少逆行而行。<sup>26</sup>

<sup>22</sup> Westley & MacLean, 1957. 此一模式之圖型，可參見McQuail & Windah 1981。有關「回饋」引入守門人之較深入討論，可參見Donohue, et al 1972, pp. 44-46。

<sup>23</sup> Mowlana, 1985, p. 20.

<sup>24</sup> 語出Lee, 1982, p. 631. 原文請見Schramm & Atwood, 1981.

<sup>25</sup> Tsang, 1987.

<sup>26</sup> 語出McQuail, 1992。以上論點 (所謂新聞流程由菁英國家的新聞媒體而落後國家的媒體)，曾是一九七〇至八〇年代期間國際新聞論壇重要爭論點，也曾在聯合國科文組織 (UNESCO) 成為國際傳播新秩序之主要題。爭議處在於第三世界國家不滿國際新聞報導之流向受到國際媒體 (AP, UPI, Reuter's, CNN, WTN等) 控制，以致有關第三世界之消息多屬面報導。類似討論可參見Gerbner, et al., 1993。

綜合觀之，守門人研究過去雖然為數眾多，且對早期新聞研究影響深遠，但其內涵單純，除了賦予新聞工作者個人過多選擇權力外，忽略了組織決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此一研究領域幾乎完全未觸及新聞工作者的內在動機與思考過程。Shoemaker之近作因而重新分類，將守門行為定義為多面向過程，包括：個人認知層級、新聞工作常規層級、組織層級、非媒介因素層級、以及社會系統層級。Shoemaker強調，守門行為是社會中的基本與重要機制，因為「控制了新聞媒體的訊息散布【功能】，也意味著控制了社會的心智（mind of society）」。<sup>27</sup>

### 三、新聞常規（routinization）

正如Gandy所言，守門人研究傳統上認為媒介內容為新聞工作者（記者或編輯）個人或媒介組織的行動成果，過於關注新聞工作者個人之背景或媒體組織的特性。實際情況則非如此，如有關新聞常規運作的文獻早已顯示，新聞工作受制於此一行業規範或典章處甚多。Gieber便曾指出，新聞工作者選擇新聞的心理價值觀或新聞事件本身的價值都不是重要決定因素，反倒是新聞組織常規才是判定事件的主要關口，也是一套需要學習的行規。<sup>28</sup>

所謂常規，可定義為「新聞媒體組織為完成任務，所發展之可重複使用且成為慣例的工作程序」。<sup>29</sup>對McManus而言，媒體組織就是一種促銷新聞產品的機構，透過外在消息來源取得訊息素材，經過加工處理後製成新聞產品轉送給社會大眾。為了促使產品的質量均能符合大眾需

<sup>27</sup> Shoemaker, 1991, p. 4；插入語句為本文作者添加。

<sup>28</sup> Gandy, 1992, p. 9; Gieber, 1964.

<sup>29</sup> 引自Shoemaker & Reese, 1991, p. 85. Cook, 1994, 認為，新聞機構如同其他組織一樣，為了管理工作而須發展常規，也就是標準化的行動。如新聞媒體以區域或議題規畫路線，不但可避免記者彼此採訪相同議題，浪費資源（俗稱踩線），這種路線分配也代表了媒體組織對某一區域或議題的承諾（commitment）。此外，Shoemaker & Mayfield, 1987, pp. 8-10, 稱「常規」為媒體工作的邏輯（media logic），此點顯然受到Altheide & Snow, 1979的影響。



求，因而必須制訂有效管理過程，有時甚至需以標準型式大量且及時生產新聞；此即新聞常規產生的背景。<sup>30</sup>

舉例來說，社會學家Tuchman發現「路線」是影響記者採訪常規之一。首先，媒體組織將社會真實分隔許多如魚網般地細格（news net），以便「鉤」住過往的資訊。次者，新聞媒體發展出科層組織（bureaucratic hierarchy），嚴密控制新聞產品的品質。隨後，媒體組織將記者分為各種路線（或分社），工作任務在於確保長久且定期地獲取路線訊息，甚至是獨家訊息。記者必須經常來往於路線中的重要機構，一方面尋覓新聞題材，訪問消息來源，再者則須判別事實真偽（facticity），決定新聞價值之高低。<sup>31</sup>

爲了達成這個傳統上稱爲「守線」的目的，路線中較爲重要的機構成爲記者每日聯絡的對象，定時拜訪。這些機構的共同特徵是以官方建制單位爲主，或是其他具有影響力之非建制機構（如大型領導企業或非營利性事業如宗教團體）。這種現象使得新聞內容長久以來被批評爲過於偏向官方或有權勢之消息來源，進一步加強了這些制式組織的合法性（public legitimacy）。<sup>32</sup>

另位社會學者Fishman曾歸納路線對新聞採訪的影響：第一，路線是記者的責任區（jurisdiction），記者守土有責。但是這些路線並非記者持有，而係由媒體科層組織內的上級人員（國內實務界習稱「長官」）所分配。第二，社會中每天出現不同話題與活動，但這些話題或

<sup>30</sup> McManus, 1995.

<sup>31</sup> Tuchman, 1978. Fishman, 1980, p. 51 曾指出，新聞媒體將真實世界視爲是科層化結構，卻也發展出相仿的科層化結構應對。Schudson, 1991a, p. 148的結論更爲有趣：新聞的中心，建立在政府的科層組織與新聞科層組織間的互動。

<sup>32</sup> 語出Tuchman, 1978, p. 22. 有關新聞報導偏向官方消息的檢討，見下節，此處先引Lee & Craig, 1992, 的看法。作者們認爲，媒體喜用官方機構可以用以下兩個角度討論：第一，大多數媒體本就自比擬爲與政府機構相近的社會經濟體系，任何有異於此體系的政治社會行爲均被視爲是對當權者的挑戰。這點在其他許多功能學派的論點中常見，媒體多自視爲維持社會秩序（social order）的機構。第二，由於上述理由，媒體喜歡將自己與政府機構看做是「自己人」，因而認同其政策。

活動常因路線相近而持續受到重視，長久之後逐漸形成「話題決定路線」的情況（如環保議題在眾多媒體中已成為單一路線），而與此路線不同之話題則失去新聞價值。第三，路線不但是責任區，更是記者的「社交圈（social setting）」，每日生於斯、長與斯。記者與路線中的消息來源互動親密，有時甚至在責任區中擁有寫字桌、電腦、電話、聯絡信箱、或擺設私人用品。記者因而成為路線的一份子，結交朋黨（路線中的主要消息來源或同路線之其他新聞記者），抗拒共同「敵人（如拒絕經常提供消息者或獨來獨往型之其他記者）」，榮辱與共。<sup>33</sup>

讓記者深入路線建立關係，可能自始就是媒體組織設置路線的主要目標之一，但長久常使記者與路線難捨難分：一方面記者成為路線中的圈內人，發掘許多外人難以得知的訊息，但另一方面記者又涉入太深，以致處處以圈內人自居，反而不願（或無法）再深入探尋問題，以免得罪消息來源。<sup>34</sup>

<sup>33</sup> Fishman, 1980. 喻靖媛、臧國仁，1995，的觀察訪問發現，路線與記者間的關係非同尋常。一般而言，受訪記者對某些路線上的消息來源「認同程度」高於同報社的高階主管、同組同事，甚至還超過學生時代的好友，心理上與這些消息來源產生極高「內團體感」。

此處所稱記者在消息來源處擁有辦公桌、電話等用品，在大多數設有公關室或發言人室的政府機構乃屬常態。記者在此地消弭時間，交換消息，並非台灣記者所獨有。冷若水，1985，頁69-70，曾如此描述美國國務院的記者室：「記者室內的電話，本來是由政府機構免費供應，後來因為記者們用來打長途電話，費用很高，卡特政府時期為了削減政府預算，就改為由各使用的新聞單位自己裝置」。

至於同一路線記者「共同抗拒敵人」之例子甚多，近者如台北市議會記者聯合阻擋議員「自肥條款」之通過。此外，記者協會出版之《目擊者》創刊號曾有農委會記者多人連署要求曾獲得口蹄疫獨家新聞之記者「不要過渡自我膨脹」，亦為一例。

<sup>34</sup> Gans曾解釋：「長久以後，記者成為政治機關的一份子，即使只是表面上，其採訪因而開始有所選擇，有時是有意而為，但大多數時候卻無法自覺」（引自Roshco, 1975, p. 113）。Roshco, 1975, pp. 113-4 認為，由於記者本係消息來源組織的「圈外人（outsiders）」，無法深入得到圈內資訊，使得記者常避免在報導提及有損於重要消息來源的內容，以免失去接近這些消息來源的機會。為防止記者過於認同路線，國內外新聞媒體通常

#### 四、消息來源

由以上討論觀之，路線常規似須搭配消息來源的配置一併討論。Meyers認為，每個媒體組織設立的路線規範雖有不同，但與路線消息來源保持密切互動的工作常規則大都一致。<sup>35</sup>此類文獻過去累積甚多，如Sigal調查美國華府地區的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的情形，並以《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的組織運作與新聞內容進行分析。Sigal發現，華府地區的新聞實際上是新聞記者與政府官員互動後的產物：一方面，新聞記者透過佈線定期與政府官員接觸，另一方面，政府官員也透過各種常規管道（routine channels，如公關稿、記者會等）散發資訊。Sigal的調查證實，在2,850件新聞剪報中，美國與外國政府官員合佔消息來源的比例近四分之三。<sup>36</sup>

Sigal的報告隨即開啓了一連串探討新聞報導如何引用消息來源的研究。Gans曾以十年時間觀察四個媒體（包括二個電視網與兩家新聞雜誌）的記者如何選擇新聞、如何處理外界壓力、以及如何形成新聞價值的判斷方式。Gans發現，所謂的「名人」（the knowns；尤其是官方人物）佔了新聞消息來源的七至八成。而名人中最具新聞價值者，首推現任總統，其次為總統候選人、聯邦政府官員等。有些犯人也可能名列「名人」，這種情形大都發生在他們涉入重大刑案或捲入政治醜聞中，或是傷害了其他名人。<sup>37</sup>

類似有關新聞工作者與社會名流結合的發現，在許多相關研究中都

---

均有輪調制度，但仍無法完全遏止，可參閱Hulteng, 1976，第六章之例子。

<sup>35</sup> Meyers, 1992.

<sup>36</sup> 此類研究甚多，如Smith, 1979, 發現新聞消息來源中有45.94%為政府官員；Walters, et al., 1989：33%為政府官方發言人；Entman & Rojecki, 1993, 發現，《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的頭版首頁幾全是官方菁英人士的說詞以及針對「隱形」社運者的回應；後者的活動僅能在內頁中看到。兩位作者認為，「民意」在這兩份菁英報紙中難以看到。

<sup>37</sup> Gans, 1979.

重複獲得證實。Whitney, et al.以一九八〇年代之電視新聞網為研究對象，發現72%為官方消息，86%屬男性人物。Brown, et al.以頭版新聞中出現的消息來源為例，也發現逾三分之一為政府官員。Smith分析317則電視晚間新聞，找出約近半數（45.4%）為政府官員。Weaver & Wilhoit則以美國參議員為研究對象，發現參議院中的領袖與資深參議員均較易成為新聞人員注意的焦點。<sup>38</sup>國內陳一香、劉蕙苓、鄭瑞城/羅文輝、鄭瑞城等人的研究也都有類似結論。<sup>39</sup>

至於記者慣用官方消息來源的原因，論者認為官方消息來源較為固定、好找，且官方發言較具「權威性」，使得記者樂於接受官方所界定的事實。<sup>40</sup>相對於企業而言，記者傳統上認為官方立場較「客觀」且無利益糾葛，因此習於將引述官方立場視為是專業意理的表現，或視為是新聞可信度的重要表徵。<sup>41</sup>然而這些論者亦多認為新聞媒體倚賴官方消息來源的結果，常使新聞報導過分支持現狀秩序（established order），

<sup>38</sup> Whitney, et al., 1989; Brown, et al., 1987; Smith, 1979; Weaver & Wilhoit, 1980.

<sup>39</sup> 陳一香，1988；劉蕙苓，1989；鄭瑞城/羅文輝，1988；鄭瑞城，1991。

<sup>40</sup> 此類文獻甚多，如Shoemaker & Reese, 1991, 曾歸納以下原因：官方機構較具便利性、能固定提供權威消息、提供方式較有效率、可協助媒體減低對昂貴專家之倚賴、亦可降低媒體對長期研究之需求、新聞專業意理認為官方消息較有效度、以及對獨家新聞之競爭壓力（如官方人事消息之宣佈）等。Fang, 1994, p. 478 則認為媒體喜用官方消息來源的原因為：政府消息來源易於接近、他們的發言可保證新聞中反映了官方說法、新聞記者傾向使用主流意識型態的觀點。Entman & Page, 1994, p. 97 則認為此種權威性就是對其權力的臣服。在Donohue, et al. 1995 的「看門狗理論」則悲觀地指出，新聞常規的設置已使記者屈服於有權勢者之影響。

<sup>41</sup> 類似說法甚多，如Woo, 1994; Cook, 1989。此處最為悲觀之描述，可能出自Tuchman, 1988, p. 612。作者引述Gans的論述後說，「警察決定了犯罪刑案的性質與情況，而非受害者或犯罪者；聯邦航空委員會決定了飛機場是否嚴重影響附近居民的生活品質，居民則無此權；福利機構定義了福利制度中的問題，而非福利受惠者。經由與這些中央建制單位的互動，新聞媒體接受了官方對事件的定義」。Pollock, 1981, 同樣認為記者在選擇新聞時易受消息來源的影響，久之認同消息來源的價值觀，視消息來源如同社會學中所說的「另類參考團體」。



或成爲政府御用管道 (handmaiden)，失去了新聞媒體監督政府的責任，或則輕視創新想法，甚至鄙視異議團體。<sup>42</sup>

另些學者卻認爲記者大量使用官方或菁英階級的消息來源，乃著眼於增加自己的社交地位。如Reese, et al.曾詳細分析記者與「名流 (elite)」消息來源的網絡關係，發現這些消息來源 (尤其是政府官員) 已因經常在媒體出現而自成一小團體 (an inside group)，彼此關係錯綜複雜，影響力遠超過其職位所及。<sup>43</sup>在Soley的專書中，更詳細描繪了這些「新聞塑造者 (news shapers) 的面貌。Soley說，新聞工作者大量使用名流消息來源，其目的並非爲了告知讀者任何訊息，而是爲了也想擠入這些權勢核心圈享受利益，因爲這些記者「原就是名流圈的政經以及社會網絡的一部份」。<sup>44</sup>

## 五、其他新聞常規<sup>45</sup>

除了上述討論的新聞常規外，學者們指出「平衡 (balance)」亦已成爲新聞組織最常使用的慣例。所謂平衡，McQuail曾定義爲新聞媒體

<sup>42</sup> Ericson, et al., 1995, p. 5, 曾闡述現狀秩序的基本原則有：第一，現狀代表了社會中「好或不好、健康與否、正常與否、有效與否」，此種判斷並非中立概念。第二，所謂「秩序」，隱指程序，也就是按既有且具慣例的步驟安排一定次序。第三，秩序亦指層次 (hierarchy)、身份、位置、階層、以及內容有別的差異，或按特別興趣、職業、個性等所產生的分歧。

<sup>43</sup> Reese, et al., 1994, p. 101. Tuchman, 1978, p. 68 則發現，對新聞記者的評價常建立在與消息來源的關係上，也是促使新聞記者名流化的原因：「某先生是本市最佳的政治記者，認識的消息來源超過其他任何記者」。國內記者也常因爲「有辦法」而被視爲是好記者，而所謂的有辦法，有時是指在重要時刻能找到消息來源提供獨家資訊，或證實某些資訊的正確性，有時卻是用來指稱記者能 (代替長官) 從消息來源方面獲得某些「好處」，如機票、車票、通行證、或甚至聯誼會的贊助商品。

<sup>44</sup> Soley, 1992, p. 143.

<sup>45</sup> 新聞常規究竟應包含哪些變項，迄今尚無定論。Gieber, 1964, 曾指出路線、截稿時間、與寫作方式是最重要的三者，本研究提出的項目雖超出Gieber，但並不表示此一項目可窮盡。

以相同的篇幅或時間投注於不同「立場 (side)」或利益或觀點。<sup>46</sup>如在報導核四廠建廠爭議事件時，新聞媒體訪問或描述不同立場之團體（如有意興建電廠之台電公司及反對者環保聯盟），讓雙方均得表達意見。

「平衡」原是新聞媒體服膺客觀性報導時所發展的評鑑標準，但是有時記者爲了達到平衡要求，甚至會故意建構反對立場，使得一些意見陳述成了「媒介指定的反對論述」。一些弱勢團體也常因立場與官方有異而得以快速獲得媒體注意，成爲最大多數的少數派，即使其意見並無內容。<sup>47</sup>Gitlin認爲，這種常規其實只是新聞媒體的霸權原則，目的在協助政經體系維持正常運。Tuchman則進而指稱，新聞（尤其是電視新聞）中的平衡是一種「黨與黨辯論」的形式。新聞記者習於尋找制式批評者，原因不過在於避免大眾以資訊壟斷爲由批評新聞報導內容，或避免其壟斷資訊的意圖廣爲周知。此種儀式性常規使得新聞內容趨於簡單化，事件真相常因此爲之不明或扭曲。<sup>48</sup>

此外，Tuchman亦曾以「時間」爲例，討論新聞運作中的組織常規。她認爲傳統新聞價值受到時間觀念影響甚鉅，如截稿的設限、新聞「快」報的發佈、對「突發」新聞的重視、廣播與電視新聞的鐘點播報、以及爲配合消息來源上班時間所發展的獨特新聞工作節奏（如爲了應付週日放假而預先撰寫存稿），在在顯示時間概念在新聞行業中代表了特殊意義，影響例行的新聞蒐集與寫作工作。<sup>49</sup>Schlesinger甚至因此指稱新聞事業反映了一種「馬錶文化 (stop-watch culture)」，隨社會

<sup>46</sup> McQuail, 1992, pp. 224-8.

<sup>47</sup> 語出Gamson & Modigliani, 1987.

<sup>48</sup> Gitlin, 1980; Tuchman, 1978, 1972.

<sup>49</sup> Tuchman, 1978. 作者在此書（第三章）中，分析人類社會生活如何受到時間思考面向 (temporal) 的影響，如早期農業社會的週期日曆與市集有關，而現行之七天制則與早年法國基督徒定期前往教堂禮拜有關。由此觀之，Tuchman認爲新聞工作是「因時作息」的行業：大部份記者早晚定時前往路線、定時與長官通話聯絡、主管定時開會預先聽取線索以瞭解當天發生之重要活動等。此外，Goren, 1989, 曾討論獨家新聞 (scoops) 對新聞常規的意義。



組織的運作時間習性行動。<sup>50</sup>

Schudson進而提出「時間節奏 (rhythm of time)」的概念，包含兩個重要意涵。<sup>51</sup>第一，所謂的新聞性實際上是建立在對「結果 (end)」的預期，如選舉新聞與投票結果有關，電視新聞中有關運動比賽之報導常僅有勝負紀錄，火災或重大刑案之報導常以「警方正進一步調查原因」作為結語。這種對「結果的感覺 (sense of an ending)」，進而促使新聞工作者在報導時特別重視結果對比，如在選舉中推測賽馬式的輸贏新聞報導，<sup>52</sup>或如每日列出股價的上升或下降、或揣測兒童已遭綁架或報導已被尋獲、或在社會新聞中大量報導兇手被警方緝獲或逃之夭夭等皆是。

Schudson認為，另一種新聞節奏表現在新聞媒體所提供的「文化曆」上：如在情人節前就有公開接吻的活動報導，元宵節來臨也就是花燈上市專題出現之時；過年初二提醒大眾要回娘家，元旦清晨要赴總統府前升旗致敬。雖然這類消息部份源於其他社會機構，但新聞媒體藉由定期、定量的處理方式告知社會大眾某種社會活動，使得與時間相關的事件成為例行性的新聞報導內容。<sup>53</sup>

<sup>50</sup> 有關Schlesinger之說法，引自Bell, 1991, p. 201。另可參見臧國仁與鍾蔚文，1997a，有關新聞與時間的討論。

<sup>51</sup> Schudson, 1986, pp. 7-9.

<sup>52</sup> 賽馬式新聞報導 (horse-race journalism) 乃在於強調事件 (如選舉) 中的輸贏策略、領先或落後情勢、或雙方如何扭轉頹勢等，而忽略候選人的資格、能力、政見、問政紀錄等「實質內容」 (Davis, 1990, p. 161, 稱少於三分之一)。過去有關選舉新聞的研究大都有類似發現，可參閱Hallin, 1992; Patterson, 1980。國內研究也有相似結論，見羅文輝與鍾蔚文，1992。

<sup>53</sup> Schudson, 1986, p. 1 認為新聞行業的時間壓力 (如獨家)，有一大部份是來自於內部組織或新聞人員的行規，其實讀者或觀眾並不特別重視。而新聞人員關心「即時性 (immediacy)」，不但是「錯誤儀式行爲」，也是對「即時性的一種職業戀物癖 (fetishism of the present)」。此外，新聞媒體使用的文化曆還可包括定期提供的版面專題規畫，如週一是家庭生活，週二是醫藥保健，週三是讀書出版，週四是男女情趣等，這種分類方式強制將新聞運作規律化，也是內部常規的一種。

在個人層次，Shoemaker & Reese認為「倒寶塔寫作（inverted pyramid writing）」亦是新聞常規之一，實施目的旨在藉此傳遞並指稱消息的重要部份，以免閱聽眾忽略。<sup>54</sup>王洪鈞曾解釋：「新聞寫作必須把一些事情的精華，放在最前面，次要的放在後面，再次要的放在最後面，依次類推，到最不重要的，放在末段。這種形式恰像一座倒置寶塔，故稱為倒寶塔式」。<sup>55</sup>

以Ettema & Glaser的論點觀之，倒寶塔寫作只是「新聞語言（"journalese"）」的一部份，是新聞工作者的一種敘事策略，旨在將外在真實世界之龐大資訊整理為有秩序地故事結構。Roeh（1989）則稱，新聞報導本就是記者將「所知」轉化為「已知」的敘事行爲，其間除了隱藏有記者的自我判斷與選擇，還包含一些標準化的故事結構。<sup>56</sup>

除了倒寶塔的寫作策略外，類似新聞固定結構尚有廣播、電視與文字新聞的長度限制、電視新聞以畫面及廣播新聞以聲音強調現場感、使用簡短且直接的句法、新聞寫作內容的擬人化（personalization）等。<sup>57</sup>新聞工作者習採類似小說寫作中的「全觀敘事（omnipresent narrator）」角度執筆，<sup>58</sup>以凸顯客觀報導身份，藉此吸引讀者閱讀或

<sup>54</sup> Shoemaker & Reese, 1991.

<sup>55</sup> 王洪鈞，1986，頁38。

<sup>56</sup> Ettema & Glaser, 1990, pp. 3-5; Roeh, 1989.

<sup>57</sup> 如廣播新聞播報一般長度約為四十秒，而電視新聞約長九十秒。中文報紙純淨新聞長度約為六百至一千字，而社論文字則可多至二至三千字。Hallin, 1992, 曾經調查1968-1988年間美國電視新聞網報導總統大選的新聞時間，發現平均長度自1968年的每則六十秒減少到1988年的九秒，顯示了電視記者建構新聞的主動性正逐年增加，新聞內容不再是消息來源主控的局面，而是記者用來與其他形象與聲音的組合。Hallin因此說，現在的新聞故事較以前更加成為新聞記者導向，候選人或其他消息來源都成了次要的行動者。

所謂擬人化，Davis, 1990, 曾指出，新聞內容大都以人物為描寫對象，對議題或組織則少有長篇累牘。此外，新聞亦以戲劇化見長，此在新聞價值中習稱「人情趣味」，或在災難事件後強調社會回復正常化（normalized news）。見Ryan, 1991, pp. 141-164。

<sup>58</sup> 所謂「全觀敘事」之意，即「以單一角色無法觀察但敘事者卻可遍視的方式，同時在各地關照（Graddol, 1994, p. 140）」，如立法院記者將不同委

觀賞的興趣，也是常見之寫作行規之一。如Graber的研究曾發現，電視新聞極為強調故事的戲劇性，包括使用特寫鏡頭或面部近照、表現受訪者的身體語言、強化事件中的爭議部份；超過三分之一的新聞故事甚至故意呈現事件主角的情緒互動；類似手法同樣可以在印刷媒體的視覺表現中（如報紙新聞照片）出現。這些敘事策略的使用雖可增加新聞報導的可信度，但是新聞記者的第三者角色也常使事件與其原始時空背景脫離（decontextualization），使得讀者在無法自覺的情形下，誤以為新聞事實就是社會真實。<sup>59</sup>

最後，Schudson曾引述Gans的觀察，認為新聞記者習慣性地會在寫作時判斷「讀者興趣」，但大多數時候這些「讀者」都只是一些隱藏對象（implied objects）；新聞記者其實對讀者瞭解很少，也不清楚這些讀者的真正興趣。又如Gans曾稱：新聞工作者「極少【真正】關注讀者，基本上他們僅關心媒體內的上司或自己的興趣，並假設這些興趣就是讀者的興趣」。有時候，記者寫稿時所稱的「讀者興趣」，其實是一種寫作策略（或規範），旨在向提供消息的受訪對象交代，期望未來能獲得更多資訊，或向消息來源暗示已掌握更多資訊，未來是否繼續揭發報導，端視兩者彼此信賴程度。<sup>60</sup>

## 六、小結

以上簡介了新聞定義與媒體運作的部份常規。基本上，此節文獻顯示，新聞學界與實務界大多將「新聞」定義為新聞媒體所產製的成品，而影響此一產製過程的主要因素，分別為新聞工作者對事件的評斷（或稱新聞價值）與新聞組織內部對產製過程所進行的控制（即新聞常規）。此外，傳統新聞學曾深入討論新聞產製流程，並針對新聞素材

員會之立委的發言納入同一篇新聞報導中。藉由此種手法，記者可以決定將何者推到台前（foregrounder），成為新聞重點，或何者應成為幕後者、配角或回應者。

<sup>59</sup> Graber, 1992.

<sup>60</sup> Schudson, 1991a; Gans, 1979, pp. 238-9. 相關討論可參見陳順孝與康永欽，1997。

(raw material) 流動的方向、數量、與選擇機制分別進行研究（如守門人、新聞偏向、以及新聞因素研究）。這些論點大都暗示了新聞行業屬於一種專業文化，從事此項工作者擁有判斷社會事件的特殊能力。即使位處不同媒體組織，只要工作性質與新聞有關，就可能共享價值相近的集體觀（groupthink），包括對新聞取捨與選擇的判別、對新聞倫理道德規範的尊重、以及對蒐集與組合資訊的能力等。<sup>61</sup>

下節將首先批判上述研究取向，並提出以建構理論為核心的新聞框架觀。此處基本想法係認為新聞媒體是符號真實的一種，其功能在於轉換或再現真實。而新聞媒體組織為了完成此一任務，必須發展組織框架，選擇並組合外在資訊，因而成為社會力量競爭之場域。另一方面，新聞工作者受制於認知結構之限制，經常會根據過去經驗與知識基礎建立轉換真實的思考基模，從而設定目標與計畫，並反映於新聞訊息中的文本內容。因此，新聞文本亦為具有多層意義之框架結構，分別展現於主題、句法、情節、修辭、與用字中。

---

<sup>61</sup> 有關守門人的研究經常發現，「守門人先生（Mr. Gates）」有其特殊文化價值觀，如Hirsch, 1977, 曾討論新聞編輯挑選之社會事件內涵相近。Shoemaker, 1991, 以社會心理學者Janis所創之「集體觀」檢視守門人行為，發現新聞工作者在面臨相同常規限制時，的確擁有類似世界觀，如所謂的「包裹新聞（pack journalism）」採訪方式就是此種集體表現。



## 參、新聞媒體與社會真實

### 一、對傳統新聞定義的省思

依上節描述可知，傳統新聞學之研究或可謂源自早期對守門人概念的探索，因而學者慣將「新聞」定義為新聞工作人員根據一套外在標準（新聞價值）以及內在工作程序（組織常規）所生產的資訊成品。此類研究認為，在新聞產製過程中，新聞工作者經常受到來自資訊提供者之直接干預或間接影響，新聞行業因而逐漸發展出道德倫理規範，藉以維持資訊內容之品質；這套倫理規範通常被稱之為「專業意理（professional ideology）」。<sup>62</sup>如Philips曾說明，「客觀性報導」原則包含了記者不受證據、來源、事件、及閱聽人的影響，只講求公平、平衡、公正、及完全公開等崇高理想：<sup>6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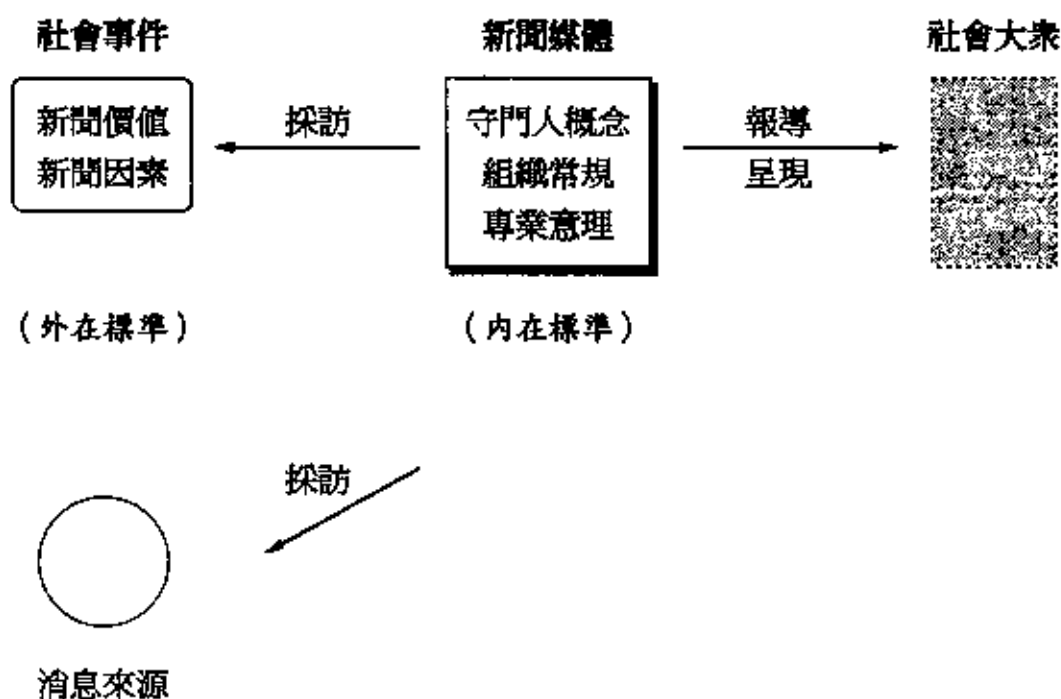
在各傳播機構中，新聞事業對公眾領域的影響最大。……  
【但是】新聞記者要如何合理地扮演大眾社會中的非官方詮釋、專家？又要如何保衛對此角色正當性的挑戰呢？多年來，客觀習性（conventions）或信條（canons）就是一種防衛設計，模糊地以新聞採訪與編輯的平衡、公正、無偏無私、正確、與中立原則，做為保障新聞工作人員正當權威的利器。

李金銓曾引述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中立理念，說明該公司提倡不偏不倚的專業意理，乃在「假定……【新聞工作者】可以站在一個更高、更超脫的視野，可以擺脫英國社會的種種衝突，所以可以做到獨立超然的地步」。<sup>63</sup>

<sup>62</sup> Philips, 1977, p. 63; 插入語句為本文作者添加。

<sup>63</sup> 李金銓，1981，頁50（插入語句為本文作者添加）。Schiller, 1981 與 Schudson, 1986, 均曾探析客觀原則與報業發展史之間的關連。兩位作者的

這種要求新聞必須達到中立、客觀、與平衡的說法，進一步促成了「新聞專業化（professionalism）」的理想，形成上節所述有關「新聞常規」的主要內涵，並直接影響了新聞記者對新聞價值的判斷（參閱〈圖一〉）。美國著名新聞評論家Hess曾說，新聞媒體的最重要功能就在客觀地扮演守門人的角色，協助閱聽大眾選擇值得注意的重要議題。彭家發甚至認為，客觀性原則不但是新聞報導的「專業貞操」，也是新聞學中最重要的專業信條，更是新聞專業立意甚高的價值觀，「容不得蹂躪，容不得污蔑」。<sup>64</sup>



圖一：傳統新聞學對新聞之定義\*

- \* 此圖試圖呈現傳統新聞學對新聞產製之看法，包括：新聞媒體客觀報導社會事件供讀者瞭解社會真相，其工作受到新聞媒體的守門人意理、組織常規、以及專業道德規範影響。消息來源在傳統新聞學理論中，被視為是提供新聞資訊者，具有影響新聞公正報導之意圖。由於本文未討論「社會大眾（讀者）」部份，此處以虛線表示。

結論相仿，即客觀原則是報業為了迎合都市讀者所發展的行銷策略，旨在擴大訴求與減低開銷。客觀原則既可以滿足都市中背景差異較為廣泛的讀



然而，新聞報導是否能達到客觀、中立、或者平衡的要求？新聞守門人概念是否有思考邏輯的限制？過去論述甚多，以下試予討論。

首先，有些學者們認為所謂的「客觀主義」其實是本世紀以來美國實證社會科學思潮的產物，也是「社會學最後的實證園地」，<sup>65</sup> 接近早期對「鏡子理論 (mirror metaphor)」的看法，即新聞媒體之主要功能在於反映真實、報導真相。然而就如Buonnano所述，鏡子理論的觀點表現了一種「可見的謬誤 (fallacy of transparency)」，過分天真地假設社會事件能如鏡子般地在新聞媒體中完整反射或具體呈現。<sup>66</sup>

---

者，此種寫法也較不會攻擊對任何組織成員，因而較不易引發訴訟。然而兩位作者也指出，客觀新聞的標準仍有選擇性，有些較為客觀，有些則否（如新聞價值的選擇就較不客觀）。嚴格來說，新聞實務界人士較堅持其成品均為客觀之作，學界人士則較不苟同。

<sup>64</sup> Hess, 1996; 彭家發, 1997。Liebes, 1994a, 在分析「摩西與其使者」的文獻中表示，有關記者是否應該客觀報導的爭辯並非現代社會之產物，早在古聖經時期就已成爲政治領袖與民眾互動的重要議題——傳話者 (the messengers) 究竟應該尊重事實代領袖傳話，或是站在受訊息影響的民眾角度並無定論。但這些使者常因爲加入意見或暗諷 (insinuating) 而遭領袖處罰，因此促使他們「保持成立」以避免災禍上身，Liebes因而認爲，客觀與中立問題長期與報導者糾纏不清。

<sup>65</sup> 見Koch, 1990, pp. 18-19. 有關「新聞客觀報導」論辯的較佳闡述，首推彭家發之研究，1994a, 1994b, 惜作者旨在分析，並未提出個人意見與針砭。另可參見Westerstahl, 1983, 嘗試將新聞客觀概念化之討論，以及McQuail, 1992, 第十四至十七章對客觀概念所提出之整理。兩者均具參考價值，但仍未解決客觀概念難以測量之困境，可參閱Hemanus, 1976, 對客觀概念可否測量之評論。

<sup>66</sup> Buonnano, 1993. 此地所稱之「可見的謬誤」概念，可參見Roeh, 1989, 之討論。作者強調，西方新聞學最大的錯誤，就是認爲「【新聞】語言乃透明」可以反映真實，或者認爲新聞記者的天職就是報導「事實，所有的事實，只有事實 (the facts, all the facts, nothing but the facts)」。作者提議將新聞視爲是一種客觀的修辭，回到人類表達活動的範疇中討論新聞的故事性 (story-making)。因此，新聞記者必須承認其報導內容展現的語言力量是一種「模仿的言說 (mimetic discourse)」，描述了真實世界的活動但非真實世界的反映。即使記者能夠提供事實，也只具「受了污染的可見性 (polluted transparency; transparency亦可解釋爲「透明」)」。

Buonanno認為，新聞媒體即使能被視為是一面鏡子，也是變形失真的鏡子。李金銓甚至直呼將新聞媒體當做中立的鏡子是「太簡單的神話」，亟須加以「戳破」，因此提倡「破碎的鏡子理論」。<sup>67</sup>翁秀琪等的近作進一步解釋了有關此一論辯的重點：<sup>68</sup>

傳統新聞學強調新聞客觀性，同時認為新聞的呈現需符合如時宜性、接近性、顯著性、影響性及人情趣味等新聞價值，且多半採取自然科學對於知識的看法，認為這些新聞價值是原本就附著在這些新聞事件上的特質，記者的工作就是去發掘這些附著在新聞事件上的新聞價值。這種新聞選擇的模式被稱為「功能模式」，新聞報導的責任就是盡量地去反映新聞事件的特色……。

近年來有許多學者主張從解釋社會學的觀點來看新聞報導和新聞事件之間的關係，……將現象學、知識社會學以及人類方法學的哲學思考及理論融入……對新聞的觀點之中，將新聞視為主、客觀辯證關係中產生出來的社會真實。

在這樣的觀點下，新聞記者在報導新聞事件時，一方面受到社會結構（例如傳播政策、媒體組織、佈線結構等）的影響，一方面記者也透過專業化過程將某些意識型態（例如客觀報導、新聞價值、新聞類型、消息來源等）內化為日常工作的工作規則，並主觀地透過上述的工作規則來建構新聞。所以，新聞是在主、客觀辯證過程之中所產生的社會真實，是社會真實的一部份。

翁秀琪等的說明點出了客觀新聞主義的缺失，強調新聞不但是依據社會真實所建構的產品，這個產品隨之也成為社會真實的一部份。這種說法固然指正了傳統新聞學對客觀主義過於神話式的崇拜，但臧國仁仍

<sup>67</sup> 李金銓，1981，頁81。

<sup>68</sup> 翁秀琪等，1997，頁2-3；引號內為原作者所有，斜體為本文作者添加。

認為傳統新聞學獨尊客觀主義其實更是一種倒果為因、誤將手段視為目的的結果。<sup>69</sup>換言之，雖然邏輯上新聞報導或許可以追求客觀性，但由於新聞是記者們思考後的結晶，任何思考都無法做到客觀要求，頂多只能達到「存有主觀而邏輯客觀」的地步罷了。

簡言之，客觀信條與其他專業意理可謂均源自實務工作的需要，<sup>70</sup>隨後成為守門人等新聞概念的基礎。但此類研究多年來猶無法建立任何學術理論以解釋、澄清新聞實務工作如何得以客觀、中立、或正確報導，此為先天之不足。<sup>71</sup>此外，研究者關心新聞選擇與判斷等機制，曾多方討論如何防止這些選擇與判斷機制受到外界（消息來源）干擾與影

<sup>69</sup> 臧國仁，1995a。傳統新聞學理論習慣將客觀原則視為是一種標準、目標、或準則，如黃新生，1990，頁30-31，曾如此描述：「簡單的說，客觀性代表一種理想或信念……客觀性所代表的信念，就是相信『事實』，崇奉『事實』……新聞報導的客觀性，不僅是一種信念，而且也是一套實際的作法。為了達到客觀報導的目標，新聞機構與記者在蒐集、採訪、報導新聞事實時，經常採行以下幾個作法……這些作法，行之多年，漸漸成為新聞製作的例行程或慣例」。Molotch & Lester, 1974, p. 54, 則強調，反對「新聞客觀」並非因為媒介無法客觀報導，而係因為並無客觀世界可供報導。兩位作者認為，新聞工作者所報導者，僅係「有權力者所決定之他人經驗」。

本研究則以為，客觀目標難以達成，將客觀視為「手段」或作法則較可行。未來應試將客觀原則視為組織常規，而非行業準則，方能解除手段與目的混淆的情形。

<sup>70</sup> 彭家發，1994a，頁24，曾引述文獻追論客觀報導的興起，與十九世紀中期電報的發明以及美聯社的誕生有關：「當時各報的報導立場不同，使得美聯社不得不採取中立、平衡的客觀寫作方式提供稿件，因為唯有如此，它的報導才能為各種報紙採用，降低生產成本」。

<sup>71</sup> Philips, 1977, 認為社會科學研究者與新聞記者兩者的知識基礎不同，採集資訊的方式也不盡相同，研究者無須接受「新聞必然客觀」此一說法，因為有關真實的解釋可以多樣。羅文輝等，1996，進行新聞正確性研究，結論亦是主觀正確性難以查證，未來研究應放棄主觀錯誤這個概念。Roeh, 1989, p. 163, 認為舊的【客觀】典範無法更新，錯在學術界吝於改頭換新：「客觀信條不斷受到質疑，但是學術言論似乎抱持著好自為之的態度（facts-that-speak-themselves）。……舊的典範依舊存在，許多研究仍然重複老套問題而復入死巷」。

響，進一步加深了「客觀」信條的崇高地位。在此同時，研究者忘卻新聞報導的目的乃在於再現（representating）或轉換真實，客觀或中立與否實係轉換過程中的「手段」問題。以手段（客觀主義）駕馭目的（再現真實），難怪新聞學研究逐漸陷入封閉性思考的泥沼。<sup>72</sup>

另一方面，新聞專業意識發展的結果，也使新聞媒體在資訊產製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斷為之誇大。如英國社會學者Schlesinger以及Blumler均抨擊傳統新聞學者過於哀情於新聞媒體對新聞產製的影響力，可謂之為媒體獨大的情懷（media-centrism），忽略了其他社會變項如消息來源、議題情境、或甚至政經環境亦對新聞走向具有關鍵性引導作用。<sup>73</sup> 傳播學者Gandy曾指出，傳統新聞理論（如守門人概念）過度渲染新聞工作者個人的專業自主決策，未能將其他社會組織與機構（如消息來源）在新聞判斷中的角色一併納入考量，也是造成新聞行業過於迷信「第四權」的主因。<sup>74</sup> Staab引述德國學者Schulz的說法，認為新聞報導只不過是社會真實的「一種」解釋，且僅是新聞工作者對真實的詮釋

<sup>72</sup> 將「客觀原則」視為是新聞工作「目標」之著作甚多，但本文主要論點是，新聞研究者無須跟隨實務工作者強調新聞客觀性，而應就新聞的不同面向討論其理論內涵。Bird & Dardenne, 1988 亦有類似想法，強調新聞研究應捨棄傳統客觀思考，試圖從敘事角度討論新聞如何傳達文化意義，即使實務者認為報導重要或有趣的事是新聞工作者的天職。研究者應跳脫實務工作的羈絆，如人類學家般地從多面向探究新聞的深層意義，始能建構理論，擺脫技術導向。

<sup>73</sup> Schlesinger, 1989, 1990; Blumler, 1990. 作者們指出新聞系統過去常誇大其作業能力，如強調數新聞選擇的三個因素分別是：事件本身的特性、新聞產製過程中的技術與經濟因素、媒體的編輯方針或記者的專業意見。此種觀點代表了一種以記者為中心的解說（journalists-centered theories），或以媒體為中心的傾向（media-centered orientation），過分強調新聞為新聞工作者判斷的結果。這種論點的極端想法，即促成了專業訓練的風潮，及專業行規的建立。另可參見李金銓，1981，前三章之討論。

<sup>74</sup> Gandy, 1982. 社會學者Schudson, 1991a, 曾批評守門人觀點以及其他傳統新聞學理論簡化了新聞工作的複雜性，他認為新聞實非由新聞記者選擇產生，而係眾多社會組織建構而來。Herman, 1985, 指出，守門人研究風來很少討論媒體實際表現對意識型態的影響，缺少以「動態」形式討論媒體如何動員民意，忽略以「外部途徑」或資源討論新聞流程。



與看法，無法代表客觀真實的「正身 (Ding an sich)」，<sup>75</sup>直接反駁了「新聞就是真實」或甚至真理的傳統觀點。

對傳統新聞學最強烈的質疑，應屬文化學派論者。如Hall即曾挑戰說，「新聞價值」可能是現代社會最難以理解的意義結構。「所有的記者理應掌握新聞價值，但只有少數能說明清楚其內涵為何。記者們普遍認為事件決定新聞性……這種觀點使得我們好像面對了一個深奧且不透明的選擇機制」。Hall反對新聞媒體有獨自建構社會真實的力量，傾向認為媒體僅能「忠實地以符號再現社會既有組織權力與秩序」，也就是反映社會中的「可信度階層 (hierarchy of credibility)」，使得有地位者較可能在媒體上表達意見，並使其有關事件的定義為各方接受。<sup>76</sup>

由此，Hall提出了著名的「首要界定者 (primary definers)」的概念，強調這些社會中享有權力者才是意義的決定者，而新聞媒體不過是被這些人引入 (cue in) 社會爭議中，根本無法自動自發地討論議題。美國學者Ettema & Glasser引述Hall的觀點，認為新聞並無寫實效果 (naturalistic)，僅具自然化 (naturalized) 社會真實的能力：「【我們】對新聞的幻覺，乃建立在認為語言具有誠實反映 (reflect) 或反射 (mirror) 事實的能力」。<sup>77</sup>

近些年來，部份新聞研究者轉持較為「開放」觀點，承認新聞媒體的影響力必須與其他社會機構共享 (shared responsibility)。<sup>78</sup>即連首

<sup>75</sup> Stabb, 1990, p. 426. 有關「正身」之德文譯名，取自翁秀琪等，1997，頁6。

<sup>76</sup> Hall, 1981, pp. 234-5. 下段將primary definers譯為「首要界定者」，應較能回應原意。

<sup>77</sup> Ettema & Glasser, 1990, p. 4 (插入語句為本文作者添加)。此地將naturalized譯為自然化，係蒙方孝謙教授之指正，謹致謝意。「自然化」之意，在於說明新聞報導為了讓讀者趕到內容真實，常以不同機制影響其可信度，如電視新聞喜用「現場報導 (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而平面媒體則常採用引述消息來源的方式，讓讀者「以為」新聞真實就是原初真實。

<sup>78</sup> 所謂「共享責任 (shared responsibility)」，如Ericson, et al., 1991, p. 349, 認為在電視新聞報導中出現最多次數者是新聞記者與政府官員，這兩類人士主控了大部份的消息來源類目 (如所有新聞都出自主播的描述)。

倡議題設定效果之McCombs亦在近作中重新審視新聞媒體與其他社會組織之互動關係，改將此一互動情形比喻為洋蔥形狀：內層核心令人刺鼻者是新聞媒體之基礎概念（如新聞價值、新聞實務、職業傳統），而外皮則包括消息來源與事件本身的影響力（如爲了新聞而製作的假事件）。<sup>79</sup>此外，早期研究新聞守門人與消息來源之Sigal亦稱，「新聞終究不僅是新聞記者所想，也是消息來源所說，且受到新聞組織、新聞常規、以及社會習俗之影響。……新聞不是真實（reality），而是消息來源對真實的描述，受到媒體組織的影響」。<sup>80</sup>

## 二、新聞與真實

以上討論了有關新聞流通的基本概念與省思。簡言之，新聞學者過去接收了來自實務工作者的經驗，將新聞報導單純地視作是真實的反映，因而提出了類似客觀、中立、正確等信念，建立了早期新聞學理論的核心知識。但正如Spitzer之觀察顯示，此類說法無法洞察亦無法解釋新聞媒體如何與其他社會組織互動，更難以澄清新聞與真實之間的複雜關係。研究者因而需要發展其他理論模式，以不同方式觀察新聞內涵，重新省思新聞媒體如何與其他社會成員建立傳播網路。Berkowitz在近期出版的《新聞之社會意義（Social Meaning of News）》一書中曾大膽

作者因此說明，新聞記者經常是電視新聞中的唯一知識來源，記者的自我指認（self-referential）是新聞常態，新聞其實不過是新聞記者與官員之間的公共對話罷了。類似說法亦可參見Bell, 1990, p. 191（新聞就是權威消息來源告訴記者【的故事】）、Gans, 1979（新聞並非事件之發生，而是消息來源對事件之描述）、以及Shoemaker, 1991, p. 10（除了新聞記者確認與選擇消息來源的過程是新聞守門人的重要部份，消息來源的涉入利益（vested interest），也會影響哪些消息可以對媒體工作者公開）。

總之，如Gans, 1979, 所稱：「新聞就是由消息來源到閱聽眾的一種資訊轉換，由新聞記者摘錄、框架、並設法使資訊適合閱聽眾接收。…消息來源、新聞記者、閱聽眾在系統中共存（co-exist），雖然三者間較像是一種拔河競賽而非僅是功能互動的組織」。

<sup>79</sup> McCombs, 1994.

<sup>80</sup> Sigal, 1986.



指出，未來新聞學研究應努力拋棄三個傳統錯誤概念：即新聞工作者能客觀報導、新聞價值乃自然依附於社會事件、以及新聞能反映真實等。

81

無可否認地，新聞報導中呈現之社會事件的確是社會真實的一部份，而新聞記者秉持其專業意理嘗試忠實反映真相，也有其社會功能。如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B. Clinton）曾如此「勉勵」新聞工作者：「報導正確、公正、讓事實自己說話，減少對動機與過程加以過多描繪（characterizing）。提供美國民眾訊息時，不必低估他們的智識或對答案的渴望」。<sup>82</sup>然而新聞報導如何才能做到客觀、公正？如何讓事實自己說話？誰的事實？這些都是新聞學中尚待釐清的問題。

如前節所述，傳統新聞學過去習將媒體與社會組織的互動關係化約為以客觀原則為代表的專業意理。此舉固然省略了處理新聞真實與社會真實的「真偽」難題，但是新聞報導能否涵蓋所有社會真實？涵蓋哪些部份的真實？為何僅涵蓋這些真實？遺漏之處係因記者個人之專業判斷，或係其他因素影響所及？不同新聞組織與新聞工作者如何透過符號系統呈現真實？其他社會組織與個人如何與新聞記者互動以彰顯其所認定之真實？新聞媒體又如何判斷不同組織與個人所提供之言說的真實性？這些問題在傳統新聞理論中鮮少討論，但卻均屬影響新聞如何定義的核心知識。

何謂真實？依據Davis轉述社會建構理論的解釋，社會真實原本混沌模糊（ambiguous social world），難以體察；而個人、物體、或行為均各自獨立，無所歸屬。<sup>83</sup>人們必須透過賦予這些社會人造物件

<sup>81</sup> Spitzer, 1993; Berkowitz, 1997.

<sup>82</sup> Clinton, 1996, p. 6.

<sup>83</sup> 見Davis, 1990. 有關何謂真實之討論，大都以現象學者A. Schutz, 1962之真實論為基礎。簡言之，Schutz認為我們日常生活的真實就是最重要的一種真實（one paramount reality），包含以下假設：真實是一種沈靜而自然存在的世界，可實際操作，且具相互主觀性。其他真實（如科學真實或人們的冥想世界）的確存在，但都源自生活真實。

現象學者Berger & Luckman, 1966, 對真實的解釋亦常被引用。作者們認為客觀與主觀真實乃並存現象，除了我們所認知的真實世界以外，另有客觀

(artifacts) 某種意義，始能探知其來源與存在之因，以及與其他社會物件之關連性。然而這種意義的產生必然受到時空情境 (context) 影響，使得在甲時間或甲地點具有的意義，在乙時間或乙地點出現了不同的詮釋內涵。因此，社會建構學者認為意義本身並無定論，須要不斷透過論述行為 (discourse) 重新加以具象化 (reification)。<sup>84</sup> 人們通常忽略社會人造物件的意義具有此種情境特質，而習以舊有知識觀察並思考社會行動，以致無法脫離社會主流意識的影響，也難以跳躍建制組織 (如政府機構) 在意義設定的過程中所提供的有形或無形成規與體制 (institutionalization) 。Davis & Robinson 因而指稱，人們喜以常識經驗 (commonsense experience) 處理事物，誤將言說意義與社會真實劃上等號，或慣將建制化後的成品視為是事實 (truth)，因而失去批判思考的空間。<sup>85</sup>

嚴格來說，建構學派與前述以英國學者Hall為代表的文化思潮略有不同。兩者雖然均延續了詮釋學理論的精華，認為「意義」無法放諸四海而皆準，受到情境因素影響甚鉅，但建構學派對「現狀 (status quo)」較無異議，也未提供其他替代方式，僅強調人們是社會真實的行動者而非被動呼應社會行為，因此會透過不斷創造、證實、修復、以及改變等動作建立社會真實。社會真實因而同時包含個人的詮釋過程，以及個人與社會以及與文化情境之互動建構行為。<sup>86</sup>

社會建構學者在提出「社會真實均由建構而來」的說法後，接著強

世界乃超越我們所能觸及。每個人對外在世界之詮釋均有不同，而此種對世界的詮釋會影響個人對自我的感官、對他人的關係，以及其行為之形式。在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中，人們創造、再造、並適應各種對真實的定義。因此，真實並非身外之物，也是人們感官與社會互動所締造之現象。Berger & Luckman 同時認為，人們的交談 (conversation) 是最重要的真實創造活動，透過語言，我們既瞭解又創造了真實世界 (以上說明引自 van Zoonen, 1994)。相關說法可見 Searle, 1995。

<sup>84</sup> "Reification" 原意為「將抽象意旨具體化的過程」，此地延伸做「具象化」解釋。此處借用建構學派之說法，認為意義乃視情境而有不同言說解釋，暗示了語言與意義之間具有從屬關係。見 Davis, 1990, pp. 159-160; Davis & Robinson, 1989, pp. 68-69.

<sup>85</sup> Davis & Robinson, 1989.

調人們須透過語言或其他中介結構來處理社會「原初真實」(raw material)。<sup>87</sup>建構論者認為，對語言的理解須視情境而定，不同組織或社會在不同時空對語言的詮釋並不相同。因此，對真實的理解也因特定時空中的語言形式而有所差異，而知識穩定性(stability of knowledge)也因而時有興衰浮沈，無法單純地從經驗世界瞭解事實的意義內涵。建構學者延續形象互動論的觀點，認為個人行為以及與他人的互動乃透過符號的使用形成意義(meaning-making)，人們藉此脫離被動回應者的角色，主動積極地參與了創造社會真實的過程。<sup>88</sup>簡言

<sup>86</sup> 此一比較建構學派與文化學派之意見，引自Delia, et al., 1982. Hall, 1997。認為，建構學派對物質世界與符號(形象)世界之區分十分在意。所謂物質世界，就是此地所稱之社會真實世界，或張錦華, 1991, 所稱之「原初真實」，也就是人們與萬物存在之處。建構學派並不否認社會真實，此點與符號學者Fiske的說法有異，後者認為社會真實乃與主觀真實類似，均由符號建構而來。見下註。

<sup>87</sup> 譯名取自張錦華, 1991, 頁177(張氏將reality譯為事實)。張錦華先引Hall的觀點，認為世界的確存在著原初事實，接著引述J. Fiske的論點，為人們所經驗的世界卻非此一原初事實，而係透過中介結構所得到的另種認知。張氏批評Fiske的意義結構論是一種激進的看法，模糊了符號與實之間的界限，使得人間所有意識型態不過都成了「意義的遊戲」。

<sup>88</sup> 引自Littlejohn, 1989, pp. 111-112. 值得注意之處，乃作者在介紹各類傳播關理論時，雖然將形象互動論與建構論分章討論，但承認兩者須合(should be read as a unit)。此地引自前者，但其意義應可涵蓋建構論。陳秉璋, 1985, 頁338-9, 對形象互動理論所做的整理，有助於我們此處討論。陳秉璋認為形象互動論的思想淵源有下列諸向：真實(reality)事實(truth)並非外在存在於真實世界，價值的判斷是對個人有用與否考量，個人依據適用價值定義他所遭遇的社會及物質客體，我們只有由實際行動始能瞭解行動者。van Zoonen, 1994, 則引用多家說法，認為「語言並非純是真實的反映，而是真實的源頭(source)」，此點看法與形象互動論者之觀點不同。van Zoonen特別說明此說並不反對社會真實存在，而是「我們對真實的意義以及瞭解必須透過語言達成」(p. 39)。Van Zoonen並稱，語言不應只被視為是文法或詞彙的組合，其重點是「言說(discourse)」，包含了主題與符號意義的表達在內。「語言：建構真實之物，在特定文化與個人歷史、系統、價值中如何表達才」(p. 39)。



之，建構學派強調「社會組織長期互動後產生意義，互動也會建立、維持、或改變特定組織或文化中的角色、規範、或意義」。<sup>89</sup>

依Parisi之見，新聞與傳播正是社會文化中的一種故事傳述活動，維繫了社會生活中的價值、界限、與定義。Parisi認為，「真實」乃一種建構的符號活動，世界並非由「物質」所組成，而係語言意義的組合，新聞與其他符號行動如「儀式」、「戲劇」、「神話」、「敘事」均是創建社會意義的重鎮。Kennamer繼而指稱，在所有語言或其他中介結構中，新聞媒體扮演了轉換社會真實為符號意義的核心角色。<sup>90</sup>首先，新聞媒體所刊載的內容並非社會真實的客觀反映，而係社會建構的產物。雖然新聞報導的確討論了發生在真實社會的各種事件，但是由於社會事件原本就包含多種面向，而新聞媒體限於版面或截稿時間，只能就多種面向中取出少數加以描述（此即框架事實的過程），因此新聞媒體無法完整呈現社會真相，此乃可以理解之事。<sup>91</sup>

<sup>89</sup> 引自Littlejohn, 1989, p. 95. Neuman, et al., 1992, 曾提出建構主義下的政治傳播學所包括的重要觀點為：1. 閱聽眾主動且積極地詮釋各種社會現象；2. 閱聽眾與媒體文本間有互動性，傳播乃「交換」而非「影響」；3. 傳播內容有「互異性」，即不同議題會由不同媒體或個人加以解釋而具不同意義；4. 建構學派重視媒體機構的歷史、結構、與技術特質；5. 建構學派關注常識（common knowledge）而非民意（public opinion），前者指社會大眾如何思考公共議題以及思考哪些議題，後者較強調意見的彰顯。

<sup>90</sup> Parisi, 1995; Kennamer, 1994. 後者認為，新聞媒體在不同社會組織間，肩負協調之責（coordinating function; p. 6）。此外，Carrage, 1991, p. 1 曾由建構理論討論新聞的中介角色，獲致了與客觀主義或守門人概念迥然不同的內涵：第一，新聞絕非對遠方事件的傳聲筒（vehicle）；第二，某些事件得以傳遞而其他事件無法見容於新聞媒體，足以顯示社會真實的吊詭；第三，新聞所使用的語言符號，以及由這些符號所傳遞的社會關連性，加強或改變了我們對事件原有的認知；第四，新聞藉著符號的使用，也提供了原始事件新的意義，或更加強對該事件的原有分類；第五，新聞因而會對社會個體、人物、事件進行再定義，改變原有的組合。

<sup>91</sup> 許多研究者均同意新聞乃建構之物，茲舉二例，如Shoemaker & Reese, 1991, p. 218, 曾提及，「新聞媒體乃社會創造的產品，並非對客觀真實的反映。雖然一篇報導起自真實世界中的某些事件或問題，並可透過社會資訊的來源測知其可靠性，但決定哪些部份會被轉送或會被如何處理的因素極



再者，由於受到組織常規之限制，任何事件均須先經「加工」處理，始能成為新聞媒體所能接受的形式。如電視或廣播新聞受制於時間壓力，須將社會事件濃縮播報；同理，平面媒體則透過文字或視覺符號轉換事件為新聞體裁。為了讓報導內容符合工作常規，新聞工作人員必須「操弄符號（manipulate symbols）」，以便閱聽大眾得以瞭解與接收資訊。<sup>92</sup>由此，Fair與其他研究者因而認定新聞實際上是建構（construct）或再建構（reconstruct）後的符號內容，與原始真實事件不必然有相對應關係。<sup>93</sup>Fair甚至指稱，真實事件無法透過新聞報導展現，只有意義才能在新聞中傳達。人類學家Sahlins則謂：「一樁事件並非只發生（happening）在真實中，乃與特定符號系統間有【意義】關聯」。<sup>94</sup>

實際上，新聞所揭露的符號真實不但可能與原初事實無所對應，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會與事實有所出入或有所刪減，此乃中介符號系統之特徵，並非新聞媒體之「過」<sup>95</sup>。但由於新聞工作者本就是社會人，其

---

多」。Mendelson, 1993, p. 151. 認為，新聞並非僅是記者所做的選擇結果，也是媒體組織整理的故事；「事件可以成為新聞，係因他們可以被整理為簡短的故事，而非他們的客觀性」。

<sup>92</sup> Fiske & Hartley, 1978. 作者們的意旨，並非指稱新聞記者故意操縱或改變事實，而係認為所有中介過程都必須對原有真實有所反射與扭曲，而此一過程乃經由對符號的處理始能達成。

<sup>93</sup> Fair, 1996. 又如Noelle-Neumann & Mathes, 1987 稱，過去研究慣以反映論或鏡子論觀察媒體與真實的關係，假設新聞媒體所報導的事件就是真實事件的「縮影（a reduced scale）」，但是這兩者並不存有必然對應之關係。Molotch, et al., 1987, 也認為客觀主義假設新聞記者扮演了「資訊通道」的角色應受到質疑。Lang and Lang, 1991, 在論及議題建構時亦稱，社會真實與新聞真實之間並無共通之處。

<sup>94</sup> 引自Schudson, 1991a, p. 151. 所謂「建構」，原為認知過程中的概念，指人們將外在事物依其結構與意義的相似情況加以組合，成為對照關係（contrast）。隨後，人們依據這些組合或分類（classification）形成對世界的解釋方案（interpretive scheme），此即Delia et al., 1982, 所稱之認知活動基本元素。Hall, 1997, 則認為，新聞媒體並不「建構」真實，而是「再造（reproduction）」社會主流意識型態。或者，媒體將社會「原料」（raw material, 意指基本事實或詮釋）轉換成為新聞素材。

報導之新聞不能與社會大眾的共有經驗（社會真實）相去過遠，兩者必須有某種程度之「社會共識」。另一方面，新聞卻又常被視為是對固有社會價值之「反叛」、「創新」、「挑戰」，內容充滿了異端文化，如 Davis & Robinson 所稱，「許多新聞故事描述了與正常相異的好事或壞事，追蹤偏離行為的起源與結果，暗示哪些行為將受到禁止或被獎勵。在這個日趨模糊的社會世界中，【新聞】提供了某些特殊情境下可供接受的行為指標與標準」。<sup>96</sup>此種既具有原始真實的某些面向，但又不能涵蓋所有真實面貌，就是前述翁秀琪所稱「新聞是在主、客觀辯證過程之中所產生的社會真實，是社會真實的一部份」的原因了。

以上簡介了社會建構論的觀點。Carrage 認為，將新聞媒體視為是重要符號產製中介機構，代表了一種較為寬廣的典範轉變，從過去的傳輸模式（transmission model）轉化為傳播文化面向。<sup>97</sup>有些學者則認為建構論仍有侷限，尤其以符號真實解釋所有人類的文化活動，等於間接否定了原初事實的存在，可謂「過於激進」。<sup>98</sup>然而社會真實是否存在固然尚有爭議因而一時難以論定，符號真實（如新聞媒體）具有主動建構意義的論點似有其特定說服力。此外，新聞媒體類似其他符號系統，可在不同時空情境中顯現不同意義，尤其值得繼續申論。

<sup>95</sup> 如本節所述，新聞與真實（reality）之間不必然有對應關係，原是建構學派或詮釋理論的重點，此點無庸再予延伸。至於新聞是否就是事實（facts），學者間尚有爭議。如翁秀琪等，1997，頁2，曾稱，「不可諱言的，新聞必須報導『事實』，這是新聞和小說或任何虛構性的文體最大的不同，也是新聞從業人員必須堅守的最後一道防線」。但是記者如何報導事實？誰的事實？事實經過記者轉述後，是否仍具效度？此類問題翁氏等人並未討論。

Graber, 1989, 引述 Lippmann 的概念，認為新聞難以等同事實，因為有太多背景與情境遭到新聞記者捨棄或重建。何況，單一事實並不存在。Graber 強調，新聞是一種建立意識型態的工作。即使是同一事件，不同記者傳達的內容極為不同（pp. 147-8）。Romano, 1986, p. 39, 引述《紐約時報》的社論說：「所有的故事都涉及了某種程度的扭曲（distortion）。但是新聞與小說之別，就像是鏡子與繪畫之不同」。

<sup>96</sup> Davis & Robinson, 1989, p. 68; 插入語句為本文作者添加。

<sup>97</sup> Carrage, 1991.

<sup>98</sup> 如張錦華，1991，頁177。

## 肆、新聞框架與真實建構<sup>99</sup>

首先，框架可謂是「人們或組織對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包括了選擇與重組兩個機制。<sup>100</sup>Gitlin在觀察學生運動與新聞機構的長期互動後，發現新聞媒體並非被動的鏡子，而是一盞不斷「移動的探照燈」。他認為，選擇與重組就是媒體行動的主要工具：社會事件必須透過這類特殊方式檢驗後，始能成爲新聞。一則新聞就是一種選擇與組合的結果，代表了媒介觀察事物的方式，也就是框架的表現。這種選擇與組合的基礎，部份來自記者的個人心理狀態或經驗，有時卻肇因於新聞組織所設定之常規，以致某些事件能受到青睞而成爲新聞，另些事件僅有部份納入，而更有些社會事件則因與媒體特定框架不合而遭棄置，因而無法爲人所知。<sup>101</sup>McCarthy, et al.曾如此描述：「如果電視或報紙的編輯決定忽略示威者的策略，示威就不可能成功，只能像是一棵樹傾倒在人煙罕至的森林裡，難以受到注意」。<sup>102</sup>

<sup>99</sup> 有關社會真實的解釋，可見Stearle, 1995; Velody & William, 1998.

<sup>100</sup> 有關「框架」之定義，已在過去文獻中迭經討論，可參見鍾蔚文等人，1996；臧國仁等人，1997。此地僅引伸與「新聞框架」有關之論述，如Meyers, 1992, 認爲框架是一種前後連貫的整體（a coherent whole），目的在提供特殊的解釋（specific explanation）。Entman, 1993, p. 52 在回顧相關文獻後，提出了較爲廣泛接受的定義：「框架主要牽涉了選擇與凸顯兩個作用。框架一件事件的意思，是將對這件事所認知的某一部份挑選出來，在溝通文本中特別處理，以提供意義解釋、歸因推論、道德評估、以及處理方式的建議」。

<sup>101</sup> Gitlin, 1980, pp. 49-51.

<sup>102</sup> McCarthy, et al., 1996, p. 49.

## 一、新聞框架的定義

過去有關框架概念的討論，有一大部分集中於檢視新聞媒介組織如何選擇社會真實，因此可將新聞框架定義為「新聞工作中的建構【真實】概念」。<sup>103</sup>簡言之，新聞工作者（包括記者與編輯）將原始事件（occurrence）轉換為社會事件（event），並在考慮此一事件的公共性質與社會意義後，再將其轉換為新聞報導。在此轉換與再轉換的過程中，新聞工作者一方面以自己的經驗（框架）將事件從原有情境中抽離（decontextualization），另一方面則將此事件與其他社會意義連結（或稱「再框架」），產生新的情境意義（recontextualization）。<sup>104</sup>由此，新聞框架可謂是新聞媒體或新聞工作者個人處理意義訊息時所倚賴的思考基模，也是解釋外在事務的基本結構。Pan & Kosicki因此提出以下定義：「媒介【新聞】框架就是符號工作者長期【透過大眾傳播媒介】組織言說（包括口語與視覺）的過程，長期以後形成固定的認知、解釋、與呈現型態，以選擇、強調、以及排除【社會事件】」。<sup>105</sup>

Gitlin曾研究新聞媒介如何處理左派學生運動，同樣地將新聞框架定義為一種持續形式，用來闡釋、認知、以及表現新聞論域中的語文或視覺符號。Gitlin認為新聞媒體已經成為社會中傳遞意識型態的主要組織（core system），藉由選擇、強調以及排除的手法，新聞媒體對社會議題表現了某種特定言說形式，也因而拒絕採取其他形式。Entman &

<sup>103</sup> Tuchman, 1978, p. 193（插入句為本文作者添加）。此地有關「新聞框架」的名稱有幾種不同說法，如Gitlin, 1980, 稱其為媒介框架（media frames）；Gamson, 1989, 則稱為新聞框架（news frame）。本文合併交相使用，意指新聞媒體或新聞工作者對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

<sup>104</sup> 此一說法引自Altheide & Snow, 1979, p. 90. 張錦華, 1994a 亦有類似說法。Cook, 1996, 曾調查美國布希總統任內的記者會，發現總統雖然在決定何時召開以及主題為何上有主動權（見臧國仁, 1998），但是記者在報導時常將記者會當作背景，討論其他議題。這種轉換情境的手法，就是記者的新聞真實無法完全等於社會真實的主要原因之一了。

<sup>105</sup> Pan & Kosicki, 1993, p. 56; 插入句為本文作者添加。



Rojecki曾分析《紐約時報》的頭版新聞，發現該報反應的看法代表了傳統「菁英階層（the elites）」的思考模式，成為社會主流思想。Servaes亦曾分析美國報紙對入侵中美洲小國葛納達（Grenada）的報導，發現大多數新聞媒體均將入侵行動形容為美國對抗共產主義的不得已作法，有關葛納達國現狀報導反不易見。同理，美國參戰越南早期也曾被新聞界描述為對抗「蘇聯共產集團」的侵略。<sup>106</sup>

針對類似現象，社會學家 Tuchman 即曾明示，新聞並非自然產物，而是一種社會真實的建構過程，且是媒介組織與社會文化妥協的產品，具有轉換或傳達社會事件的公共功能。Thompson 亦曾揭櫫新聞框架是「資訊轉換的過程」，也就是資訊的製碼與再製碼。由此來看，新聞報導就是一種「選擇」部份事實，以及主觀地「重組」這些社會事實的過程。Friedland & Zhang 則延續 Gamson 等人的說法，強調新聞框架是一種「意義建構的活動」，目的在於不斷地「提供意義（supply meanings）」，新聞媒體因此成為符號系統間彼此競爭的場域，各種詮釋版本充斥。<sup>107</sup>

## 二、新聞框架的內涵結構

Wolfsfeld 曾據此提出對新聞框架的觀察所得，發現大部分的政治衝突其實都可謂源自對框架意義的爭奪，爭議各方不斷嘗試提出各自屬意的解釋版本，以供大眾與新聞媒體採用；此種現象尤以在選舉過程中最為明顯。<sup>108</sup> 在一般狀況下，新聞媒體或者採用競爭雙方中某一方的解

<sup>106</sup> Gitlin, 1980; Entman & Rojecki, 1993; Servaes, 1991.

<sup>107</sup> Tuchman, 1978; Thompson, 1991; Friedland & Zhang, 1996, p. 15.

<sup>108</sup> 參見 Entman, 1993; Entman & Rojecki, 1993; Pan & Kosicki, 1993; Mendelsohn, 1993; Wanta et al., 1991. 至於爭議各方為何爭奪對意義的詮釋，張錦華，1994a，頁280引述傅柯（M. Foucault）的理論，認為抗爭乃是為了爭取主體性（subjectivity）：「簡言之，抗爭是藉由反對知識、才能、資格等權力而發揮效用。它是針對優勢的知識、論域等所進行的抗爭，最終的目標在於質疑：我們是誰」。

此外，社運學者曾從社會行動者藉由框架競爭取得對社會意義及實質利益

釋（如過去研究經常發現官方或菁英份子是新聞媒體所倚賴的主要消息來源），或則用「平衡報導」方式處理爭議主題（即「客觀報導」原則中的手法）。總之，新聞媒體面對錯綜複雜的社會事件，必須與不同組織與個人來往，建立互動關係並省視各種立場。如何明察爭議事件中各方意見的框架內容，一向是新聞學中極為複雜且難以研究的課題。<sup>109</sup>

Wolfsfeld曾歸納五個影響新聞框架形成的因素，分別為：

- 新聞媒體組織的自主性，或是受政府控制的程度；
- 社會事件的訊息提供者（即上節所稱之「消息來源」）：如過去的研究常顯示，新聞媒體對挑戰者的框架常須經過一段適應期，從抗拒反核運動到接受反核立場的框架就是最佳例證；<sup>110</sup>
- 新聞組織的流程或常規：如新聞工作者喜以政府或其他建制組織為其採訪路線中的主要守線對象，使得官方立場在政治爭議中佔有先天優勢。
- 新聞工作者的意識型態，亦常影響框架的形成：如記者習以社會正義者自居，以致影響其報導新聞的角度與選材方式。
- 社會事件受到原始組織影響的程度，也是新聞框架的成因。例如，社運份子習以戲劇性演出來沖淡嚴肅氣氛，常使新聞媒體報導時，只著重事件的活動部份，忽略社運活動的意義。<sup>111</sup>

此外，Rhee在討論新聞框架之內涵時，曾提出三個面向：首先，

的角度解釋，如Snow & Benford, 1988, 認為在新聞媒體上取得記者的報導空間，乃是「表意策動者（significant agent；意指社運份子）」主動介入社會意義的生產過程。基本上，其目標常在擁護或支持相對於主流思潮的另類事實在媒體上呈現，以便建立另一版本的事實，企圖藉此影響閱聽人的資訊與瞭解。Snow & Benford因而稱此類新聞框架的競爭為「社會意義的爭奪」，用意在於爭取對「社會真實的控制權」，也就是Hall所稱之「表意政治學」。有關消息來源的框架討論，可參閱臧國仁，1998。

<sup>109</sup> Wolfsfeld, 1993.

<sup>110</sup> McQuail, 1992, 稱此一適應期過程為媒介確認弱勢團體身份的必經途徑，也可視為是弱勢團體在媒體上爭取合法地位的過程。

<sup>111</sup> 見Wolfsfeld, 1993. 亦可參見作者新作，1997a。此處第五項有關社會事件如何影響新聞框架，可參見胡晉翔，1994。

Rhee認為新聞框架表現在新聞故事的主軸中，經常以不同方式凸顯，包括Gamson所提出之符號圖案。次者，新聞框架也反映於使用者的「詮釋基模（interpretative schemata）」，顯示了新聞工作者的知識背景與經驗。第三，新聞故事發生的社會與時空情境（social and contextual frames），此一情境影響新聞言說及閱聽眾對新聞故事的詮釋能力。<sup>11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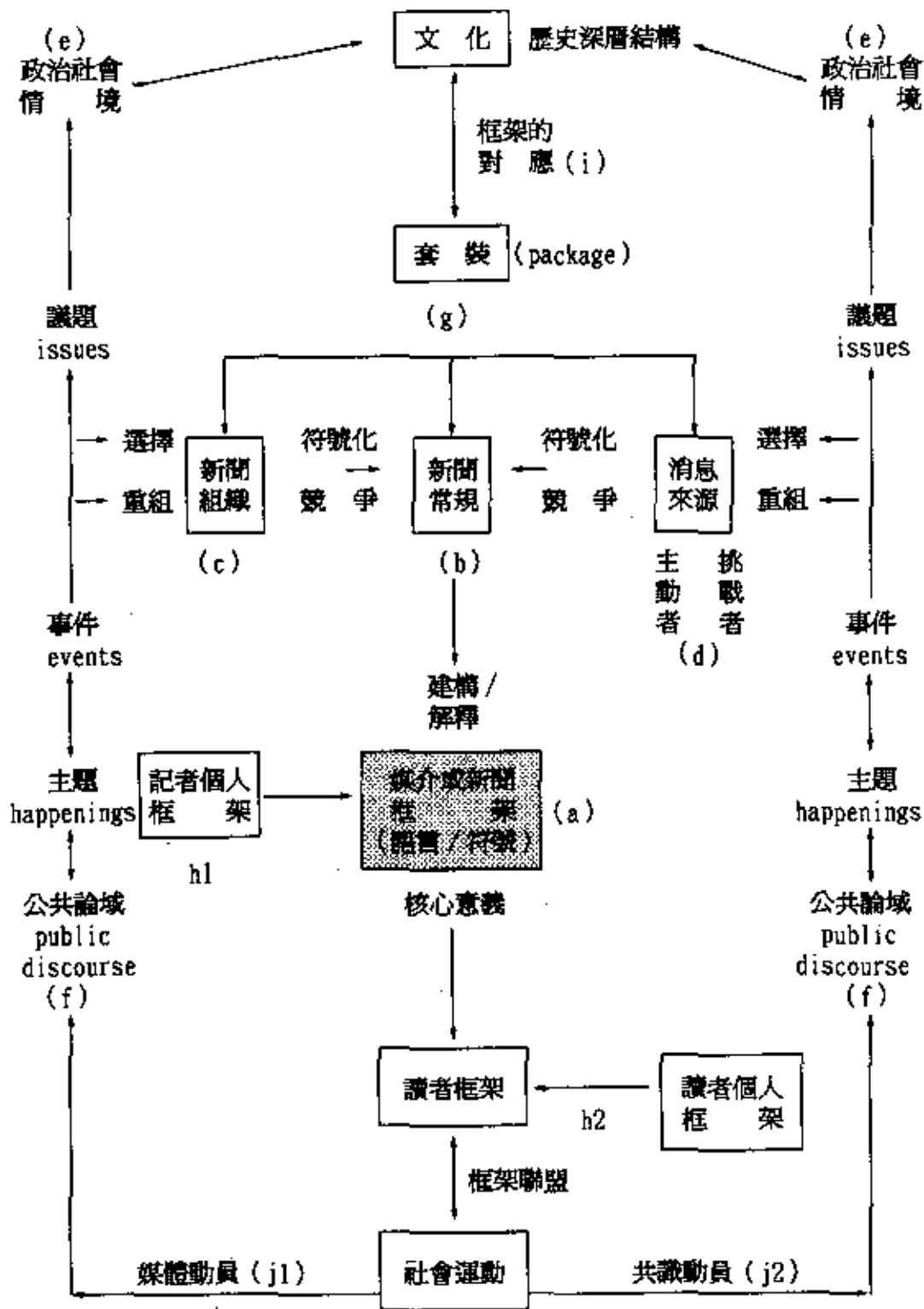
臧國仁等人則認為新聞框架的表現方式，可綜合以上兩位作者的觀點（參見《圖二》）。<sup>113</sup>首先，如上節所述，新聞框架乃新聞工作者使用語言或符號再現社會真實的過程（圖二，a），此一過程在新聞組織中不斷受到新聞常規（b）、組織內部之控制機制（c；俗稱「新聞室控制」）、以及不同立場之消息來源（d）三方面的影響，後兩者分別從公共情境中（e）選擇事件、重組議題，因而形成公共論域（f）。此外，依Gamson之見，新聞框架常以「套裝（package）形式出現（g），即在新聞、評論、漫畫等不同形式之媒介內容中呈現類似且一致的詮釋方向。<sup>114</sup>再者，媒體所呈現之新聞框架受到新聞工作者個人思考基模影響（h1），而讀者在使用媒介資訊時，亦會啟動個人框架詮釋新聞事件（h2）。最後，如Rhee所述，新聞框架會無可避免地與歷史文化脈絡產生對應（i），反映某一特定時期之政治社會思潮（或情境）。一些社會運動團體經常在此情境中嘗試將其組織框架與讀者連結，一方面透過符號活動喚起潛在參與者的注意與興趣，產生共識動員的效果（j1），另一方面則透過新聞媒體傳達組織目標、活動內容、以及意識型態，號召廣大閱聽眾的參與，達到媒介動員的功能（j2）。<sup>115</sup>

<sup>112</sup> Rhee, 1995. Entman, 1993, 亦曾提及，框架表現於三個面向：傳播者、文本、接收者。本研究則認為消息來源以及議題（事件故事）亦有框架，此點將另文討論。

<sup>113</sup> 臧國仁等人，1997。

<sup>114</sup> Gamson, 1984.

<sup>115</sup> Rhee, 1995. 《圖二》原刊登於臧國仁與鍾蔚文，1997b，此圖歸納自 Benford, 1993; Snow & Benford, 1988; Gamson, 1984, 1988, 1989; Gamson & Modigliani, 1987, 1989; Chung & Tsang, 1992; 鍾蔚文等，1995, 1996; Rhee, 1995 等文獻。唯《圖二》未及納入 Wolfsfeld所稱之新聞媒體組織的



圖二：新聞或媒介框架與社會議題的關聯\*

資料來源：臧國仁、鍾蔚文，1997b

\* 本圖涉及範疇較廣，在本研究中僅討論有關新聞媒體常規部份，其他變項留待他文討論。





從以上討論觀之，新聞框架概念顯示了與傳統新聞學不盡相同的觀察面向。如Woo所稱，框架概念強調新聞媒體所呈現之訊息內容並非固定實體（fixed entity），而係文本製作者（新聞工作者與消息來源）、接收者（閱聽眾）、與文本三者之間互動且受到社會情境影響的結果。<sup>116</sup>有關消息來源、議題、以及閱聽眾之框架結構因篇幅所限將另文討論，此地先闡述新聞框架之內涵，分別依組織、個人、與文本三部份討論。

### 甲、新聞組織框架

首先，如Gamson所稱，新聞媒體作為社會真實中的符號系統，首要工作就在協助讀者或閱聽大眾瞭解社會事件的意義（meaning-making）。<sup>117</sup>為了完成此項工作，媒體長期提供固定認知觀點，並組織言說內容，用以詮釋與賦予意義。而在媒體組織的層次，新聞常規扮演了極為重要的框限真實角色。<sup>118</sup>

如前節所述，「常規（routine 或routinization）」本是為了完成新聞工作所制訂的一些慣例與程序，也均可視作是新聞媒體「框架（動詞）」社會事件的機制，決定了這些社會事件是否會被選取與報導。<sup>119</sup>以「路線（beats）」為例，如上節所述，此項常規原係方便新聞記

---

自主性，或是受政府控制的程度，此兩者將合併於媒體組織內部控制概念之討論，見下節。

有關媒介框架與文化對應之討論，參見Bird & Dardenne, 1988, pp. 76-77 所提出之「文化規則（cultural grammar）」觀念。作者們認為，新聞記者撰述新聞時，依賴文化中所提供的「故事基模（story schema）」。<sup>116</sup>換言之，不同社會文化中的說故事方式可能截然不同。

<sup>116</sup> Woo, 1994, p. 13.

<sup>117</sup> 引自Friedland & Zhang, 1996, p. 15. 作者們認為，新聞框架乃是所謂「高層框架（macro-framing）」的一環：透過每天進行的新聞報導工作，媒體將各方競爭的框架重新依自己的觀點組合呈現。

<sup>118</sup> 如Fair, 1996, p. 2, 所稱，新聞室內的常規與工作流程（procedures）決定（但也限制）了議題的新聞性，也決定哪些人屬於新聞人物，或哪些消息來源值得採訪。Fair認為，這些常規與流程之設置，乃組織統治者有意將其意識型態加諸於一般經驗之上，以便駕取真實建構的轉換過程。

者採訪分工而設計之科層組織，不同媒體可藉由對事件或組織之不同重視程度決定是否或如何設置路線，報紙之路線分配就可能與廣播或電視新聞組織之作法有所差異，而一般性報紙之路線配置又可能與專業性報紙（如《經濟日報》或《大成報》）相去甚遠，如政治新聞或要聞（如行政院或總統府新聞）在專業性報紙受重視的程度就可能較低。

由組織結構觀之，路線長久以來已成為新聞媒體框架或定義社會事件的第一道門檻（threshold），可謂是影響新聞取捨的先決條件。<sup>120</sup>如Meyers曾觀察美國中西部農業危機之報導，發現不同路線的記者提供了多種不同新聞樣式（diversity of news）：農業路線記者較著重於反映市場變化、價格浮動、以及日用產品組織的意見，主跑商業路線的記者則重視經濟指標的變化，以及商業領袖的宣言。Meyers因而說明，新聞組織的路線結構不但決定了哪些新聞應該報導，也決定了哪些不符合路線須求的消息應遭忽視：「每一個路線的工作規範不盡相同，……消息來源也不同。這些工作規範以及與消息來源的關係……使得記者只能從主跑路線思考問題。也就是說，記者的『功能參考架構』就是路線，而路線中的意識型態也成為記者的意識型態」。<sup>121</sup>

臧國仁等人研究國內六家媒體對核能議題的報導內容，同樣發現路線可能是新聞取捨的重要結構因素之一：即使在同一新聞組織中，主跑環境路線的記者與主跑台電或國營會路線的記者常因觀點不同而對核能議題有不同詮釋，前者對環保團體就較具包容性。<sup>122</sup>研究媒體與政策

<sup>119</sup> Dunwoody & Griffin, 1993, p. 26 就認為，新聞職業常規（occupation norms）對記者建構新聞的框架有極大影響力，這些框架包括：記者如何觀察、如何看待其他記者、如何瞭解主編所持的想法。因此，常規限制了記者獨立採訪的機會，也限制了記者的視野（見p. 47）。

<sup>120</sup> 路線固然是新聞常規中的重要框限機制之一，仍須與其他因素一併考量，如李金銓，1981，頁70-71曾如此說明：在空間上，新聞組織將社會分為各種路線網，集中注意各路線的顯著組織或中央機構；在時間上，則將事件「類型化」，然後才能進行資源分配與調派，維持新聞作業正常運作。Altheide, 1974, p. 24 有鑑於此，指稱「新聞工作組織運作的常規使得新聞媒體在處理事件報導時，勢必【與事實】有所偏離（distort）」。

<sup>121</sup> Meyers, 1992, p. 82, 雙引號引自原文。

制訂互動關係的Kennamer因此嘆稱，新聞媒體以路線框限議題的重要性非比尋常，因為一旦議題或事件交由某一路線記者擔綱主跑，就等於採取了特定新聞角度，要爭取「翻案」極為不易。<sup>123</sup>

又如前節所述，「時間」常規亦是影響新聞取捨的重要考量。Schudson曾謂，新聞組織依時間生存，任何社會事件要被報導，都須與新聞媒體的時間齒輪相容。一般社會事件除須配合記者的工作時刻表外，尚得合乎媒體截稿時間始能成為新聞。<sup>124</sup>有趣的是，Shoemaker & Reese發現，懂得媒體運作的政客們瞭解新聞媒體的時間框架，因而常會特別安排「有時間性的【假】事件」：如不欲媒體大張旗鼓報導，就延遲至週五晚間發佈消息，讓記者沒有充裕時間廣加採訪求證，因而較易接受消息來源的單面說法。反之，則在白天稍早發佈消息，方便記者多方蒐集資訊深入報導，擴大議題的影響性。<sup>125</sup>

<sup>122</sup> 臧國仁等，1997。Fishman, 1980, p. 224 提及，記者常依路線中的官員們之參考架構決定何者為新聞。國內有位新聞主管亦曾這麼描述：「台灣的記者年紀相當輕，很容易有過度投入的現象。一旦主跑這個單位的新聞，這個單位就像是自己的地盤一樣，如果有不好的事情，就算揭發，也會採訪他們單方面的說法，或是在心態上偏向警方。……這種互動關係是我記者生涯看到最糟的互動關係」（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1997，頁67）。臧國仁等，1997，頁19亦發現，某些社運份子指稱他們可以輕易地指出哪些記者反核，哪些擁核：「由於受限於報社立場，記者們在報導同一事件時，各取所需，不但沒有達成居間（社會各種不同聲音）溝通的功能，還常因此擴大了社會對立」。這些說法似乎都顯示記者受到路線常規的限制，思考模式與路線上的消息來源趨於一致，因而影響其對新聞的選擇與判斷。

<sup>123</sup> Kennamer, 1994, p. 8.

<sup>124</sup> Schudson, 1991a. 某報的社會新聞副主管曾說，「台灣新聞競爭性強，強到大家時間很短。在有限時間內，無法做到周延的採訪，就只能單一的靠警方提供的新聞」（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1997，頁68）。這種說法，顯示「時間」常規的壓力常使得新聞工作者必須在短時間內決定新聞重點為何？採訪對象為何？切點為何？等。

<sup>125</sup> Shoemaker & Reese, 1991a, p. 98. Fishman, 1980, pp. 54-66 亦曾分析記者如何擬定採訪計畫，發現大多數記者會將採訪工作設定為具有時間性的「階段性架構（phase structure）」，以便簡化採訪步驟。如就警察逮捕

Dunwoody分析科學記者如何報導新聞，進一步發現時間因素改變了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型態，成為另一項框限真實的新聞工作常規。Dunwoody指出，由於截稿壓力逼近，迫使記者極度倚賴記者會，藉此機會在會場中採訪消息來源，無意再予多方查證。時間因而可謂係新聞室內的重大限制（newsroom constraint），影響了事件呈現的面貌。<sup>126</sup>

此外，新聞常規中的寫作形式規範也常限制新聞取捨的角度，如前節曾提及之敘事寫作或電視新聞的畫面與聲刺（soundbites）皆是。Manoff發現，媒體為了將事件表達清楚，經常引用不同背景資料，使得同一事件出現不同敘事方式與內容：「新聞敘事體是經驗的組合，將事件發生的次序按照可被陳述的方式安排，以讓【被報導的】世界有所意義。……沒有任何【新聞】故事是事件僅有且唯一的報導方式，也沒有任何事件僅有一種敘事形式。新聞發生在事件與文本交會之處，當事件創造了故事的同時，故事也創造了事件」。<sup>127</sup>

此外，將事件發生的結果置於導言以便先予說明的倒寶塔報導方式，夙被視為是「新聞言說最具特色的部份」，這種「倒果為因」的處理手法因而成為新聞記者框限社會真實的「主要寫作技巧」。<sup>128</sup>導言中除了包含新聞故事的摘要部份外，同時還具有聚焦與放大作用，將故事中的新聞價值先予批露，以引起閱讀興趣。此種化繁為簡的寫作風格，固然協助新聞工作者駕馭文字以彰顯社會事件中較為重要的部份，

---

人犯而言，至少涉及調查與聽證等多項手續，但記者會簡化為「警方逮捕」與「檢方收押嫌犯」兩個階段，顯示新聞工作者對時間的適應力，不但決定了社會事件是否會被選取報導，也影響事件被報導的部份。參見臧國仁與鍾蔚文，1997a，對新聞媒體與時間概念之討論。

<sup>126</sup> Dunwoody, 1997.

<sup>127</sup> Manoff, 1986, p. 228, 插入語句為本文作者添加。

<sup>128</sup> 此處之討論，引自Bell, 1991, 第九章。在該書其他章節中，Bell曾廣泛引述van Dijk的言說分析結果，討論新聞寫作結構。如在頁172中，Bell指出新聞言說中最特殊的部份就是非時間性的故事安排，或如van Dijk所稱，使用「分期付款（installment）」的方式，將事件回溯敘述多次。可參見蔡琰、臧國仁，1998。



但複雜議題常因而遭到濃縮或刪節，或甚至因為不符合此種化約處理方式而遭棄置。在電視新聞中亦有類似框限效果，如實務工作者所謂「無畫面即無新聞」的說法就是一例，許多與社會大眾相感與共的事件或議題，常因無法拍到畫面或畫面不夠精彩而失去播出的機會。

以上依據前節有關新聞常規的討論，試以「路線」、「時間」、「報導方式」三者為例，解釋這些新聞工作慣例與程序如何協助框限真實。然而在新聞媒體的組織層次，除了常規以外，媒體「內部控制（newsroom control）」亦是影響新聞呈現的重要因素。

所謂內部控制，係指「新聞編採人員的工作環境，如何影響新聞成品的內容」。<sup>129</sup> 首先專注此概念之Breed在一篇由博士論文改寫的文獻中，討論了新聞媒體是否有任何「政策（policy）」？這些政策如何傳遞與維繫？媒體工作人員如何習得這些政策？是否願意遵循政策？誰能逾越媒體政策？如果這些內部政策違背了新聞人員的職業倫理，新聞人員如何應對？<sup>130</sup>

Breed在深度訪問一百二十位報社記者後，發現媒介組織實與其他一般企業類似，都備有一些由領導者（發行人）所「製訂」的政策或內規。這些政策或規範有些明顯可資遵循，有些則晦暗不清，並無文字記載，常靠耳傳（grapevine）。學習這些規範因而成為新進工作者「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重要經驗與過程：「當新進記者開始工作之刻，無人會論及規範為何，也沒有人加以告知。……但是除了新進者以外的所有員工都清楚這些政策為何。有位受訪者承認，他的確是透過『點點滴滴（by osmosis）』習得【這些政策】」。<sup>131</sup>

根據Breed所述，新進人員的學習過程可能包括：每天讀報，由字

<sup>129</sup> 鄭瑞城、羅文輝，1988，頁118。

<sup>130</sup> Breed, 1997.

<sup>131</sup> 同上註，p. 109（插入語句為本文作者添加，雙引號引自原文）。有關這種「社會化」過程，有時是由上而下（由主管層級傳遞至一般記者與編輯）。Gist, 1990, 曾指出，主管階層的年齡（年代）往往將記者這個年紀不認為是新聞的素材炒熱，因此新聞判斷無可避免的是決定新聞偏見的原因之一。此外，施祖琪、臧國仁曾研究新聞編採手冊，但未發現其與組織文化的密切關係。

裡行間體會報社（媒體組織）對某些議題的立場；或從自己的稿件是否得到「老編」垂青來揣摩上意；或從上級長官參加的活動與社團探知其喜好；或從編前會議或採訪會議中的討論瞭解新聞「風向（angle）」等。有時候新聞工作者（包括編輯）也會從社內刊物以及其他組織內溝通管道「拐灣抹角地獲得一些線索，以趨吉避凶，討上司和同事的喜歡」。<sup>132</sup>

其他學者隨後相繼由組織學與組織文化的角度，探索新聞室內控制的意涵。鄭瑞城認為，媒介與其他組織一樣，常以強制、酬庸、與規範三者控制成員。如新聞寫不好或「獨漏」新聞，上級會加以指責或威脅開除，此即強制作用。<sup>133</sup>記者跑了獨家，上級給予口頭或物質報酬，此為酬庸。<sup>134</sup>規範則是「以理服人」，媒體組織藉由各種內部管道傳達組

<sup>132</sup> 引自李金銓，1981，頁35。Breed之後的相關研究次第展開，如Singelman, 1973, 認為，記者之上司長官（或其他上級守門人）可以藉由審核稿件的機會改變新聞內容或方向，或修改最具殺傷力的部份。此點可視為是內部品質管制的一環，亦是新聞框架在組織層面實施的實際例子。Bowers, 1967, 針對發行人的研究，則發現組織政策愈緊密的媒體組織，發行人的干預愈多，有時甚至是直接表達意見。Epstein, 1973, 的研究則認為事前檢查（censorship）無須明顯直接行之，只要每日耳提面命地告知何者重要或不重要，已足以達到建立認同之目的。Napoli, 1997, 的近作則嘗試討論新聞工作者如何反對主管意見，如表面接受其建議但仍在新聞內容中表達自己之想法。

<sup>133</sup> 鄭瑞城，1988。此外，陳慧容（1992: 83）曾引述《聯合報》系已故董事長王惕吾於民國八十一年三月份對主管聯合工作會的「政策性」講話，正式開除記者徐瑞希。王氏在此段講話中說：「……你（指《聯合報》員工）是我們報社的工作同仁，你違反報社同仁應該共同遵守的準則，和報社堅定的原則、立場對抗，我就不能容忍。徐瑞希小姐這種行為所涉及報社的法規，這和國家行政人員的違法亂紀有什麼不同？所以我們認為他違背新聞道德、倫理、違背聯合報社規，像這種情況，還不處理，行嗎？……」。

<sup>134</sup> 除一般獨家獎賞制度外，國內新聞媒體最著名之酬庸制度當屬《聯合報》系的「紅包」。據該報社刊描述，《聯合報》在八十三年以前的十年中，至少有三位記者因傑出採訪而獲頒一萬美金的獎勵，包括朱立熙因在漢城最先採訪到中共飛行員孫天勤駕機投奔自由、周玉蔻因專訪菲律賓總統柯拉蓉、以及曼谷特派員寇維勇獨家報導李登輝總統會晤泰皇蒲美蓬。八十

織文化的目標，如《紐約時報》報頭每日均刊出的「刊登所有值得報導的消息（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或國內《聯合報》系強調之「正派辦報」等皆屬此類。<sup>135</sup>

Bantz則由組織文化的觀點探索組織內衝突，發現新聞組織會採取某種特定角度創建（enact）社會事件，並以此角度賦予其（事件）意義，因而改變了原始事件的走向。此外，Bantz認為，新聞媒介組織內部經常面臨來自不同價值觀的對抗，如新聞專業與企業利潤孰清孰重，或專業與娛樂風格如何調和取捨等。<sup>136</sup>這種內部意識型態之爭固然屬組織常態，長久以往仍易影響新聞工作者的自主權，造成新聞人員在進行報導時面臨究竟應配合企業文化還是完成媒體工作目標的困擾。一位資深記者曾如此表示：<sup>137</sup>

「選擇素材」是新聞人員自主性的臨界點，也是媒體企業文化干擾新聞人員工作自主性的切入點。一旦依據媒體企業文化選擇素材以後，新聞人員在執行採訪任務的過程中，都可感覺到高度自主性。至於什麼人感到他自己在選擇角度或採訪對象的自主性高呢？愈能得到主管信任的記者，其執行過程的自主性愈高。也就是說，新聞人員「同化」媒體環境的程度愈高，其自主性也愈高。

---

三年九月，該報駐德國記者陳玉慈獨家專訪到亞奧會主席科威特籍的阿罕默德，確定李登輝總統婉謝出席亞運會，亦獲得採訪獎金美金一萬元。有趣的是，前三者均已先後離開《聯合報》系。見高惠宇，1994；彭偉文，1994。

<sup>135</sup> 有關規範的詮釋，係本書作者之引伸。近年來，傳播媒介也如其他企業組織嘗試發展「企業識別系統（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以改進形象，建立組織特色。對內，則以此符號統一工作人員的向心力。國內引進CIS系統之媒體組織已有台視、《聯合報》系、《中國時報》系、《自由時報》等。有關《聯合報》部份，可參閱王麗美，1994。

<sup>136</sup> Bantz, 1990. Van Zoonen, 1991 稱此種組織內的價值觀為「組織協商（institutional negotiation）」。有關組織內部新聞建構的互動，可參見陳順孝、康永欽，1998。

<sup>137</sup> 屠乃璋，1995，頁56；雙引號均引自原文。

就「專業意理」角度而言，媒介組織文化價值衝突的確是新聞框架的重要形成來源。<sup>138</sup>傳統上，新聞工作者對於記者的職責分際夙有多種不同看法，大致可分為中立者（認為記者應客觀報導）、鼓吹者（或稱參與者，強調記者應該介入事件才能瞭解真相）、解釋者（認為記者應提供讀者有關事件的深度分析）、對立者（認為記者之功能首在監督政府作為）等類型。<sup>139</sup>此外，袁乃娟稍早完成之一項有關新聞人員「專業態度」研究則發現，國內學者、官員、以及記者對專業的看法殊異，但大致可分為傳統專業主義者（支持新聞事業發展為專業）、反專業主義者（重實務經驗，認為新聞機構的栽培較新聞教育有效）、以及憤世嫉俗的新聞工作者（具有理想但在工作上屢遭挫折因而對專業失去信心）。<sup>140</sup>

以上這些研究顯示，持有不同專業意理的新聞工作者在新聞表現上有所分野。如張碧華整理多項研究結果後表示，專業程度之高低對新聞從業人員的態度與行為均有所影響：專業程度較高者，工作表現較好、對媒介較具批判性、個人意識較強、重視公眾服務及專業承諾、對工作期許較高、較不易離職、較有心改善專業訓練及組織、較為強調理念層面的滿足、也較有意願參加專業組織。喻靜媛、臧國仁更進一步發現，傾向採取「對立者」專業意理的記者，較認為自己應扮演挑戰政府施政的角色，因而特別在意與消息來源保持距離，藉此強調記者的自主性。作者們因此認為，記者對自己的角色期望（亦即所持專業意理），影響

<sup>138</sup> 鄭瑞城，1988，頁90，稱此「專業態度」，分指不涉及是非（如新聞記者對新聞是否客觀）與涉及是非（如新聞應否客觀）觀念，一般多指後者，如工作資格應該如何取得？應如何認知大眾媒介之角色？應如何維持角色獨立，免於外界干預？以及如何正確採訪？

<sup>139</sup> 引自屠乃璋，1995。可參見李金銓，1981，第三章；彭家發，1997，第十章；楊秀娟，1989；蕭蘋，1989等人的討論。國外文獻可參見McLeod & Hawley, 1964; Johnstone, et al., 1976. 此外，Drew, 1972, 曾以「角色」理論討論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將電視記者分為三類：第一種記者以受眾興趣為依歸，第二種則以上司意見為主，第三種類型則以個人經驗為處理新聞之依據。

<sup>140</sup> 袁乃娟，1986。



報導事件的處理方式，至少專業意理較高者在新聞內容上較不會（或不願意）受到消息來源干預。<sup>141</sup>

以上分別從新聞常規、內部控制、以及專業意理三個面向，討論新聞媒介如何在組織層次影響真實事件的報導。<sup>142</sup>由上述文獻觀之，新聞工作者的建構真實過程其實受到所屬行業與組織影響甚鉅。如新聞行業爲了節省時間與完成工作所發展的慣例與流程（如路線、時間、報導形式），就可能是社會事件能否成爲新聞的決定因素。<sup>143</sup>而新聞組織的內部社會化過程以及組織文化亦常潛移默化記者與編輯的新聞選擇價值觀，直接影響了符號真實的建構。此外，新聞行業的專業意理（如對新聞事業的看法），也常造成新聞工作者對選擇社會事件報導有不同標準。以下繼續由個人層次討論新聞框架的形成內涵。

## 乙、新聞個人（認知）框架<sup>144</sup>

<sup>141</sup> 張碧華，1992；喻靜媛、臧國仁，1995，頁231-232。Fico, 1986曾發現，專業意理影響記者選擇消息來源。

<sup>142</sup> 除此三面向外，其他變項可能亦會在組織層次影響新聞框架的形成，如媒體的經營型態。Altschull, 1988, p. 254曾謂，「新聞媒體【的內容】反映資助者的意識型態」，如由政府或國家支持的媒體，其內容偏向官方色彩；在商業色彩的體制下，媒體反映廣告商或控股公司的思想；以利益團體爲主要財力來源的型態中，媒體內容反映政黨或宗教團體的想法；最後，在較非正式的組合（informal pattern）中，媒體反映有意宣傳自己觀點的個人意見。此外，魏誠，1995，認爲影響新聞的組織內部因素有：政策（報社內部的權力支配關係）、慣例（即傳統）、與行規（從眾心態）等三者，加起來可謂之「編輯室（即新聞室）觀點」。至於經營型態與新聞內容間的實證資料尚少，此處因此未加闡述。

<sup>143</sup> Sigal, 1973, 稱此爲新聞行業共有價值觀存在之情境（shared context of values）。

<sup>144</sup> 新聞個人框架指的是新聞工作者的認知結構，此地採取認知心理學的觀點，認爲新聞記者如一般人一樣，在處理資訊時會使用到先前知識系統（包括陳述性與程序性知識）。次者，這種資訊處理有組織結構，同一主題之知識會串連且相互連結，自成體系。就新聞工作者而言，其知識系統就是此地所謂之「新聞個人框架」。鍾蔚文，1992，頁15，認爲框架就是知識結構中的高層意義，可以幫助讀者（包括新聞工作者）選擇、組織和詮釋外界的資訊。知識結構就是一個「存在於下意識裡的心理結構或過程

傳統新聞學很早就曾針對新聞記者報導社會事件時的「固定型態」有所調查，此類研究慣稱為「新聞偏向 (news bias)」。<sup>145</sup>根據羅文輝的整理，偏向可定義為「系統性的偏袒某一方或某種立場」，是一種多面向的概念，具有多種意涵，如不平衡、扭曲。<sup>146</sup>有些新聞偏向是媒體組織或記者個人「有意」造成，故意採取特定角度報導社會事件，有些則屬無意且隱藏式的偏向，是一種肇因於不同意識型態的報導差異，如西方記者常被批評以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報導第三世界即為一例。

研究發現，新聞偏向最常發生在記者報導時所選擇之特定消息來源，系統性地「偏袒」某些人物（如政府官員、男性、主管等）、團體（如菁英階級）、或組織（如建制組織；參見上節討論）。如鄭瑞城曾整理民國七十七年至八十年國內有關媒介消息來源之系列研究，發現在一般新聞事件中，消息來源背景「愈有利者」，受到媒介處理的顯著性愈高。但在特殊事件中（如街頭社會運動或黨外活動）的新聞報導中，則以「處理者（如警方）與行動者（示威人士）」受到的顯著處理程度較高。<sup>147</sup>

，控制著個人整體的認知和技能活動」（頁19），侷限了我們認知的範圍。鍾氏認為，知識結構像是理論，讓個人對外來的資訊有了先入為主之見（偏見）。而使用者以此為基礎，展開驗證的過程，外來的資訊就是佐證的材料。

在認知心理學中，「框架 (frames)」曾以不同名詞討論，如基模 (Rumelhart, 1975, 1984)、腳本 (script; Schank and Abelson, 1977)、參考架構 (Markus & Zajonc, 1985; Graber, 1989)，分類 (genre; Fridriksson, 1995; Gans, 1979)，或偏見 (McCarthy, et al., 1996; Steele, 1996)。

<sup>145</sup> 相關研究可見：Roshco, 1975; Galtung & Ruge, 1965; Hackett, 1985; Tuchman, 1978; Smith, 1993。國內研究可參見鄭瑞城與羅文輝，1988；陳一香，1988；劉蕙苓，1989；鄭瑞城，1991；羅文輝，1995。根據Smith, 1993, 的看法，偏向研究有其哲學起源。如Habermas即認為人類理性解放所依靠者，正是雙方透過相互主觀的理解而達成之無偏執溝通。而瞭解偏執溝通的起源，正是此一工作的第一步。許多批判研究因而認為，權力就是偏執過程的重要變項（阻礙），權力的不同形式與媒體中的意識/霸權內容造成了偏執。

<sup>146</sup> 羅文輝，1995。

雖然羅文輝曾說明「消息來源的偏向似乎是新聞記者迎合截稿時間、提高工作效率、維持新聞可信度、以及和消息來源互動的必然結果」，<sup>148</sup>Fowler延續其他語言建構學者的意見，提出「所有新聞都具偏向（all news is biased）」的觀點，認為新聞本就是在某些社會、政治、或經濟情境下以特定角度（框架）所報導的言說，因此其內容必然與原有真實世界有所歪曲或偏頗。<sup>149</sup>Molotch & Lester進而強調，新聞報導要達到中立而沒有偏向這個假設本身就已是一種偏向。<sup>150</sup>Davis & Robinson甚至指稱，新聞偏向研究者認為「事實可以被評定（truth can be assessed）」這個觀點，也是一種偏見。<sup>151</sup>臧國仁則認為偏向究係起自故意扭曲或係新聞價值的判斷失誤，尚須進一步釐清。<sup>152</sup>

<sup>147</sup> 鄭瑞城，1991，頁49。Lo, et al., 1994, 等人以鄭瑞城的資料進一步分析，發現政府官員被引述（quoted）的比例是非政府官員的2.15倍，來自台北地區的消息來源被引述的機率是非台北地區的3.08倍。此外，中年人、機構主管、台北地區的消息來源出現在電視新聞中的情境較為有利。因此，作者們認為男性、政府官員、台北都會區、機構主管等人口背景是台灣地區報紙與電視新聞所採用的主要消息來源，這些人可謂是台灣社會的上層人士。此項結果與本章第二節所述國內、外相關研究的發現十分類似。可參閱羅文輝，1995。

<sup>148</sup> 羅文輝，1995，頁25。

<sup>149</sup> Fowler, 1991, p. 10.

<sup>150</sup> Molotch & Lester, 1974.

<sup>151</sup> Davis & Robinson, 1989, p. 68.

<sup>152</sup> 臧國仁，1994。以下這些引述大都支持了「偏向並非錯誤」，只是起自不同認知角度（框架）的說法，如Smith, 1993, 強調「偏向無罪」，因為在做事結構的有限體系（reportoire）中，記者與讀者都受限於再現的選擇。文化一方面提供了人類表達的空間，也因語言符號邏輯的有限性而創造了偏向，這一點寫作者不一定能探知，屬於認知結構中的習性。Voakes, et al., 1996, 質疑傳統偏向研究所稱之「增加消息來源就能增加新聞多樣性」的看法。他發現要得到新聞多樣性須從內容著手，而非消息來源。此外，Spitzer, 1993, p. 199 指稱，新聞媒體並非中立傳播媒介，因為在其最後輸出的產品（新聞）中，經常摻雜有偏見，這點所有圈內人都清楚的很。Sahr, 1993, 亦稱，真實的形象（image of reality）影響了故事的安排與消息來源的選擇，而無論消息來源（包括專家在內）如何表達看法，通常都無法偏離權威者的觀點。



首先，臧國仁認為過去有關新聞偏向的研究在方法上過於簡略。舉例來說，以內容分析這種研究方法探討新聞記者是否長期固定倚賴某些特定人物或組織，僅能得到消息來源被援引的次數多寡（frequency），無法論及這些消息來源在新聞中究係主動或被動發言（如官員在新聞中被援引的原因可能是政策宣導或回應民間指責，兩者意涵完全不同），亦難以認定被引述者在新聞中係主角或背景角色（backgrounder）。這項缺失使得偏向研究之主要論點，認為新聞報導過於偏重某些人物或組織的現象，極可能純屬誤解，並無此事。<sup>153</sup>

此外，臧國仁亦認為，研究者將消息來源籠統劃分為政府官員與非政府官員，乃假設這些政府官員的議題立場一致。實際上，官員們經常因站在自我立場辯護政策而彼此互相攻訐（如勞委會與經濟部對週休二日制的看法就可能南轅北轍，農委會與衛生署亦可能因究竟應否宣佈台灣為口蹄疫疫區而意見不同），而此現象正是新聞媒體監督政府的主要功能所在。<sup>154</sup>何況，即使是同一消息來源（官員）的發言，不同新聞媒

<sup>153</sup> 臧國仁，1995a。舉例來說，政府官員如在某些新聞報導中佔有量的多數，但其所佔位置可能均係被動地反應民間指責，因此由出現次數多寡推論官員乃社會上層人士，佔有有力地位，似與事實不合。這種現象使得新聞偏向的研究結果在方法上不斷遭到學者質疑，如Salwen, 1996, p. 831 即認為以出現次數考量消息來源的解釋份量無法呈現真貌，研究者更應澄清消息來源在新聞中被使用的深度與廣度。Libler & Bendix, 1996, pp. 57-58, 更稱，「政府消息來源因為經常被引述，就推論會造成一種【由他們】單一主控的現象，這種假設過分簡化了真實情形」（插入語句為本文作者添加）。參考臧國仁，1997，的結論部份。

<sup>154</sup> Bennett, 1994, p. 24 反駁「官方消息來源較受新聞媒體青睞」此種說法：「即使大多數外交政策的新聞報導是菁英取向（elite-driven），在不同情況下的差異可能極為顯著，包括報導中的菁英對立、新聞報導的長短、【新聞】故事所賦予不同立場的劇情（play）、以及有關民意形成的結果及政策合法性相關資訊。這些差異顯示，記者雖然在執行【報導】工作時遵守有關消息來源的規範，但另一方面也得接受新聞專業標準，不要在報導中有立場，雖然在這些官場中的爭議與對立各方都急於發動『狂亂餵食』【新聞記者】」（插入語句為本文作者添加）。其他如Herman, 1986, 亦發現美國媒體喜將蘇聯官員用做壞消息的箭靶子。因此，將所有官員放在相同類目推論其受媒體青睞的說法，可謂過於草率。



體可能摘錄了完全不同的部份，產生不同意義，研究者如何能將不同部門之政府官員置於同一類目中？或甚至將不同新聞媒體視為同一類目？  
155

再者，臧國仁認為，傳統偏向研究假設在真實世界中有一評估新聞報導的客觀標準存在（或稱「正確性研究（accuracy research）」），宣稱新聞報導的目的就在於呈現公正、客觀、不偏不倚的內容。<sup>156</sup>但是，「偏向是新聞報導無可避免的過程，即使以『平衡報導』將各方意見同時呈現，仍不免涉及意見陳列先後的問題」。<sup>157</sup>Rouner, et al.因而指稱，新聞記者排除自己意見於報導內的結果，反而將消息來源的意見引進了故事之中；新聞報導其實仍然被意見干涉，只不過是由記者換成了消息來源罷了。Rouner, et al.,認為，平衡報導也只是將不同消息來源的意見併陳，所達到結果最多只是中立，並非客觀。<sup>158</sup>

<sup>155</sup> 語出van Leeuwen, 1996, p. 38. 作者指出，媒體再現會包含與排除某些社會行動者，以完成其再現的興趣與目的。中產階級的報紙傾向將菁英人物個人化，而把一般社會大眾同化（assimilate）表現；而工人階層報紙則慣將一般人個人化。簡言之，不同媒體面對消息來源可能採取迥異的處理策略。如近期所發生之「凍省」事件，雖然各報均摘錄了省長的發言，但不同媒體可能摘錄了同一場合發言的不同部份，並將此一部份放在不同新聞組合中，產生不同新聞意義。省長雖然只發言了一次，但媒體所刊登的內容卻可能有所差異，如在自由時報或在省辦的台灣新聞報相關發言的前後文意義就可能不同。因此，過去研究將所有媒體視為同一類目的作法亦有可議之處。

此類文獻甚多，相關討論可見Cook, 1994; Libler & Bendix, 1996. 此處未及討論者，尚有許多以「不列入記錄（off-the-record）」方式發言之政府官員。

<sup>156</sup> 羅文輝，1995，頁17，曾如此表示：「由於新聞主要由消息來源提供，如果新聞記者選擇消息來源有明顯的偏向現象，新聞將無法公正，也難以展現社會現實新聞媒介的功能與可信度都將受到嚴重的傷害」。本研究則認為，偏向是常態，因為記者受到個人框架的影響，本就會採取立場接近之特定消息來源的說詞。記者是否因為長期使用某些消息來源就損傷了報導可信度，猶待討論。

<sup>157</sup> 臧國仁等，1997，頁22-23（雙引號引自原文，底線為本文作者添加）。

<sup>158</sup> Rouner, et al., 1995. Entman, 1993, 認為，媒體真正的「偏向」，在於將複雜事務簡化，將機構擬人化，將事實轉化為情緒報導，以及將實質（sub-

爲了改進以上有關新聞偏向研究的缺失，Trumbo建議未來應將「議題 (issues)」概念納入討論，以便檢視消息來源被報導的多寡與議題發展有無關連。<sup>159</sup>此外，議題種類可能亦與消息來源有關：新聞媒體可能在一般性議題上較重視官方消息來源，而在特殊性議題可能就較依靠企業或其他利益團體。其他研究者則認爲有關偏向的討論，宜改由新聞框架入手，因爲「使用不同消息來源，實因【記者有意】展現不同框架」（插入語句爲本文作者添加）。<sup>160</sup>換言之，「偏向」是記者個人新聞框架的一種表現方式；研究新聞報導理應探索記者在特定媒介言說 (media discourse) 中引用了誰？說了些什麼？有無固定言說型態？這些固定型態反映了何種敘事形式？而非如過去研究僅分析消息來源出現次數以及有利或不利等立場問題。或如Reese近期所言，「媒介研究者應捨棄過去過於關心偏見的『窄化觀點 (narrow concern)』，朝向分析新聞中所特有的意識特性（即框架），以及社會互動的方向」。<sup>161</sup>

如前所示，過去曾有多位學者強調新聞框架就是新聞工作者（包括記者、編輯、以及主編）個人選擇、解釋、強調、或組織外界事務的心理結構。如Fridriksson曾謂，每則新聞故事都傳達了不同訊息，因此訊息內容只是記者個人專注或將焦點集中在議題某一部份的結果。換言之，新聞其實是記者或編輯之個人框架選擇社會事件的某些成分與排除其他部份後的呈現。<sup>162</sup>

stance) 遊戲化。作者並稱，這種簡單化、擬人化、情緒化、以及著重情緒過程的報導方式，容易造就保守政策與候選人，因而阻礙了公民知的權利。Sigal, 1973; Chibnall, 1975 均有類似說法，認爲記者客觀報導的結果，常將消息來源引入故事之中。

<sup>159</sup> Trumbo, 1995a, 1995b.

<sup>160</sup> 引自 Singer & Endreny, 1993, pp. 136-137. 另外，Libler & Bendix, 1996, p. 58 亦認爲，消息來源的選擇，基本上是爲了影響故事框架 (story frames)。Dyer, 1996, p. 141, 亦承認，新聞報導中的消息來源對議題認知有所影響。Reese, 1991, 強調，選擇不同消息來源，不但決定新聞框架，也顯現新聞內容的語調與言說。Hendrickson & Tankard, Jr., 1997, 建議由新聞框架的系統論著手，以便發掘更多「種類 (type)」的消息來源，鑑定在各種層次的議題中，新聞記者如何訪問消息來源，影響故事框架。

<sup>161</sup> Reese, 1997, p. 3.

此種以新聞工作者個人呈現方式為討論重點的研究概念，過去並不乏先例。舉例來說，Lippmann在一九二二年《民意》一書中所提出之「刻板印象 (stereotype)」概念，就常被引述用來解釋人們（包括新聞記者）解釋外界事務的認知基礎：「大體來說，我們並非眼見而後定義，而是先定義才見」。Lippmann定義刻板印象為「一種簡化型態 (oversimplified pattern)，用以協助人們獲得有關【真實】世界的意義」。世事紛雜無章，人們倚賴這種簡化機制來組織生活經驗，並將其間的關係合理化。因此，刻板印象也是一種知覺形式，塑造了「人們心目中的圖像 (pictures inside our heads)」，協助處理無法觸及、無法眼見、也無法心想的世界（插入語句為本文作者添加）。<sup>163</sup>

然而在此書中，Lippmann僅提及「新聞並非社會現象的一面鏡子，而是針對一原已突出的觀點之報導」，並未深入討論新聞工作者如何以刻板印象報導社會事件。後續研究雖曾據此討論大眾媒介內容如何傳遞對種族、性別、職業角色、老人等之刻板印象，針對新聞記者刻板印象的討論尚少。<sup>164</sup>

近期相關研究則以認知心理學角度，探索人們（包括新聞工作者）

<sup>162</sup> Fridriksson, 1995, p. 3. 有關記者個人如何選擇訊息，可參見Kepplinger & Koche, 1990, pp. 303-306.

<sup>163</sup> 此處討論皆引自Lippmann, 1922，第六至十章。有關刻板印象之專書甚多，可參考Oakes, et al., 1994; Leyens, et al., 1994. Oakes, et al. 在第一章中，簡略地討論了刻板印象研究在過去數十年間所經歷的轉變。作者們的說法與本節論點類似，即刻板印象概念雖然在早期廣被社會心理學者視為與偏見 (prejudice) 相關，因此常被定義為「對其他團體的無正當理由之負面反應」，較新的趨勢則承認刻板印象為人性使然，無關合理與否，亦與負面印象無關。因此，作者們表示，刻板印象可謂是一種扭曲事實的內容，是源自於人們心理功能限制的一種「必要罪惡 (necessary evil)」 (p. 7)，可重新定義為對「外界真實的再現」 (p. 8)。

<sup>164</sup> 引自p. 216。「刻板印象」概念其後成為媒介涵化效果 (cultivation effects) 研究中的重要一環，研究者認為媒介所提供的內容，成為閱聽眾刻板印象的主要來源，如兒童對男女性別差異、職業性別角色、或種族優越感等。可參閱Wober & Gunter, 1988; Greenberg, et al., 1993. 另外，Gitlin, 1980, 第十章 (pp. 265-9) 曾謂，記者極少受到時間、立場、讀者影響，但是其刻板印象常來自其社交圈、工作環境、組織團隊的預設等。



在處理資訊過程中如何受到個人認知引導與限制，以致影響產出內容（output）。<sup>165</sup>如Stocking & Cross曾分析新聞產製過程，發現記者無論在選擇事件、選擇導言、或選擇報導角度時，都習以認知結構中所熟知的慣用方式進行。此一過程不斷影響隨後展開的採訪工作，凡是與原有思考模式不合之事件與角度，記者或則不予選擇，或則不予重視。<sup>166</sup>此外，Cohen也發現記者在報導社會事件時（如示威），常對某些事件中的部份有所成見，如「暴民」總與某些表現連結，這種情況符合敘事理論中對「事件原型（archetype）」的描述。<sup>167</sup>

Chung & Tsang則進一步認為新聞採訪工作是目標或假設導向（hypothesis-oriented）的歷程，而此目標或假設就是個人框架的外顯表現。他們發現，記者其實並不採訪新聞事件，而是不斷「驗證」事先所蒐集的資訊以及與消息來源訪談的結果是否與原先目標或假設吻合。記者在採訪前會先針對採訪各個要素（如訪問目標、寫作方向、消息來源的安排）建立心象，建構「問題表徵（problem representation）」。<sup>168</sup>記者的知識結構在此處扮演了協助訂定目標、擬定工作計畫與步驟的功能，也就是個人組織真實、詮釋外界變化的心理框架過程。<sup>168</sup>

有趣的是，記者之目標可能多重：除了報導真實事件外，記者還可能同時希望達到吸引讀者、伸張正義，或甚至藉由報導某些細節與消息來源進行溝通的可能。這些目標有時彼此互相衝突，但是大多數時候記者都能妥善處理，使得新聞內容既滿足了讀者知的權力，同時又隱藏部

<sup>165</sup> 舉例來說，Bar-Tal, et al., 1989, 在討論刻板印象時，就認為人們對其他團體的印象，受到認知結構中的基模影響，未來應改以資訊處理模式中的相關概念（如prototype原型）討論。Roshco, 1975, 在討論新聞記者的個人角色時，曾引用社會學者R.K. Merton的目標移位（displacement of goals）概念，用以說明受到社會結構安排影響，原先設定的目標為之調整。Merton認為，「看見一件事，也意味看不見其他的事；將焦點集中於A，也就是忽略了B」。這些說法都與本節所討論之新聞個人框架一方面協助處理真實，但另一方面也侷限真實的範疇等說法有關。

<sup>166</sup> Stocking & Cross, 1991.

<sup>167</sup> Cohen, 1981; 有關事件類型可參閱Bruner, 1990; 葉斯逸新近完成的碩士研究論文。

<sup>168</sup> Chung & Tsang (鍾蔚文與臧國仁)，1993。



份真實，避免惹禍上（記者）身。<sup>169</sup>

隨後，章倩萍曾以兩次個案研究分別訪問、觀察八位記者如何報導新聞，也發現記者在採訪前不但會針對事件建立假設或目標，且其採訪工作俱都受到此假設影響。章倩萍首先根據認知心理學中的基模（schema）論點，認為新聞記者在採訪與報導新聞時，有可能以既有知識結構為基礎，發展、建立假設，做為認識新聞事件、處理新聞資訊的起點。<sup>170</sup>

根據資料分析的結果，章氏發現受訪新聞記者的確在採訪之前就將事件進行分類（categorizing；類別假設），決定了事件的屬性（如一件火災可能係意外事件、縱火、或名人葬身火窟等不同屬性），因而對此事件的新聞價值（主題假設）、重要消息來源、事件的重要細目都有了初步想法。其次，章倩萍亦發現記者在採訪之初也對事件結果、過程、情況有所臆測（結果假設）。即使事件業已落幕，記者仍會續對事件的涵意、影響、未來演進均有推論（影響假設）。

這些不同假設的建立，不但有助於記者及早策畫報導方向，也使採訪計畫與寫作內容幾都侷限在假設所設定的範圍：如記者選擇訪問的消息來源大都與假設有關，問問題的範疇與內容傾向支持原先假設。此外，新聞寫作內容亦與原先假設一致，詮釋性文字也與假設類同。章氏

<sup>169</sup> 參見臧國仁、楊怡珊，1998。作者們發現，記者在撰寫新聞時，不但顧及新聞專業中的客觀原則，寫作中力求報導真實並維護社會正義，但同時又因與消息來源原屬熟識而試圖在文字中讓對方瞭解其深厚友情。作者們強調，記者寫作不但是「目標導向」，且是「多重目標」同時進行，即使這些目標間彼此相互衝突，記者亦能面面俱到，尋得平衡切入點；此點顯示記者有足夠「社會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得以處理人際與自我關係的矛盾。

<sup>170</sup> 章倩萍，1994。Parsigian, 1992, 認為，新聞記者的寫作過程與社會科學研究者的歷程類似，都具有系統性與合乎邏輯的特性。Parsigian因此將新聞寫作程序區分為九個步驟，包括：問題起始、背景瞭解與研究問題初擬、訪談計畫擬定等。Keir, et al., 1986: 222, 亦認為，新聞記者經常使用假設來引導採訪工作，或可稱為故事情節（story lines）：「一個清楚的假設就像是【協助記者】穿越芸芸眾生的導航工具」（插入語句為本文作者添加）。

因而在結論中表示，「記者的認知系統，在產製媒介真實的過程中，扮演了第一層的把關角色」，而新聞可說就是記者認知系統作業下的「選擇性」產物，並不同於社會真實。

許舜青進而以新聞寫作為例，試圖探索記者產製新聞時的心理歷程。她認為，新聞寫作與其他寫作同樣涉及訊息提取（選擇）與重組，可說是記者（寫作者）將內在思維外顯為文字的活動歷程。但新聞寫作旨在報導事實，限制較一般寫作更多，無論是截稿時間、寫作結構規範（如倒金字塔寫作模式）、或新聞室內的組織控制，都迫使記者在處理寫作心智活動時，須同時考慮各種複雜的轉換（transformation）程序，包括對所寫新聞內容的「策畫活動」。<sup>171</sup>

所謂「策畫活動」，許舜青認為在記者寫作之前以及寫作過程中都持續發生，具有「目標設定（goal-setting）」的功能。如在開始撰寫新聞稿前，記者會先分析社會事件，找出重點，然後決定導言寫些什麼，軀幹如何鋪陳。因此，這個「目標」就是寫作文本的「巨命題」，其後的段落（微命題）隨著寫作結構逐漸展開而次第發展。同時，記者也根據此一巨命題決定新聞修辭的使用策略，有時「記實」，有時「避禍」。許舜青發現，記者在寫稿時不時翻閱筆記尋找內容，而這種翻閱有其系統架構，受到寫作目標結構（巨命題）的引導與影響。<sup>172</sup>

與上述有關記者採訪的文獻相較，許舜青指出了新聞寫作也是一種具有結構策畫的思考活動。記者依據有關寫作文體的基模知識，決定整體寫作目標，包括文章結構、導言或軀幹所要置放的主題、以及反映這些結構與主題的新聞修辭與字句。這項研究顯示，寫作與採訪同樣是一

<sup>171</sup> 許舜青，1994。

<sup>172</sup> 所謂「記實避禍」，依陳順孝與康永欽，1998, 1997，的意思，指的是新聞記者如何在寫作中按照自己所知所見全部寫出（記實），或是針對負面事實有所隱瞞（避禍）。兩位作者認為，記實避禍其實是一種報導策略，將新聞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反映在寫作之中。舉例來說，為了模糊消息的提供者，新聞記者經常使用「據悉」、「據了解」、「據指出」、「省方高層人士說」、「某立委」等筆法。雖然兩位作者未從認知角度探討這些字句使用的策略，但由許舜青的研究可推論，記者撰寫新聞或編輯撰寫標題時，一字一句均有其「意義」，並非隨意而為，且與寫作目標一致。

種認知思考的轉換過程：記者對事件的認知框架不但決定了新聞寫作的主題方向，也決定了新聞內容的文字細節。

此外，陳曉開續以認知心理學為基礎，試圖瞭解編輯如何處理每日例行工作。陳氏由「專家生手」理論著手，將編輯工作視為是一項「解決問題（problem solving）」的整體過程。依照認知心理學者的觀點，所謂解決問題係指人們運用或轉換知識完成工作目標的過程，或可說是「去除障礙，達到目標的【框架】手段」。<sup>173</sup>

爲了瞭解新聞編輯們在解決問題表現上是否有所差異，陳氏先將編輯工作依認知過程區分為「問題表徵」與「解決方案」兩階段，前者包括「初步分析（如編輯閱讀稿單）」、「分類基礎（如編輯合併或分開處理稿件）」、「知識結構（如編輯核閱稿件與製作標題所花費之時間）」三者，後者則含「解題策略（編輯發排稿件的順序與數量控制）」、「評估策略（版樣設計）」、與「監控能力（拼版作業之執行流程）」。<sup>174</sup>陳曉開發現，從事新聞編輯的「年資」與解決問題的專家表現具體相關，即新聞編輯年資愈長，愈傾向花費較多時間進行初步分析，<sup>174</sup>對問題組件及關連性瞭解較爲深入，也對問題的整體監控能力較強。<sup>175</sup>此外，年資較久者，製作標題所花費的平均時間較短；在組版時，較爲採取順向解題策略，由手上稿件著手決定其份量以及擺設位置，不必像生手必須等到頭條新聞定案後始能啓動組版動作。

<sup>173</sup> 陳曉開，1995；插入語句爲本文作者添加。

<sup>174</sup> 陳氏發現，較專家型的編輯每日進報社之初，均花費長達十分鐘的時間研讀稿單，旨在事先瞭解當天重要新聞動態，以便掌握新聞之間的關連性，有助於隨後展開的版面設計。而新手編輯花在閱讀稿單的時間僅有三十秒，因而在隨後的版面設計上嚴重拖延。此一發現，與其他領域之專家生手研究結果類似，即專家花費較多時間瞭解問題組件及彼此間之因果連結。

<sup>175</sup> 專家編輯會在組版過程中，不斷監控版面字數，每晚平均3.5次，掌握字數的精確程度高於生手編輯，是一種精密的自我監控（self-monitoring）能力。按照鍾蔚文等人過去的文獻討論（如鍾蔚文，1992；鍾蔚文與臧國仁，1994；鍾蔚文等，1996, 1997），專家的自我監控（或稱後設認知）較強，較有自知之明，對於自己是否犯錯也較能掌握。陳曉開的發現，與傳統專家生手研究的結論相當一致。



以上簡介了影響新聞工作者個人建構真實的一些變項因素。本節延續作者與其他研究者多年來以認知心理學為基本前提的討論，認為新聞工作是一個「解決問題」的資訊處理過程。新聞工作者在建構符號真實時，必須透過表徵問題與解決方案等階段，運用個人知識基礎，設定目標與假設。同時，新聞工作者也須瞭解並突破執行工作時的限制與條件（如新聞常規中的截稿時間、倒金字塔寫作、客觀報導、或版面大小），繼而發現問題、蒐集資料、以致進而分析或詮釋資料、呈現完成報導，逐步往前推進。從上述引用文獻觀之，這種心理「歷程」不但在新聞採訪與寫作工作中明顯可見，由新聞編輯的日常表現中亦可推知。<sup>176</sup>

雖然過去相關文獻有限，論者仍可由此處討論探知新聞工作者無論進行採訪或編輯工作均大量運用先前擁有之知識結構，即認知學者所稱之「基模」或「框架」。框架協助新聞工作者組織、選擇、與詮釋素材，而使用不同框架的新聞工作者其組織、選擇、與詮釋新聞的方式與角度也各有不同。愈是專家型的新聞工作者，先前知識愈為豐富，愈會花較多時間從多角度、多層面組織資料，將複雜或模糊問題拆解成較小次要問題，再轉化為解決方案。<sup>177</sup>

但另一方面，專家型的新聞工作者常由於知識結構較為複雜，成見過深，因而面臨知識僵化的代價：思考被原有基模或框架（即前述「刻板印象」）帶著走，逐漸失去應變能力而難以創新（新聞不就是創新？）。不但採訪工作為個人主觀所限，凡事均有意或在無法知覺地情況下慣以特定角度思考（如某些記者長期具有「反商情結」或環境優先之考量），因而淪為某些利益團體或政府機關之「御用打手」，新聞作

<sup>176</sup> 較新的討論，可參見Chung, et al., 1998. 作者們認為，新聞工作中所涉及的知識基礎，不但與記者個人的資訊處理能力有關，也涉及情境資源的運用，包括新聞團隊以及新聞器材的使用，可稱之為「分散智能（distributed intelligence）」。

<sup>177</sup> 參見鍾蔚文等人，1997。此處所稱之「先前知識」或知識結構，依一般專家生手研究來說，應至少包括領域陳述性知識（如路線知識）、領域程序性知識（如訪問與尋找消息來源的知識）、情境知識（如有關社會如何變化的知識）、以及社會智能知識（知道如何與人相處的知識）等。參見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1996。



品也流為「爛斷朝報」，處處斷章取義。而在編輯方面，吝於變換版面樣式，對於新聞人物則好惡形諸文字，無法就事論事。鍾蔚文與臧國仁稱此種現象為專家的陷阱，名之為「專匠」的表現，也是新聞工作者為個人框架所限的具體例子。<sup>178</sup>

總之，依本節討論所示，在個人層面，新聞工作者受到認知結構影響，自有一套「常人理論 (lay theory)」，一方面根據此理論擬定工作目標，另一方面卻又深深受制於這些知識結構，無法跳脫自我成見之限制。框架可以行舟，亦可以覆舟，其態甚明。<sup>179</sup> 或如vanGinneken所稱，分類與刻板印象均是個人在框架社會真實時無可避免的認知活動，「協助人們簡化世界，建立並組織真實之內在模式」。<sup>180</sup> 而記者就依此模式行事，報導社會事件，但同時也處處受自己框架影響，難以跳脫。

以下介紹影響新聞框架的第三個層次，即文本框架。

<sup>178</sup> 見鍾蔚文與臧國仁，1994。這些刻板印象有時無法知覺，如Meyers, 1992, 發現框架有時源自男女性別差異，即男性記者較關注獨立與分離之社會現象，而女性記者則重視連結與關係。此外，Stocking & Gross, 1989, 亦曾發現，當年導致美國總統尼克森下台的水門案 (the Watergate) 並非資深記者所挖掘，而係兩名新進記者之傑作。Stocking & Gross認為，新進人員先前知識 (「框架」) 尚不完備，樂於嘗試各種新的角度，方能一舉突破成規，找到獨家新聞。

鍾蔚文等人，1997，因而表示，要在新聞工作上更上一層樓，重點在於要突破原有知識框架的限制。雖然教科書常把新聞定義為「人咬狗」的故事，但記者每日所見卻大都不出「狗咬人」的平凡人與事。因此，「創意」可能是記者從「專匠」到「專家」的關鍵所在。所謂創意，就是突破個人框架限制之意。

<sup>179</sup> Altheide, 1974, 曾提醒新聞工作者要注意所謂的「理所當然」知識，以改進新聞報導內容：「新聞工作者首先要注意，任何一件社會事件中，什麼話都可以有人說。因此，新聞工作者要注意為何在其報導中要專注某一觀點，而非其他說法？即使在犯罪新聞中，某些動機或情境也常被視為是理所當然而未深究問題所在 (如為何某些特殊族群總是犯罪者)。簡言之，我們習以理所當然的知識解釋情境，即使這些知識可能不全、偏向」。Altheide這裡所提出的「理所當然」知識，與本節所述之先前知識相關。

<sup>180</sup> van Ginneken, 1998, p. 206.

### 丙、文本框架

由本節所引文獻觀之，稍早有關於新聞框架之討論大多來自社會學家（如Gitlin, Gamson, Tuchman, Breed），關心焦點在於新聞組織如何框限與建構真實。而本節第二部份所討論之新聞個人框架，重點則在企圖瞭解新聞工作者之知識結構如何引導或影響採訪與編輯流程，可謂源自認知心理學的探索。近來另有其他研究者開始重視語言與其他符號訊息如何轉換社會真實，因而強調新聞寫作文本內容不但含有價值判斷，新聞訊息的產製更是一種語言意義之建構過程。

如Lee & Craig曾指出，在爭議事件報導中，新聞媒體常使用某種標誌（label）定義或指涉爭議中的行動者（social actors，如指稱某人為「黑道民意代表」）。<sup>181</sup>這些標誌所強調或忽略的部份，均有特殊語言意涵（connotations），並非自然發生，而係記者與編輯透過文字的選擇與組織功能，傳遞其所認知的重點，以及想要讀者接受的意義。因此，兩位作者認為，新聞框架也是一種語言現象，藉由媒介的組織運作及經濟力量達成。新聞所述之事，並非原先設定的真相（hard reality），而是一種由語言建構的符號真實，或是如Fowler所稱，「新聞乃一涉及社會真實建構的言說行為」。<sup>182</sup>

以上這些說法，超越了新聞學者傳統對新聞寫作所持的觀點。新聞

<sup>181</sup> Lee & Craig, 1992, 此處指出了新聞寫作中極具敏感性的問題，即新聞記者在報導內容中所使用的「頭銜」或指涉，是否有其意義。如記者常在新聞中引用「某高層人士指出」或「政府官員說」，以顯示新聞有其消息來源，但當事人不願表明身份。這種寫法依照傳統新聞學理念觀之，乃不得已之用法，可供新聞記者在消息來源默許的情形下使用。Lee & Craig以及其他語言學者則認為，新聞中以此類頭銜表明消息來源有其語言特殊意義，暗示了記者屈服於政府或其他消息來源的壓力。

van Dijk, 1995, p. 278 曾統計《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在1993年有關「恐怖份子」的新聞報導，發現在335次使用此一詞彙中，多數用在與阿拉伯人相關的新聞中，少數則與哥倫比亞毒品走私有關，有些阿拉伯人（如阿拉法特）則被描述為「前恐怖份子」。但是由美國人或美國友邦發動之政治動亂則極少被稱為「恐怖活動」。van Dijk認為，「頭銜」或「指謂（label）」之使用均與意識型態有關。

相關教科書過去多從新聞結構著手，先則討論倒寶塔形式的寫作要素，繼之論述導言與軀幹寫作的區別以及分類寫作的要旨等。論者嘗謂此種取向過於關注寫作表面訊息 (manifest content) 的「知覺變項」，忽略了相關領域所具備或隱含的深層內涵 (latent content)，因而無法提供較具理論意涵之寫作知識。<sup>183</sup>較新研究取向則改視新聞內容為一種「說故事 (story-telling)」活動、或係媒介言說 (media discourse)、或類似神話 (myth)、或接近敘事結構。此種研究取向的改變，可謂與近代社會科學中的「語言學轉向 (the linguistic turn)」不謀而合，凸顯了語言變項或言說策略在新聞訊息研究中的角色日趨重要。<sup>184</sup>

有關新聞框架的研究文獻中，不乏此類對文本內容之探析，如Pan & Kosicki 認為，框架同時位在個人心智結構以及政治言說之中，可視為是「建構與處理新聞言說的策略」。新聞文本並無客觀意義，而是新聞工作者組合一些符號設計 (symbolic devices)，與讀者之個人記憶及意義建構行為互動後的產物。<sup>185</sup>這些符號設計包括：

——句法結構 (syntactic structure)：指新聞報導中使用主動詞態

<sup>182</sup> Fowler, 1991. Meyers, 1992 發現，由於受到新聞組織常規之壓制與限制，許多記者會在寫作文本中故意隱藏「顛覆」意涵，違反組織主流意識。

<sup>183</sup> 依據臧國仁與鍾蔚文，1995，之討論，由認知心理學的分類概念觀察新聞寫作教科書的內容，可發現早期研究者慣以「知覺變項 (perceptual attributes)」界定新聞寫作，如新聞之形狀 (何謂新聞寫作)、大小 (導言或倒寶塔寫作)、重量 (新聞價值)，缺少由功能變項 (functional attributes) 思考新聞如何「表徵問題」 (如新聞記者如何觀察社會事件)、「提出解決方案」 (如報導目標與執行策略的制訂)、情境與認知的互動 (如記者如何擬定採訪策略) 等。兩位作者認為，不同的歸類方式，顯示了不同行為的表現意涵，未來新聞寫作宜改變「切割」概念的方式，始能反映此一學門理論知識的深度與廣度。

<sup>184</sup> 有關新聞如「說故事」、「言說」、「神話」、或「敘事」之近作甚多，其中尤以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之專論最為豐富，相關討論可參閱蔡琰與臧國仁，1998。「語言學轉向」一詞引自翁秀琪，1997，頁 1 (鍾蔚文等人，1997，稱此為「語言學取向」)，指的是近代興起的批判語言學 (critical linguistic research；見 Fairclough, 1992) 與批判言說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的觀點 (見 van Dijk, 1993)，強調語言結構與社會結構的關連性。

(transitivity) 或語態 (modality; 如助動詞) 以表示語氣強弱或對事件、過程、以及參與者的安排 (見下頁說明)；

- 情節結構 (script structure)，又可稱為故事文法 (story grammar)，如新聞中的倒寶塔寫作係將事件的連結次序 (linking and sequence) 打破，依重要程度分別處理，因而產生與一般敘事結構相異的閱讀型態，愈重要或愈與讀者相關的情節愈易受到記者妥善處理，也因而與記者所認定的「重要性」或「接近性」有所關連；
- 主題結構 (thematic structure)，類似本節討論之假設驗證，即新聞故事中包含接近社會科學邏輯實證原則 (logic empirical principles) 的因果關係，如記者常使用「因為」、「如果」、「假使」等詞彙表達事件組件彼此間的關連，不同因果關係當然產生不同文本框架結構；
- 修辭結構 (rhetoric structure)，即新聞工作者實際選用之修辭風格，Lee & Craig 稱此為「新聞記者以事實偽裝以達成說服目的的一些標準策略」，類似Gamson所提出之框架設計，包括譬喻、短句、視覺符號等。<sup>186</sup>

Pan & Kosicki認為，這些符號設計就是新聞文本框架的基本（上層）結構；透過這些設計，新聞文本達成了組織事實的特定方式。舉例來說，相較於一般陳述事實的敘事句法「（英國）王妃戴安娜顯然已死（That Princess Diana was dead was obvious to all）」，新聞文本經常採用另一套固定句法結構，如「警方說（英國）王妃戴安娜已死（Police said that Princess Diana was dead）」。源於前述客觀報導的

<sup>185</sup> Pan & Kosicki, 1993. 作者認為，在美國政治討論過程中，新聞媒體、消息來源、閱聽大眾三者均涉入政策制訂的框架競爭中，框架因此可謂是一種「建構」過程，主要分析對象是新聞文本內容中的面向，包括句法、劇本情節、主題、與修辭等。Rhee, 1995, p. 3 強調，框架一方面是什麼訊息的主要故事或想法，另者也代表解釋外在事務的基模，是人們用來知覺、確認、或解釋訊息的主要基礎。因此，框架包含了：新聞故事的組織主軸、詮釋基模、以及社會與情境背景三者。

<sup>186</sup> Lee & Craig, 1992; Gamson & Modigliani, 1989.



信條所限，新聞媒體不會以前者之陳述方式報導事實或顯露喜怒態度，而須使用類似後者之句型，引用第三者（尤其是權威性的第三者，如此句中之「警方」）以顯示此一陳述乃客觀事實，且是該第三者所投射（projective）的關鍵性事實，並非媒體自己所創造。<sup>187</sup>

其次，Gurevitch & Kavoori曾藉由新聞言說中的故事順序（story order）討論文本中的情節結構，並以「巴勒斯坦青年向以色列兵士投擲石塊，遭到施放催淚瓦斯後復遭毆打逮捕」為例說明。他們發現，法國電視將丟擲石塊置於毆打之前，接著處理施放瓦斯與毆打巴勒斯坦青年，最後是青年遭逮捕帶走。美國媒體報導的時序則是青年受毆後攻擊士兵，施放瓦斯情節另外處理，稍後才予單獨播出。以色列電視新聞則未播出毆打，亦無催淚瓦斯，更無逮捕，唯一出現的鏡頭是以色列士兵的吉普車駛過平靜無事的街頭。這種不同的情節鋪陳，透過時序有異的敘事過程，清楚地描繪了不同新聞媒體有意傳達的意義。<sup>188</sup>

至於在主題結構方面，亦可引Gurevitch & Kavoori之討論為例。作者們曾分析四個國家的七家電視媒體如何報導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於1987年的一次重要裁軍演講，發現顯著相異的敘事結構。美國三家電視台採取較為批評的角度：先是以帶有挑戰意味的修辭報導演講，如稱其演講為「有魅力的攻勢」，充滿「花言巧語（flowery language）」，

<sup>187</sup> Pietila, 1992, 曾針對新聞敘事體中的敘事者言說以及行動者言說有長篇討論，認為即使敘事者（如記者）以引用行動者（如警方）的言說來達到客觀立場，其內容仍傳遞了敘事者所同意的觀點。這種情況顯示新聞寫作內容可稱做是呈現策略（presentation strategy）。Ericson et al., 1991, p. 188 認為，新聞記者雖然強調客觀報導，但經常在新聞內容中嵌入自己的觀點，尤其是在新聞開頭與結尾的地方，以便能框住整篇文章的意旨。雖然記者並不明說其知識來源，但過去研究曾發現記者知識多半源自過去的新聞或隱藏的消息來源。

<sup>188</sup> Gurevitch & Kavoori, 1994, p. 11. 類似分析見鍾蔚文，1993，針對「邁阿密暴動」在《人民日報》與《紐約時報》的呈現方式所進行的討論。《人民日報》以時序（chronological order）作為報導的主要情節，暗示此一事件的發生起源自黑人暴民對白人社會的不滿。《紐約時報》則以客觀報導的倒寶塔形式將事件打散，以重要細節分列安排，使事件原委顯得較為模糊。

隨後匆匆帶過戈巴契夫對雷根總統的批評，但繼之花費較長時間介紹甫出獄之蘇俄異議人士沙卡洛夫近況。作者認為，這種對比係將戈巴契夫與美蘇冷戰間之對立主題相互連結，顯示了美國媒體對其演講的不信任感。而在英國與德國的電視報導中，有關沙卡洛夫的新聞則被採擷用來正面支持戈巴契夫的改革政策。同樣主題（或主角）透過不同的文本因果連結，因而產生了完全相異的符號內容，改變了媒介框架的結構。

又如在修辭結構部份，新聞媒體亦常藉由特殊言說型式表達對事實的陳述。如記者為了維持中立形象，常努力在新聞中建構「傳話者」的角色，因而在質疑受訪者時，夙以「一般大眾認為」、「外界認為」、或「民意調查發現」等語詞指出意見乃屬「他人」。藉由此種傳話者的角色，新聞記者進一步管理與操縱了【對話中的】發言位置，來建構新聞訪問中的事實成分。

此外，Pan & Kosicki 也提出有關「用字 (lexicon)」的討論，因為任何字詞的選用往往都奠基於認知基模且與上述符號設計相互輝映。兩位作者認為，新聞文本中含有大量此類認知選擇的結果，如記者慣稱政府消息來源為「官方 (the Administration)」或「當局 (the authorities)」，因而影射了所引事件或聲明的權威性。<sup>189</sup>又如指稱伊拉克總統Saddam Hussein為「獨裁者」，新聞報導進而將Hussein與一些具有侵略他國記錄的領袖如希特勒、史大林等人相提並論。<sup>190</sup>

這些用字不但具有對讀者「洗腦」的效果，可以用來「提醒

<sup>189</sup> 此類例子甚多，如國內記者報導有關總統新聞時，常慣以「層峰」而不指名道姓以顯示其「隱密性」。翁秀琪之近作，1998，1997則發現有關「宋楚瑜辭官事件」中，某些報紙習以「宋楚瑜」與「宋」指稱台灣省長宋楚瑜，而以「總統」與「李總統」稱謂總統李登輝，顯示了媒體不同處理方式以及有意展現的此卑彼尊意涵。Gastil, 1992, p. 486 亦曾討論此種關鍵詞語的使用，認為常被新聞媒體用來傳達不同的組合，凸顯不同的關係。Gastil指出，新聞記者強調地位而非名字，正可以有效地操縱聽者與讀者，將其注意力轉移至某種角色或類別。類似討論可見Fowler & Kress, 1979。

<sup>190</sup> 新聞媒體在波灣戰爭期間如何框限真實，曾是新聞學者廣加探討的議題，參見Bennett & Paletz, 1994; Denton, Jr., 1993; Mowlana, et al., 1992. 其中，研究者曾深究新聞媒體如何開始將伊拉克總統Hussein與希特勒相提並論，因而提供了伊國「侵略」科威特的框架。如Dorman & Livingston,

(reminders)」或連結其他語言意涵或意識型態，也有鼓舞情緒與激勵思考的作用，因此達成「框架」議題的目的。Trew嘗謂，「透過少數一、兩個字，我們得以清楚察其言、觀其行」，誠哉斯言。<sup>191</sup>

此外，如Lipari的近作曾分析新聞報導中的立場副詞（stance adverbs），以瞭解新聞文本如何反映社會權力的正當性。Lipari認為，新聞文本係社會與政治言說的一種，因而也參與了社會與政治生活的建構。而立場副詞乃立場符號之一環，旨在表達寫作者對事實的態度，並指導（guide）讀者對某特定解釋有所領悟或期待。Lipari以「明顯地（obviously）」與「可能地（presumably）」兩個副詞為例，發現前者被記者用做對經驗世界觀察的證據（如：「馬龍白蘭度看起來『明顯地』興奮迎接他甫出獄的兒子」），而後者則係寫作者對事實的懷疑（如：「電視新聞網在週四的新聞中報導，一位『可能』係聯邦調查局的幹員，在腋下夾帶了一個白色盒子」）。簡言之，前者之語態功能（modality）在於將推論轉變為可信事實，而後者則用來表達不確定感，兩者區隔十分清晰。作者因而指稱，即使在號稱價值客觀的新聞文本中，立場符號與用字的使用顯示了對真實世界的評估、創造、與正當性建構。新聞記者雖然被客觀原則約束，仍然會使用修辭或其他語言機制來表達寫作意圖，雖然這種意圖常須透過消息來源的引用「借力使力」。<sup>192</sup>

由以上討論可知，新聞文本框架可謂就是「將故事整理為一體（coherent whole）的中心意旨」，而此一「整理過程」乃藉由選用（或排除）以及強調（或忽略）上述語言結構與字詞達成。總結來說，

---

1994，發現，一些報紙專欄作家與國會議員均曾在伊拉克進攻科威特之前數週將Hussein比做希特勒，但此種連結（analogy）並未廣受重視。直到美國總統布希決定出兵科國且公開指責Hussein之行徑類似當年之希特勒，此一連結立即家喻戶曉，也「成功地」製造了美國政府所需要的「敵人」角色。作者們在結論指出，美國新聞界在整體事件中未能由歷史情境中詳細檢視政策，僅被動回應政府設定的主題，完成記事（chroniclers）的工作。

<sup>191</sup> Trew, 1979, p. 117.

<sup>192</sup> Lipari, 1996.



研究者強調新聞文本乃是一種言說形式，包含了各種符號設計，目的在於透過不同層次的語言使用策略來達成界定社會真實並取得讀者共識（consensus）。因此，「新聞故事中的字詞選擇與組合並非雕蟲小技（trivial matters），卻是決定辯論情境、議題定義、引發【讀者】心智再現、與啟動討論的重要利器」。<sup>193</sup>

鍾蔚文與臧國仁之近作曾以「一九九七香港回歸」事件進行文本分析，探討七月一日當天各地（國）報紙如何在新聞與標題中呈現與詮釋此一盛事。首先，《人民日報》主要標題為「中英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香港隆重舉行」，可謂客觀表現了事件的重要議題與主要參與者（social agents）。但其次標則明顯披露立場，也列出了事件中的重要「主角」：<sup>194</sup>「中華民族永載史冊的盛事、世界和平正義事業的勝利；江澤民主席莊嚴宣告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李鵬總理等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及英國查爾斯王子布萊特首相等出席」。北京英文《中國日報》主要標題則為「Home At Last（終於回家）」，香港在此隱藏未現（「誰」回家？），顯示該標題對事件的主要修辭詮釋乃在「回家」這個隱喻。此種呈現方式同樣反映在該文的導言中：「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零點，在中國（the Chinese nation）盼望了一五六六年後終於來到」。

與此相較，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的報導顯得離情依依，恰與中共報紙的回家譬喻相左：「Final farewell to Hong Kong（向香

<sup>193</sup> 引自Pan & Kosicki, 1993, p. 70. Fowler, 1991, p. 11 在論及新聞之社會建構時，特別提及「選擇」機制：「語言之選擇乃伴隨著轉換（transformation）而來，即根據不同政治、社會因素在呈現中所做的不同處置」。

<sup>194</sup> 有關新聞主角或「行動者」之討論，參見van Leeuwen, 1996, p. 38 之精彩討論。作者認為，在語言再現的過程中，哪些行動者受到採用或排除（exclusion）均有其意涵，研究者的責任就在透過語言符號的軌跡，探索文本作者企圖表現的圖像為何。有些行動者的角色遭到「壓縮（suppression）」，有的則被排擠為「背景」（backgrounding）；有些則屬代言人（agent），另有些則是言說目標對象。總之，van Leeuwen強調，文本中的角色乃句法結構中的重要構成條件，透過對角色的分析，我們得以對言說再現的意涵有較深的體會。



港最後道別)」；此處部份隱藏之行動者反而是「（我們）英國」，完全遭到忽略之行動者則改為中國，在修辭上暗示了英國視中國為他人（others）的心理。<sup>195</sup>而更為有趣者，則是《泰晤士報》之導言：「在昨晚極為激動與嚴肅的典禮中，英國將其最為成功且現代化的殖民地『讓渡（yield）』給中國政府」（雙引號為本文作者添加）。「讓渡」此字原意複雜，包括「交還（hand over）」、「讓步（concession）」、「放棄（give up或relinquish）」、「停止對抗（cease opposition）」、或「因壓力而棄守（give way to pressure）」等。<sup>196</sup>以涵意如此豐富多元，且從正面到負面均有之動詞描述事件，足以顯示英國（人）面對香港交還中國的心情。此一情況也反映了本節所稱，「用字並非雕蟲小技」，其意涵與「句法相互輝映」的說法，並非虛言。

鍾蔚文與臧國仁認為，台灣媒體在該事件的立場最為「尷尬」，源於香港回歸固然是百年歷史盛事，但中、英談判並未包括台灣，使得台灣媒體在報導中既要保持歡悅心態卻又得有所矜持，既要保持客觀又須避免涉入過深。因此，《聯合報》之標題為：「香港易幟，主權回歸中國」；《中國時報》標題為：「香港回歸，主權移交完成，解放軍進駐；特區政府成立，臨立會就職」；《中央日報》：「香港主權正式移交中共」；《自立早報》：「香江易主，五星旗隨中國國歌升起」。這些報紙的標題內容雖各有差異，但整體觀之並未如《人民日報》或《泰晤士報》使用情緒用語（如「統一」、「回家」、或「讓」），在句法上則普遍以「香港」為主體（actor），中國因而成為被動者（passive

<sup>195</sup> 相對於《人民日報》將新聞主要行動者個人化（如列出江澤民、李鵬、查爾斯王子、布萊特等「菁英人士」），《泰晤士報》的作法可稱之為集體化（association），即將香港視為集合名詞（collectivization；見van Leeuwen, 1996, p. 49）。此外，van Leeuwen並稱，排除有時是單純無害（innocent）之行爲，乃假設讀者應對細節已有所瞭解，如此處將「英國」省略，亦是一種「我方（us）」的同理心（參見Trew, 1979）。而此標題故意忽視中國，則屬van Leeuwen所稱之「強烈排除（radical exclusion）」，表達了某種特殊意識型態的呈現方式（pp. 38-39）。

<sup>196</sup> 摘自P. B. Gove (ed.) .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 n.p.: Merriam-Webster.

role)、接收的一方(receiving end)、事件的背景者(backgrounders),或較不重要(circumstantial)的部份。<sup>197</sup>而台灣報紙使用較為中性之動詞(如易職、移交、易主等),有意彰顯事件第三者之旁觀角色,其態甚明。

至於香港英文《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News)》,主標僅有「移交(The Handover)」二字,附加「Jiang in pledge on rights and non-interference(江【澤民】保證【人】權與不干涉)」副標,關心焦點不言可喻。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標題為:「中國重享(resumes)對香港之控制,結束英國156年統治」,並附以兩幀新聞圖片,一幅為中國禮兵在移交典禮升上五星旗,另幅則為港督彭定康低頭接受港府英國國旗之景象,試圖結合視覺符號與修辭結構,共同框塑此一事件為國際領土之轉移。該報隨後復在新聞內文中加以「一塊資本主義下的自由(free-wheeling)領土轉移為共產統治」等對立描述,亦有「我方(資本主義)」對抗「他方(共產主義)」的意涵(us vs. others),顯示了美國媒體對香港交還給中共後的前途尚有疑慮與不安。<sup>198</sup>

由本節對文本框架的介紹觀之,語言研究者近期對新聞言說的探索已急速擴充了新聞學對文本訊息的定義,也顯示新聞不僅是新聞工作者

<sup>197</sup> van Leeuwen, 1996, pp. 43-44 曾詳細討論文句中主體與受體的角色功能。延續其他批判語言學者的觀點(如Fairclough, 1992, Fowler, 1991, Hodge & Kress, 1979), van Leeuwen認為主體化(activation)乃是在文本再現中賦予主動與動態的力量;反之,受體化(passivation)則代表了弱者(underdog)的角色,或是接收的一方。此外,在文法上,主體者乃被描述為主動者,或行為者、有感覺者(sensors)、或說話者,因此也成為文本中的前景(foregrounders)或最重要的部份,參與了語言再現。

<sup>198</sup> 此處討論之《紐約時報》有關香港回歸之新聞處理,值得注意者為其以照片搭配新聞文字的方式,可參見Barkin, 1989,有關電視新聞之文字與視覺符號之討論。Barkin認為,電視新聞的特色,除了其口語內容(verbal content)外,電視句法結構(TV syntactic)亦有框架的效果,包括其特殊時間序列、口語內容、以及視覺符合等的組合:「任何口語內容脫離視覺組合都無法產生意義」。目前對報紙新聞中如何以文字搭配新聞圖片這種類型(genre)產生框架效果則尚乏研究。

的文字表現，也是影響與引導讀者思考的重要機制。<sup>199</sup>幾項國內研究會分別以此為例，試圖瞭解讀者如何受到文本框架之啟動與限制。如朱玉芬曾分別以傳統新聞倒寶塔寫作與一般正寫方式測試讀者的閱讀情感強度，發現前者（即依重要性排列之寫作方式）較無法引發讀者情感涉入。即使在導言部份，雖然此一寫作結構原應是新聞故事最重要的一段，也無法引起讀者閱讀興趣；相對而言，敘事性形式的寫作較能引發讀者強烈情感反應。<sup>200</sup>這種現象也難怪造成研究者一方面認為新聞文本（或其他形式的文本）有「再現」部份真實的能力，足能框限閱聽人的認知活動，<sup>201</sup>另一方面卻也強調新聞報導（尤其是電視新聞）所使用的倒寶塔形式嚴重破壞了閱聽人理解新聞的興趣與意願（a disaster for the readers），使得讀者與觀眾難以自新聞中連結歷史情境，建構意義。<sup>202</sup>

<sup>199</sup> Bird & Dardenne, 1988, 曾以「視覺化」、「符號化」、「授權（authorizing）」、「舞臺化（staging）」以及「信服」五者描述新聞如何再現社會真實。作者們認為，透過戲劇性的譬喻與照片（如上述有關「回家」的說明），事件中的視覺部份得以傳遞給讀者。即使有些部份受到隱藏而難以察覺，新聞報導仍會將事件中的人物、過程、或狀況一一符號化，以便達到框架的效果。事件的情節、內容、地點、人物、或甚至道具，都有可能為新聞報導納入，用以說服閱聽大眾新聞內容即是事實。Bird & Dardenne 強調，新聞文本就是媒介框架的核心內容（core ingredients）。

<sup>200</sup> 朱玉芬，1995。此一結果（文本結構影響讀者閱讀）同樣反映在陳韻如，1993；張文強，1993；林珍良，1994之研究結果。如陳韻如曾在其結論中如此說明：「新聞框架可能『框限』受眾對新聞事件的認知，使他們注意到文本所提示的那一面『真實』，並且引導他們朝那一面去『看』真實。但是如果受眾具有較多先前知識，也可能突破單一新聞框架的限制。然而人們由新聞媒介得知訊息乃是日積月累，如果新聞媒介長期為受眾所建構的社會真實有其特定範圍……面對此種影響更氾（sic）、更深遠的新聞框架，受眾是否也可能超越此一限制呢？（頁72-73）。」

<sup>201</sup> 參見Fowler, 1991, 對「文本理解」的討論。基本上，Fowler認為基模對讀者的詮釋極為重要，因為讀者與文本的互動就奠基於心理認知。換言之，新聞故事對讀者而言是否具有意義，端視讀者之基模知識是否能解讀文本訊息。Fowler並稱，基模雖是個人的知識結構，但是此一結構卻也是同一社區民眾所擁有之默識（tacit knowledge）的一部份。

Fang因而認為，透過句法與文字的選用，寫作者（包括記者）完成了賦予讀者特定框架的任務。在每個社會文化中，這種句法與文字所構成的特殊意義都十分明顯。<sup>203</sup>換言之，語言絕非中立體系，選擇某種句法或用字都代表了記者或編輯如何認知或瞭解事件，也暗示了記者與編輯希望閱聽大眾如何認知與瞭解。新聞語言因此可謂是處於新聞工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一種界面：一方面寫作者受到語言機制的制約，另一方面，讀者亦受到文本內在語言形式的限制。這種局面使得新聞工作者挑選某種形式或內涵而非其他形式與內涵，以及讀者記得或取用（retrieve）某些文本內容而非其他內容，均成為研究新聞文本框架時亟需深究與觀察的重要議題。<sup>204</sup>

<sup>202</sup> 此句引自Bird & Dardenne, 1988, p. 77. 作者們認為，對寫作而言，倒置塔寫作雖然不失為有效率的設計但讀者卻難以閱讀，因此種設計有鼓勵讀者進行「半閱讀（partial reading）」之嫌，因而無法記得故事的主要情節。除非一則新聞故事富有敘事性（即有原因、結果等邏輯關係或有高潮情結），否則讀者無法回應故事形式中的訊息。Lewis（1994）亦曾強烈抨擊新聞寫作形式違背敘事原則，將社會事件拆解為彼此不相連結之片段，使得閱聽大眾無法（也因而沒有意願）理解故事內容，因此更無法記憶或保留對事件的情節描述。閉門見山式的報導策略常迫使讀者掃瞄（skim through）新聞事件，或僅閱讀導言，因而無法深入「參與」與新聞文本互動。

<sup>203</sup> Fang, 1994.

<sup>204</sup> 此一觀點取自Blumler, et al., 1985. 作者此處討論重點，在於顯示新聞工作者、讀者、文本三者互動頻繁，使得訊息接收成為複雜過程。類似說法亦可參見Fair, 1996; Woo, 1994; van den Berg, et al., 1992.



## 伍、結論

本文由傳統新聞學之重要變項入手，首先討論了影響新聞產製的主要因素，包括新聞價值與定義、新聞常規與流程、以及消息來源。本文隨後除對傳統新聞定義提出省思與批評外，亦檢討新聞與真實的關係。簡言之，本研究認為奉客觀原則為新聞專業意理之首要信條嚴重簡化了新聞報導與社會真實的互動關係，也無法澄清新聞媒體在轉換社會真實過程中的建構意義功能。本研究建議改以框架概念討論新聞組織或個人如何透過選擇與重組機制，表現對社會事件的詮釋與分析。本研究接著以建構主義為基礎，分由組織、個人、與文本三個面向討論新聞框架內涵結構。

本研究強調，新聞產製基本上是一項不斷受到特殊條件（包含組織常規、個人認知、與語言結構）制約的社會行動，在人物選擇、主題界定、事件發生原因的推論、或情節鋪陳方面，新聞報導內容均與此一隱藏之制約行動（implicit rules）息息相關。框架在新聞中的影響力處處可見，決定了哪些素材有關或無關、哪些人物是主要行動者應置於前景而哪些僅應搭配表現、哪些引句應予直接摘錄或摘錄多少。雖然新聞工作者對這些影響力未必能清晰分辨，但從組織、個人、與文本層次觀之，框架的確是媒介再現社會真實的重要影響因素。

延續過去有關框架之討論，本研究認為新聞框架既是媒介言說的主要架構，也是限制媒介行動的規範（constraint）。如在組織層次，路線設置原係著眼於協助新聞工作者進行採訪工作，但行之有年的分線方式往往發展成為魚網般的科層組織，約束了過往消息素材獲得採用的機會。<sup>205</sup> 又如在個人層次，框架原是新聞工作者解決問題的基本知識結

<sup>205</sup> 將框架視為既是「限制」又是「架構」，原是Gamson et al., 1992 對框架理論的卓越貢獻。由「限制」的定義觀之，框架像是人們觀察世界的鏡頭，凡屬此鏡頭納入的實景，都成為認知世界中的部份；不在此界限之

構（先前知識），也是面臨採訪或編輯任務時的心理認知基模；愈是專家型的新聞工作者，認知基模（或資料庫）愈為龐大，知識串節彼此連結也愈為緊密，環環相扣，相互呼應。<sup>206</sup>但如上節所述，龐大知識結構往往也是創意殺手，知識豐富反而是致命傷；面對複雜多變的社會現象，專家慣以原有心理基模瞭解外界，框架成為吸收「新」知的最大障礙。

另如在文本層次，語言與故事基模（story schema）原是新聞結構中的主要溝通工具，但受限於文化與社會情境因素，任何一種語言似都無法完整表達意義，故事基模的種類亦非隨機或無限。這種「窘境」，顯示框架既是轉換真實的基礎與原則，也是規範此一轉換的界限。換言之，新聞工作者一方面倚賴框架提供基本思考架構以便再現真實，但卻又受限於此一思考架構，使得真實再現並不同於原始真實，新聞工作之複雜與困難度由此可見。

同理，雖然新聞工作者常強調新聞就是事實（facts），但由本文討論觀之，任何事實都有多種面向，新聞工作者受限於組織常規與個人框架，報導內容只能掌握少數有限面向，實則難以完整反映事實。何況這些少數面向還經常受到事件當事人（消息來源）的影響，使得社會行動的事實本質難以確認。或如Garnson所稱，事實本無意義，僅存在於框架之中：框架組織了事實，且讓事實與事實之間產生連貫性，也將某些事實凸出而將其他事實捨棄。新聞因此僅是表現事實為故事的一種手

---

物，則視而不見。由「架構」的定義來看，人們藉由框架建構意義，以了解社會事件發生的原因與脈絡。前者代表了取材的範圍，後者則顯示與其他社會意義的連結，是一種觀察事務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 or world-views）。這種觀點基本上將框架看做是我們探索外在世界的「界限」與「內涵」，所以框架既是形式亦是內容。

<sup>206</sup> 引自鍾蔚文與臧國仁，1994。由於篇幅所限，此地無法討論記者之知識結構，但作者們曾常識將其分為陳述性知識與程序性知識，前者意指事實知識或對世界的瞭解、事件知識、以及對新聞專業的瞭解（如會寫新聞等）；後者則包括「如何做」的知識，知道如何採訪、如何問問題等。知識結構就是框架的意思，在於記者可能在善知如何採訪之後，就認為採訪只有一種方法，因而吝於再去創造知識。可參見鍾蔚文等，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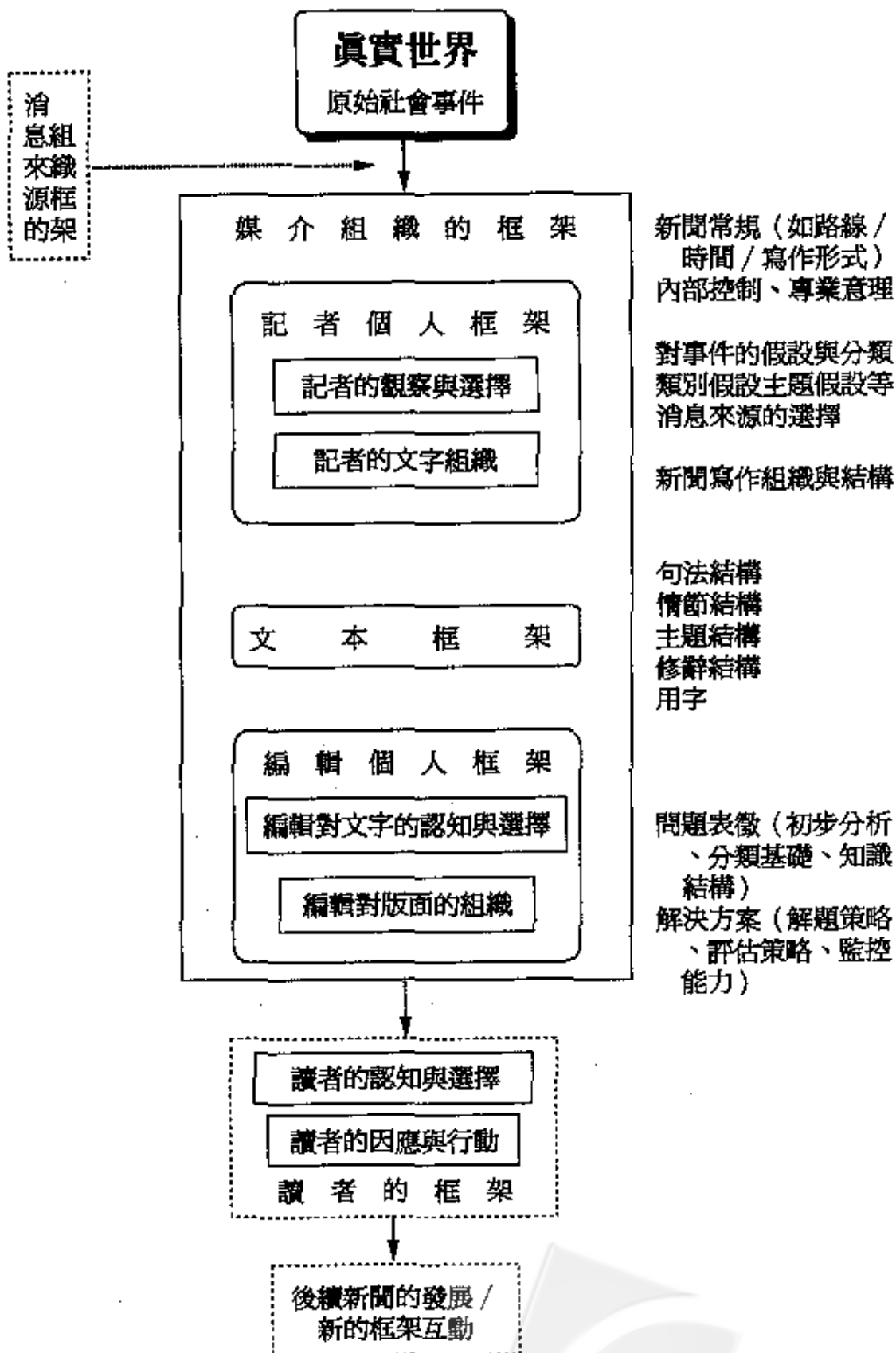
法，而非單純僅為資訊之傳遞。<sup>207</sup>

總之，如〈圖三〉所示，新聞框架在再現真實的過程中扮演了動態與聯繫的角色，不斷在媒介訊息流動的各個層次與面向影響新聞產製流程。這種動態過程顯示過去以「客觀報導」為主的概念難以解釋新聞報導所涉及的複雜內涵，也無法具體反映新聞建構或再建構社會真實的特質。未來有關新聞客觀或主觀的論戰或當偃旗息鼓，轉將研究焦點置於探索新聞組織、個人、以及文本訊息如何框限與轉換真實，以及此一轉換機制如何連接與產生意義。

此處所未及討論者，則係「情境」對新聞框架的影響，尤其是新聞工作者之個人特質（personality）或世界觀如何影響新聞假設的設定：如較具社會智能者（social intelligence）<sup>208</sup>是否較能處理人情互動關係，因而較易跳脫個人框架的限制？或者，較具創意且對社會脈動較具觀察力者，則較無意接受組織框架規範，因而較可能具備專業新聞工作者之特徵？至於社會事件中的議題如何影響新聞框架，在本文中未及闡述，將留待另文再予討論。

<sup>207</sup> Gamson, et al., 1992, p. 374 亦曾如此表示，我們每天在媒體製造的世界形象中漫步，並以這些形象建構對議題意義的觀感。我們用以觀察這些形象的鏡子（指媒體）並非中立，而是權力者的說法，或是菁英階層的觀點。這些說法的擁有者常試圖將整個言說轉換過程看起來像是中立或正常，或將社會建構的疤痕隱而不見。

<sup>208</sup> 所謂「社會智能」，可定義為個人處理現狀、追述過去、並策應未來工作的知識。換言之，個人以自己擁有的資源，評估人生情境，以達成未來目標所運用的知識。其內涵包括個人知識結構、工作特質、與對情境經營的互動關係，意義接近認知心理學的社會智商。可參見Cantor & Kihlstrom, 1987；鍾蔚文等人，1997；臧國仁、楊怡珊，1998。



圖三：新聞框架的基本內涵結構\*

\* 本文未及討論者均以虛線表示。



## 參考書目

### 一、中文部份

- 中華民國新聞評議委員會（1997）。社會新聞記者與警方消息來源互動關係之研究。台北：中華民國新聞評議委員會。
- 王洪鈞編著（1986）。新聞採訪學（初版十五刷）。台北：正中。
- 王麗美（1994）。報人王惕吾：聯合報的故事。台北：天下文化。
- 朱玉芬（1995）。新聞結構對情感及興趣之影響。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金銓（1981）。大眾傳播理論。台北：三民。
- 林珍良（1994）。新聞言說結構對資訊處理策略影響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冷若水（1985）。美國新聞與政治。台北：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
- 胡晉翔（1994）。大眾傳播與社會運動——框架理論的觀點。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施祖琪、臧國仁（1998）。風格與新聞風格——有關傳播與語言問題的初探。輔仁大學大眾傳播所主辦「媒介與環境」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
- 袁乃娟（1986）。電視新聞相關人員的專業態度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高惠宇（1994）。創辦人嘉勉 頒獎萬元美金。聯合報系月刊，第135期（三月號），頁6-7。
- 翁秀琪（1998）。批判語言學、在地權力觀和新聞文本分析：宋楚瑜辭官事件中李宋會的新聞分析。陳世敏主編，傳播論文選集1997。台北：中華傳播學會。
- 翁秀琪（1997）。批判語言學、在地權力觀和新聞文本分析：宋楚瑜辭

- 官事件中李宋會的新聞分析。中華傳播學會1997年會發表論文，台北：深坑。
- 翁秀琪等人（1997）。新聞與社會真實建構——大眾媒體、官方消息來源與社會運動的三角關係。台北：三民。
- 許舜青（1994）。新聞寫作歷程初探。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新生（1990）。媒介批評。台北：五南。
- 陳一香（1988）。電視爭議性新聞之消息來源及其處理方式與訊息導向之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順孝、康永欽（1998）。記實避禍的報導策略——傳播者與社會情境互動的本土分析。陳世敏主編，傳播論文選集1997。台北：中華傳播學會。
- 陳順孝、康永欽（1997）。新聞記者如何「記實避禍」？——傳播者與社會情境互動的本土研究。中華傳播學會1997年會宣讀論文，台北：深坑。
- 陳秉璋（1985）。社會學理論。台北：三民。
- 陳曉開（1995）。新聞編輯的專家與生手解題表現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慧容（1992）。中時與聯合兩報的獎懲規定及實例。習賢德編，台灣新聞事業問題解析。台北：文展。
- 陳韻如（1993）。新聞事件的意義建構與受眾認知關係之研究——從受眾推論看新聞框架之影響。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彭偉文（1994）。陳玉慧科威特建功 內外勤同仁合作無間。聯合報系月刊，142期（十月號），頁28-30
- 彭家發（1994a）。客觀性原則的探討。臺北：正中。
- 彭家發（1994b）。新聞記者「客觀」包袱之利弊得失。臧國仁主編，新聞「學」與「術」的對話。臺北：政大新研所。
- 彭家發等編著（1997）。新聞學。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 屠乃瑋（1995）。評論與回應。臧國仁主編，新聞工作者與消息來源：新聞「學」與「術」的對話III。臺北：政大新研所。

- 張文強（1993）。態度對新聞閱讀之影響。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碧華（1992）。結構/個人：影響我國新聞從業人員專業化程度及其對新聞產業工會態度之相關因素研究——以「中國時報」、「自立早報」為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錦華（1994a）。傳播批判理論。台北：正中。
- 張錦華（1994b）。新聞的真實與再現：以李瑞環事件相關報導為例。臧國仁主編，新聞「學」與「術」的對話。臺北：政大新研所。
- 張錦華（1991）。新聞與意識形態。《報學》，八卷四期，頁176-183（收錄於同作者，1993，媒介文化、意識形態與女性——理論與實例。台北：正中）。
- 葉斯逸（1998）。由敘事理論角度分析媒介對「二二八事件」的報導。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章倩萍（1994）。新聞記者的認知策略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喻靜媛、臧國仁（1995）。記者及消息來源互動關係與新聞處理方式之關聯。臧國仁主編，新聞工作者與消息來源。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 楊秀娟（1989）。我國新聞從業人員專業化程度之研究——以報紙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臧國仁（1998）。消息來源組織與媒介真實之建構：組織文化與組織框架的觀點。《廣告學研究》，第十一集，頁69-116。
- 臧國仁（1995a）。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的互動——系統理論的觀點。《國科會研究彙刊——人文與社會學科》，五卷二期，頁264-284。
- 臧國仁主編（1995b）。新聞工作者與消息來源：新聞工作者與消息來源：新聞「學」與「術」的對話III。臺北：政大新聞研究所。
- 臧國仁（1994）。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的互動——系統生態學的觀點。傳播生態學學術研討會（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所主辦）。
- 臧國仁（1987）。美國新聞媒介的世界觀。《美國月刊》二卷七期，頁

90-101。

臧國仁、鍾蔚文（1997a）。時間概念與新聞報導——初探新聞文本如何使用時間語彙。中華傳播學會1997年度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台北：深坑。

臧國仁、鍾蔚文（1997b）。框架概念與公共關係策略——有關運用媒介框架的探析。《廣告學研究》，第九集，頁99-130。

臧國仁、鍾蔚文（1995）。新聞記者與生手研究（二）。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專題研究計畫（未發表）。

臧國仁、楊怡珊（1998）。新聞記者的社會智能：再論記者與消息來源之互動。專家生手研究群成果發表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六月二十日）（係由國科會委託之研究群舉辦）。

臧國仁、鍾蔚文、黃懿慧（1997）。新聞媒體與公共關係（消息來源）的互動。陳韜文等主編，大眾傳播與市場經濟。香港：鑪鋒學會（頁141-184）。

鄭瑞城（1991）。從消息來源途徑詮釋媒介近用權。《新聞學研究》，第45集，頁39-56。

鄭瑞城（1988）。《透視傳播媒介》。台北：天下。

鄭瑞城、羅文輝（1988）。電視新聞消息來源人物之背景與呈現方式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蔡琰、臧國仁（1998）。新聞敘事結構：對新聞故事的理論分析。中華傳播學會1998年會宣讀論文，台北深坑：世新會館。

劉蕙苓（1989）。報紙消息來源人物之背景與被處理方式之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蔚文（1993）。兩岸媒體對對方報導之內容分析。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

鍾蔚文（1992）。從媒介真實到主觀真實。臺北：正中。

鍾蔚文、臧國仁（1994）。如何從生手到專家。臧國仁主編，《新聞學與術的對話》。臺北：政大新聞研究所。

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1996）。傳播教育究竟應該教些什麼？一些極端的想法。翁秀琪、馮建三主編，國立政治大學新聞教育六十



- 週年論文彙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 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陳順孝（1997）。探討記者工作的知識基礎——分析架構的建立。中華傳播學會1997年度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台北：深坑。
- 鍾蔚文、臧國仁、陳憶寧、柏松齡、王昭敏（1996）。框架理論再探——以臺大女研社A片事件為例。翁秀琪、馮建三主編，國立政治大學新聞教育六十週年論文彙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 鍾蔚文、臧國仁、陳韻如、張文強、朱玉芬（1995）。新聞的框架效果。臧國仁主編，中文傳播研究論述——「一九九三中文傳播研究暨教育研討會」論文彙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研究中心。
- 魏誠（1995）。從編輯室觀點到讀者觀點：從學術性研究到實務研究——聯合報研發小組小團體討論總結報告。閱聽人及訊息策略學術研討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
- 羅文輝（1995）。新聞記者選擇消息來源的偏向。《新聞學研究》，第五十集，頁1-13。
- 羅文輝、鍾蔚文（1992）。報紙與電視如何報導民國八十年的第二屆國代選舉。亞洲協會委託專題研究報告。
- 羅文輝、蘇衡、林元輝（1996）。如何提昇新聞的正確性——一種新查證方法的實驗設計。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專題研究結案報告。
- 蘇衡（1995）。消息來源與新聞價值——報紙如何報導「許歷農退黨」效應。《新聞學研究》，第五十集，頁15-40。
- 蕭蘋（1989）。環保記者專業意理及其影響因素之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二、英文部份

- Ahern, T. J. (1981).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news coverage in elite U. S. newspaper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also see T. J. Ahern (1984).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coverage in U. S. newspapers. In R. L.

- Stevenson & D. L. Shaw (eds.). Foreign News and the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 Altheide, D. L. (1974). Creating Reality: How TV News Distorts Event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Altheide, D. L., & Snow, R. P. (1979). Media Logic. Beverly Hills, CA: Sage.
- Altschull, J. H. (1988). 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 New York: Longman.
- Baerns, B. (1987). Journalists vs. public relations: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In D. L. Paletz (e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orwood, NJ: Ablex.
- Bagdikian, B. H. (1971). The Information Machines: Their Impact on Men and the Media. NY: Harper & Row.
- Bantz, C. R. (1990). Corporation Culture. In S. R. Corman et al. (eds.). Foundations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 Longman.
- Bar-Tal, D. et al. (1989). Stereotyping and Prejudice: Changing Conception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Barking, S. M. (1989). Coping with the duality of television news: Comments on Graber.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3(2): 153-156.
- Bell, M. A. (1991). The Language of News Media. London: Blackwell.
- Benford, R. D. (1993). Frame disputes within the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 Social Forces 71(3): 677-701.
- Bennett, W. L. (1994). The news about foreign policy. In W. L. Bennett & D. L. Paletz (eds.). Taken by Storm: The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the Gulf Wa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nnett, W. L. & Paletz, D. L. (ed.) (1994). Taken by Storm: The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the Gulf War.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Berkowitz, D. (1997). Social Meanings of News: A Text-Reader.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ergsma, F. (1978). News values in foreign affairs on Dutch television. Gazette 23: 207-222.
- Bird, S. E. & Dardenne, R. W. (1988). Myth, chronicle, and story: Exploring the narrative qualities of news. In J. W. Carey (ed.). Media, Myths, and Narratives: TV and the Press. Newbury Park, CA: Sage.
- Blake, R. H. & Haroldsen, E. O. (1975). A Taxonomy of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NY: Hastings House.
- Bleske, G. L. (Fall 1991). Ms. Gates take over: An updated version of a 1949 case study.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13: 88-97.
- Blumler, J. G. (1990). Elections, the media, and the modern publicity process. In M. Ferguson (ed.). Public Communication: The New Imperatives. London: Sage.
- Bowers, D. R. (1967). A report on activity by publishers in directing newsroom decisions. Journalism Quarterly 44(1): 43-52.
- Breed, W. (1997).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In D. Berkowitz (ed.). Social Meanings of News: A Text-Reader. Thousand Oaks, CA: Sage (原刊載於 Social Forces 33: 326-375, 1955).
- Brown, J. D. et al. (1987). Invisible power: Newspaper news sources and the limits of diversity. Journalism Quarterly 64(1): 45-54.
- Brown, R. M. (1979). The gatekeeper reassessed: A return to Lewis. Journalism Quarterly 56(3): 595-601, 679.
- Bruner, J. (1990). Acts of Mea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ckalew, J. K. (1969/70). News elements and selection by Television

- news editor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14: 47-54.
- Buckalew, J. K. (1969). A Q-Analysis of television news editors' decision. Journalism Quarterly 46: 135-7.
- Buonanno, M. (1993). News-values and fiction-values: News as serial devices and criteria of 'fiction worthiness' in Italian TV fi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177-202.
- Cantor, N. & Kihlstrom, J. F. (1987). Personality and Social Intelligenc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Carrage, K. M. (1991). News and ideology: An analysis of coverage of the West German Green Party by the News York Times. Journalism Monographs No. 128.
- Chibnall, S. (1975). The crime reporter: A study in the production of commercial knowledge. Sociology 9(1): 46-66.
- Chung, Wei-Wen (鍾蔚文) & Tsang, Kuo-Jen (臧國仁) (1997). Extending the concept of framing: The discursive tur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Framing in the new media landscape." Columbia: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October 12-14.
- Chung, Wei-Wen (鍾蔚文) & Tsang, Kuo-Jen (臧國仁) (1993). News frames reconsidered: What does frame do to real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EJMC convention, Kansas City, MO. USA.
- Chung, Wei-Wen (鍾蔚文) and Tsang, Kuo-Jen (臧國仁) (1992). In search of news frames: Their function and structur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Chung, Wei-Wen (鍾蔚文); Tsang, Kuo-Jen (臧國仁); Chen, Pai-Lin (陳百齡); Chen, Shui-Hsiao (陳順孝). (1998) Journalistic Expertise: Proposal for a research program.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CA Convention, Jerusalem, Israel, July 20-24.
- Clinton, B. (1996). Interview with Marvin Kalb, co-editor of the Press/Politics. Press/Politics 1(1): 3-6.



- Clyde, R. W. and Buckalew, J. K. (1969). Inter-media standardization: A Q-analysis of news editors. Journalism Quarterly 46: 349-351.
- Cohen, S. (1981). Mobs and rockers: The inventory of manufactured news. In S. Cohen & J. Young (eds.).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Social Problems, Deviance and the Mass Media. London: Constable.
- Cook, T. E. (1996). The negotiation of newsworthiness. In A. N. Crigler (ed.).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Cook, T. E. (1994). Domesticating a crisis: Washington newsbeats and network news after the Iraq invasion of Kuwait. In W. L. Bennett & D. L. Paletz (eds.). Taken by Storm: The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the Gulf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ok, T. E. (1989). Making Laws and Making News: Media Strategies in the U. 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 Crigler, A. N. (ed.) (1996).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Cutlip, S. M. (1954). Content and flow of AP news -- From trunk to TFS to reader. Journalism Quarterly 31: 434-446.
- Davis, D. K. (1990). News and politics. In D. L. Swanson & D. Nimmo (eds.). 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 Resource Book. Newbury Park, CA: Sage.
- Davis, D. K. & Robinson, J. P. (1989). Newsflow and democratic society in an age of electronic media. In G. Comstock, (ed.). 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Behavior, vol. 2.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 De Fleur, M. L. & Dennis, E. E. (1988). Understanding Mass Communication (3r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Delia, J. G., O'Keefe, B. J. and O'Keefe, D. J. (1982). The constructivist

-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 In F. E. X. Dance (ed.). Human Communication Theory: Comparative Essays. New York: Harper & Row.
- Denton, R. E., Jr. (1993). The Media and the Persian Gulf War. Westport, CN: Westport.
- Dimmick, J. (1974). The Gate-keeper: An uncertainty theory. Journalism Monographs, No. 37.
- Donohue, G. A., Tichenor, P. and Olien, C. N. (1972). Gatekeeping: Mass media systems and information order. In G. Kline & P. Tichenor (eds.).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Donohue, G. A. et al. (1995). A ground dog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the med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5(2): 115-132.
- Dorman, W. A. & Livingston, S. (1994). News and historical content: The establishing phase of the Persian Gulf policy debate. In W. L. Bennett & D. L. Paletz (eds.). Taken by Storm: The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the Gulf Wa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rew, D. G. (1972). Roles and decision making of three television beat reporter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16(2): 165-173.
- Dunwoody, S. (1997). Science writers at work. In D. Berkowitz (ed.). Social Meanings of News: A Text-Reader. Thousand Oaks, CA: Sage (原刊載於 Research report no. 7, Center for New Communication, School of Journalism, Indiana University).
- Dunwoody, S. & Griffin, R. J. (1993). Journalistic strategies for reporting long-term environmental issues: A case study of three Superfund sites. In A. Hansen (ed.). The Mass Media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 Dyer, S. C. (1996). Descriptive modeling for public relations environmental scanning: A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R

Research 8(3): 137-150.

- Entman, R. M. (1993).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51-58.
- Entman, R. M. & Page, B. I. (1994). The news before the storm. In W. L. Bennett & D. L. Paletz (eds.). Taken by Storm: The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the Gulf Wa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ntman, R. M. & Paletz, D. L. (1981). Media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 Entman, R. M. and Rojecki, A. (1993). Freezing out the public: Elite and media framing of the U. S. anti-nuclear movemen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0: 155-173.
- Epstein, E. J. (1973). News From Nowhe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 Ericson, R. V. et al. (1995). Crime and the Media. Aldershot: Brookfield.
- Ericson, R. V. et al. (1991). Representing Order: Crime, Law, and Justice in the News Medi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Ettema, J. S. & Glasser, T. L. (1990). News values and narrative themes: Irony, hypocrisy and other enduring value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CA Conference, Dublin, Ireland.
- Fair, J. E. (1996). The body politic, the bodies of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amine in U. S. TV coverage of famine in the Horn of Africa.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No. 158.
- Fairclough, N. (ed.). (1992). Critical Language Awareness. London: Longman.
- Fang, Y-J. (1994). "Riots" and demonstrations in the Chinese Press: 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deology. Discourse and Society 5 (4): 463-481.

- Fedler, F. (1979). Reporting for the Print Media (2nd ed.).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Fico, F. (1986). Influence of perceived editorial concern and role self-concept on source reliance of reporters in two statehouses. Journalism Quarterly 63(2): 322-330.
- Fishman, M. (1980). 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Fiske, J. & Hartley, J. (1978). Reading Television. London: Methuen.
- Fowler, R. (1991).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 London: Routledge.
- Fowler, R. & Kress, G. (1979). Critical linguistics. In R. Fowler et al. (eds.). Language and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 Fridriksson, L. (1995). Media framing of a crisis in the Western Allianc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EJMC convention, Washington, D. C.
- Friedland, L. A. & Zhang, M. (1996). International TV coverage of Beijing Spring 1989: A comparative approach.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No. 156.
- Galtung, J. & Ruge, M. H. (1965).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new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 64-91 (also appearing in J. Tunstall, ed., 1970. Media Sociology: A Reader.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p. 259-298).
- Galtung, J. & Vincent, R. C. (1992). Global Glasnost: Toward a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Gamson, W. A. (1989). News as framing: Comments on Graber.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3(2): 157-161.
- Gamson, W. A. (1988).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B. Klamermans,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 1. Greenwich, CN: JAI Press.



- Gamson, W. A. (1984). What's News: A Game Simulation of TV News (chap. 2: News fram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Gamson, W. A. & Modigliani, A.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1): 1-37.
- Gamson, W. A. & Modigliani, A. (1987). The changing culture of Affirmative action.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 3: 137-177.
- Gamson, W. A., et al. (1992). Media image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8: 373-393.
- Gandy, O. H. Jr. (1982). Beyond Agenda Setting: Information Subsidies and Public Policy. Norwood, NJ: Ablex.
- Gans, H. 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Gastil, J. (1992). Undemocratic discourse: A review of theory and research on political discourse. Discourse & Society 3(4): 469-500.
- Gerbner, G., Mowlana, H., & Nordenstreng, K. (1993). The Global Media Debate: Its Rise, Fall, and Renewal. Norwood, NJ: Ablex.
- Gieber, W. (1964). News is what newspapermen make it. In L. A. Dexter and D. M. White (eds). People, Society, and Mass Communication. London: Free Press of Glencoe.
- Gist, M. E. (1990). Minorities in media imagery: A 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journalistic biases.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11(1): 52-64.
- Gitlin, 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Berkeley, C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ren, C. D. (1989). Journalists as scientists or prophets: Comments on Katz.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3(2): 251-254.
- Graber, D. A. (April, 1992). News and Democracy: Are Their Paths Diverging? Roy W. Howard Public Lecture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Journalism.

- Graber, D. A. (1989). Content and meaning: What's it all abou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3(2): 144-152.
- Graber, D. A. (1984). Mass Media and American Politics (3rd. ed.).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 Graddol, D. (1994). The visual accomplishment of factuality. In D. Graddol & Oliver Boyd-Barrett (eds.), Media Texts: Authors and Readers. Clevedon, U. K.: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The Open University).
- Greenberg, B. S. et al. (1993). Media, Sex, and the Adolescent. Cresskill, NJ: Hampton.
- Gurevitch, M. & Kavoori, A. P. (1994). Global texts, narrativ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and global meaning in television news.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4(1 & 2): 9-24.
- Hackett, R. A. (1985). A hierarchy of access: Aspects of sources bias in Canadian TV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62(2): 256-265, 277.
- Hall, S. (ed.)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 Hall, S. et al. (1981).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news: Mugging in the media. In S. Cohen & J. Young (eds.).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Deviance,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Mass Media. Beverly Hills, CA: Sage.
- Hallin, D. C. (1992). Sound bit news: TV coverage of election, 1968-1988.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2 (2): 5-24.
- Hawley, A. H. (1965). Ecology and human ecology. In J. D. Singer (ed). Human Behavio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icago: Rand McNally.
- Hemanus, P. (1976). Objectivity in news transmiss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4): 102-107.
- Hendrickson, L. & Tankard, J., Jr. (1997). Expanding the news frame: The systems theory perspective.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 Educator 51(4): 39-46.
- Herman, E. S. (1985). Diversity of news: "Marginalizing" the opposi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5 (3): 135-146.
- Herman, J. C. (1986). Gatekeeper vs. propaganda models: A critical American perspective. In P. Golding et al., (eds.). Communicating Politics.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 Hess, S. (1996). News and Newsmaking.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 Hicks, R. G. & Gordon, A. (1974). Foreign news content in Israeli and U. S. newspapers. Journalism Quarterly 51: 639-644.
- Hirsch, P. (1977). Occupational,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models in mass media research. In P. M. Hirsch et al. (eds.). Strategies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Hodge, R. & Kress, G. (1979). Language as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 Hulteng, J. L. (1976). The Messenger's Motives: Ethical Problems of the News Medi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羅文輝譯, 1992, 台北: 遠流).
- Hulteng, J. L. & Nelson, R. P. (1971). The Fourth Estate: An Informal Appraisal of the News and Opinion Media. NY: Harper & Row.
- Johnstone, J. W. C., Slawski, E. J., & Bowman, W. M. (1976). The News People: A Sociological Portrait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and Their Work. Urbana: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1994), vol. 4, no. 1 & 2.
- Keir, G., McCombs, M., & Shaw, D. L. (1986). Advanced Reporting: Beyond News Events. New York: Longman.
- Kennamer, J. D. (ed.). (1994). Public Opinion, the Press, and Public Policy. Westport, CO: Praeger.
- Kepplinger, H. M. & Kocher, R. (1990). Professionalism in the media.

- world?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 285-311.
- Koch, T. (1990). News as Myth: Fact and Context in Journalism. NY: Greenwood.
-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Enlarg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譯本作者為程樹德等).
- Lang, G. E. & Lang, K. (1991). Watergate: An exploration of the agenda-building process. In D. L. Protess and M. McCombs (eds.). Agenda-Setting: Readings on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Policymaking. Hillsdale, NJ: LEA.
- Larson, J. (1984). Television's Window on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verage on the U. S. Networks. Norwood, NJ: Ablex.
- Lee, C-C. (1982). Th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orde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9: 617-636.
- Lee, J. & Craig, R. L. (1992). News as an ideological framework: Comparing U. S. newspapers' coverage of labor strikes in South Korea and Poland. Discourse & Society 3(3): 341-363.
- Lewin, K. (1951).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Theoretical Papers (ed. by D. Carwrigh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wis, J. (1994). The absence of narrative: Boredom and the residual power of television news.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4(1 & 2): 25-40.
- Leyens, J-P, et al. (1994). Stereotypes and Social Cognition. London: Sage.
- Libler, C. M. (1993). News Sources and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90. The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4(3): 183-194.
- Libler, C. M. & Bendix, J. (1996). Old-Growth forests on network: News sources and the framing of an environmental controversy.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3(1): 53-65.



- Liebes, T. (1994a). Narrativization of the news: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4(1 & 2): 1-8.
- Liebes, T. (1994b). Crimes of reporting: The unhappy end of a fact-finding mission in the Bible.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4(1 & 2): 135-150.
- Linne, O. (1993).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al broadcasters and their sources. In A. Hansen (ed). The Mass Media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 Lipari, L. (winter, 1996). Journalistic authority: Textual strategies of legitimation. Journalism Quarterly 73(4): 821-834.
- Lippmann, W. (1922).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 ed.).
- Littlejohn, S. W. (1989). Human Communication Theory (3r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 Lo, Ven-Hwei, Cheng, Jei-Cheng, & Lee, Chin-Chuan (1994). Television news is government news in Taiwan; Patterns of TV news sources selection and presentation.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1): 99-110.
- McCarthy, J. D., et al. (1996). Images of protest: Dimensions of selection bias in media coverage of Washington demonstrations, 1982 and 1991.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61: 478-499.
- McCombs, M. (1994). News influence on our pictures of the world. In J. Bryant & D. Zillmann (eds.). Media Effects: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McLean, M. S., Jr. & Pinna, L. (1958). Picture selection: An editorial game. Journalism Quarterly 40: 230-232.
- McLeod, J. M. & Hawley, Jr., S. E. (1964). Professionalization among newsmen. Journalism Quarterly 41: 529-539, 577.
- McManus, J. H. (1995). A market-based model of news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4(5): 301-338.

- McQuail, D. (1992). Media Performanc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London: Sage.
- McQuail, D. & Windahl, S. (1981). Communication Models for the Stud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NY: Longman (中譯本作者為楊志弘、莫季雍；正中書局出版).
- Manoff, R. K. (1986). Writing the news (by telling the 'story'). In R. K. Manoff & M. Schudson (eds.). Reading the New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Markus, H. & Zajonc, R. B. (1985).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G. Lindzey & E. Aronson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 NY: Random House.
- Mencher, M. (1986). Basic News Writing (2nd ed.). Dubuque, IA: Wm C. Brown.
- Mendelsohn, M. (1993). Television's frames in the 1988 Canadian elec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8: 149-171.
- Meyers, M. (1992) Reporters and beats: The making of oppositional new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9: 75-90.
- Molotch, H. L. & Lester, M. (1974). News as purposive behavior: On the strategic use of routine events, accidents, and scand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 101-112.
- Molotch, H. L., et al. (1987). The media-policy connection: Ecologies of news. In D. L. Paletz (e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orwood, NJ: Ablex.
- Mowlana, H. (1985). International Flow of Information. Paris: UNESCO report, no. 99.
- Mowlana, H. et al. (1992). Triumph of the Image: The Media's War in the Persian Gulf -- A Global Perspective. Boulder, CO: Westview.
- Napoli, P. M. (1997). A principal-agent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media organizations: Toward a theory of media firm.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4: 207-219.

- Neuman, W. R. et al. (1992). Common Knowledge: Ne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oelle-Neumann, E. & Mathes, R. (1987). The 'event as event' and the 'event as news': The significance of 'consonance' of media effect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 391-414.
- Oakes, J. P., et al. (1994). Stereotyping and Social Reality. Oxford: Blackwell.
- Ostgaard, E. (1965).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low of new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1): 39-63.
- Padgett, G. E. (1990). In search of a usable definition of news for the classroom. Journalism Educators 45(3): 67-69, 89.
- Pan, Z. & Kosicki, G. M. (1993). Framing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0: 55-75.
- Parisi, P. (1995). Toward a "philosophy of framing": Narrative strategy and public journalism.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CA convention, Chicago.
- Parsigian, E. K. (1992). Mass Media Writing. Hillsdale, NJ: LEA.
- Patterson, T. E. (1980). The Mass Media Election: How Americans Choose Their President. New York: Praeger.
- Philips, E. B. (1977). Approaches to objectivity: Journalistic vs.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 In P. M. Hirsch et al. (eds.). Strategies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Philips, E. B. (1976). Novelty without chan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6(4): 87-92.
- Pietila, V. (1992). Beyond the news story: News as discursive composi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 37-67.
- Pollock, J. C. (1981). The Politics of Crisis Reporting: Learning to be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NY: Praeger.
- Potter, J. (1996). Representing Reality: Discourse, Rhetorics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London: Sage.

- Reese, S. (1997). Framing public life: A bridging model for media studies. A keynote review paper at the Conference on Framing in the New Media Landscap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Oct 12-14).
- Reese, S. (1991). Setting the media's agenda: A power balance perspective. In J. Anderso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4. Newbury Park, CA: Sage.
- Reese, S., et al. (1994). The structure of news sources on televis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2(2): 84-107.
- Rhee, J. W. (1995).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ews frames and an interpreter's schemata: A theory and a simulatio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EJMC convention, Washington, D. C.
- Roch, I. (1989). Journalists as storytelling: Coverage as narrativ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s 33(2): 162-169.
- Romano, C. (1986). The grisly truth about bare facts. In R. K. Manoff & M. Schudson (eds.), Reading the New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Rosengren, K. E. (1985).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ne paradigm or four? In E. M. Rogers & F. Balle (eds.), The Media Revolution in America and in Western Europe. Norwood, NJ: Ablex.
- Roshco, B. (1975). Newsmak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uner, D. et al. (1995). Inability to recognize news source bias and perception of media bia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EJMC Convention, Washington D. C.
- Rummelhart, D. E. (1975). Notes on a schema for stories. In D. G. Bobrow & A. Collins (eds.), Represen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Studies in Cognitive Scien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Rummelhart, D. E. (1984). Schemata and the cognitive system. In R. S.



- Wyer, Jr. & T. K. Scrull (eds.). Handbook of Social Cognition (vol. 1). Hillsdale, NJ: LEA.
- Ryan, C. (1991). Prime Time Activism: Media Strategies for Grassroots Organizing.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Ryan, M. & Martinson, D. L. (1988). Journalists and public relations practitioners: Why the antagonism. Journalism Quarterly 65(1): 131-140.
- Ryan, M. & Tankard, J. W. Jr. (1977). Basic News Reporting. Palo Alto, CA: Mayfield.
- Sahr, R. (1993). Creditentiality experts: The climate of opinion and journalist selection of sources. In R. J. Spitzer (ed.). Media and Public Policy. Westport, CN: Praeger.
- Salwen, M. B. (1996). News of hurrican Andrew: The agendas of sources and the sources of agenda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2(4): 826-840.
- Sande, O. (1971). The perception of foreign new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8: 221-237.
- Schank, R. C. & Abelson, R. P. (1977). Scripts, Plans, Goals, and Understanding: An Inquiry into Human Knowledge Structure. Hillsdale, NJ: LEA.
- Schiller, D. (1981). Objectivity and the News: The Public and Rise of Commercial Journal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Schlesinger, P. (1990). Rethinking the sociology of journalism: Source strategy and the limits of media centrism. In M. Ferguson (ed.). 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the New Imperatives. London: Sage.
- Schlesinger, P. (1989). From production to propaganda?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1: 283-306 (books review essay).
- Schramm, W. (1949). The nature of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26(3): 259-269 °

- Schramm, W. & Atwood, L. E. (1981). Circulation of News in the Third World: A Study of Asi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Schudson, M. (1991a).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revisited. In J. Curran and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 Schudson, M. (1991b). Historical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K. B. Jensen & N. W. Jankowski (eds.),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 Schudson, M. (August 1986). What Time Means in a News Story. Gannett Center for Media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 No. 4. (本篇同時刊於R. K. Manoff & M. Schudson, eds., Reading the News. NY: Pantheon Books, 1987)
- Schudson, M.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 Schutz, A. (1962). Collected Papers I: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Searle, J. R. (1995).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NY: The Free Press.
- Servaes, I. (1991). European press coverage of the Grenada cri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1(4): 28-41.
- Shoemaker, P. J. (1991). Gatekeeping. Newbury Park, CA: Sage.
- Shoemaker, P. J. & Mayfield, K. (1987). Building a theory of news content: A synthesis of current perspectives. Journalism Monographs no. 103.
- Shoemaker, P. J. & Reese, S. D. (1991). 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 on Mass Media Content. NY: Longman.
- Shoemaker, P., et al., (1992). Deviant acts, risky business, and U. S. involvement: The newsworthiness of world events. Journalism

- Quarterly 68: 781-795.
- Sigal, L. V. (1986). Sources make the news. In Manoff, R. K. & Schudson, M. (eds.) Reading the New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Sigal, L. V. (1973).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Lexington, MA: D. C. Heath and Co.
- Singer, E. & Endreny, P. M. (1993). Reporting on Risk.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Singleman, L. (1973). Reporting the new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 132-151.
- Singletary, M. W. (1977). What determines the news? ANPA Research Report, No. 5.
- Smith, C. (1993). News sources and power elites in news coverage of the Exxon Valdez oil spill. Journalism Quarterly 70(2): 393-403.
- Smith, R. R. (1979). Mythic elements in TV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9(1): 75-82.
- Snow, D. A. & Benford, R. D. (1988). Ideology, framing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1: 197-217.
- Soley, L. C. (1992). The News Shapers: The Sources Who Explain the News. New York: Praeger.
- Spector, M. & Kitsuse, J. I. (1977). Constructing Social Problems. Menlo Park, CA: Cummings.
- Spitzer, R. J. (1993) (ed.). Media and Public Policy. Westport, CN: Praeger.
- Staab, J. F. (1990). The role of news factors in news selection: A theoretical reconside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 423-443.
- Steele, J. E. (1996). Experts and the operational bias of TV news: The case of the Persian Gulf War.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2(4): 799-812.

- Stemple, G., III (1963).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of the nature of news. In W. A. Danielson (ed.). Paul J. Deutschmann Memorial Paper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incinnati, OH: Scripps-Howard Research Foundation.
- Stocking, S. H. & Gross, P. H. (1989). How Do Journalists Think?: A Proposal for the Study of Cognitive Bias in Newsmaking. Bloomington, NJ: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D. R. (1991). Framing the news: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research desig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EJMC convention, Boston, MA.
- Trew, T. (1979). 'What the papers': 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ideological difference. In R. Fowler et al. (eds.). Language and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 Trumbo, C. (1995a). The life course of an environmental issue: Claims frames and global warming.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EJMC convention, Washington, D. C.
- Trumbo, C. (1995b). Longitudinal modeling of public issues: An application of the agenda-setting process to the issue of global warming.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No. 152.
- Tsang, K-J (臧國仁) (1987). A theory of social propinquity: A general system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news research.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 Tuchman, G. (1991). Media institutions: Qualitative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news. In K. B. Jensen & N. W. Jankowski (eds.).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 Tuchman, G. (1988). Mass media institutions. In N. J. Smels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y. Newbury Park: Sage.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Tuchman, G. (January 1972).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merican



- Journal of Sociology 77: 660-679.
- Tunstall, J. (1971). Journalists at Work. London: Constable.
- van den Berg, H. et al. (1992). Contextualization in newspaper articles. A sequential analysis of actors' quotes on the PATCO affair.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 359-389.
- van Dijk, T. A. (1995). Discourse semantics and ideology. Discourse & Society 6(2): 243-289.
- van Dijk, T. A. (1993).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 Society 4(2): 249-283.
- van Ginneken, J. (1998). Understanding Global New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 van Leeuwen, T. (1996). The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actors. In C. R. Caldas-Coulthard & M. Coulthard (eds.), Texts & Practices. NY: Routledge.
- van Leeuwen, T. (1995). Representing social action. Discourse & Society 6 (1): 81-106.
- van Zoonen, L. (1991).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he media. In J. Curran and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 van Zoonen, L. (1994). Feminist Media Studies. London: Sage.
- Velody, I. & Williams, R. (1998). The Politics of Constructionism. London: Sage.
- Voakes, P. S. et al. (1996). Diversity in the news: A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3(3): 582-593.
- Walters, et al. (1989). Bad Tiding. Hillsdale, NJ: Erlbaum.
- Wanta, W., Williams, J., and Hu, Y-W. (1991). The agenda-setting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 An examination of differing news frame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EJMC Convention, Boston, MA.

- Weaver, D. & Wilhoit, G. C. (1980). News media coverage of senators in four congresses, 1953-1974. Journalism Monographs No. 67.
- Weick, K. (1969).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ing.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本研究使用第二版，1979出版)。
- Westerstahl, J. (1983). Objective news report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0: 403-424.
- Westerstahl, J. & Johansson, F. (1994). Foreign news: news values and ideologie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9: 71-89.
- Westley, B. H. & MacLean, M. (1957). A conceptual model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ism Quarterly, 34: 31-38.
- White, D. M. (1950). The 'gate keeper': A case study in the election of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34: 31-38.
- Whitney, D. C. & Becker, L. B. (1982). Keeping the gates for gatekeeper: The effects of wire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59: 60-65.
- Whitney, D. et al. (1989). Geographic and source bias in network TV news, 1982-1984.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33(2): 159-174.
- Wober, M. & Guntér, B. (1988). Television and Social Control. Aldershot, England: Avebury.
- Wolfsfeld, G. (1997a). Media and Political Conflict: News From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Cambridge.
- Wolfsfeld, G. (1997b). Fair weather friends: The varying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the Arab-Israel peace proces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4: 29-48.
- Wolfsfeld, G. (1993). Introduction. In A. A. Cohen & G. Wolfsfeld (eds.). Framing the Intifida: People and Media. Norwood, NJ: Ablex.
- Wolfsfeld, G. (1991). Media, protest, and political violence: transactional analysis. Journalism Monograph, No. 127.

- Woo, J. (1994). Different frames and the same mechanism: Comparing TV news coverage of the 1987 and 1992 Kore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CA convention, Sydney, Australia.

